

# 《柳州文史资料》第九辑

## 目 录

- 我市年工业总产值提前一个月实现一百亿……**柳州日报**（1）  
自治区党委 自治区人民政府发来贺电
- 热烈祝贺柳州市工业产值过百亿………**柳州日报**（2）  
百亿之后的思索………新华社记者荆明君 翟祚胜（3）  
——访中共柳州市委书记陈雷卿
- 祝百亿大捷………**《柳州日报》社论**（6）  
我市各民主党派、工商联向市委市政府发贺信
- 祝贺工业总产值提前实现一百亿………**柳州日报**（7）
- 柳州工业城并集诸业优势于一体史实………曹 竞（8）  
我成为“国家有突出贡献技术专家”的奋斗  
历程………曾吉恕（15）
- 我从平凡到科技“拔尖”的二十八年………张达俊（21）  
柳州市第一家中央投资企业忆述  
………庞 成 口 述（27）  
………盛德萱 记录整理
- 柳州彩调剧《刘三姐》的创作和演出………庞邵元（30）  
柳州文化古城概貌………戴义开（44）
- 柳州解放前夕保护电厂的回忆………阚培松（56）  
柳州解放时我这老板的忧与乐  
………**陈立初** 口 述（58）  
………**陈广锟** 记录整理

- 半夜敲门来交枪 ..... 卢星锦 (61)
- 1952年六人创建红会医院第一门诊部的  
亲历 ..... 程国栋 (63)
- 柳州解放初制止十二年来通货膨胀纪事 ..... 刘郁卿 (65)
- 记50年代柳州百货业的劳资关系 ..... 陈天泰 (68)
- 50年代国营企业财产管理的两件小事 ..... 彭存立 (70)
- 柳州市第一家公私合营企业建立的  
经过 ..... [陈立初] 口述 (72)  
陈广锟 记录整理
- 柳城太平乡解放初民兵剿匪记 ..... 韦焕庚 (74)
- 解放初期投诚人员在柳城改造自新的回忆 ..... 何宗棠 (85)
- 柳州解放后最初的文艺演出活动 ..... [覃文林] 庞邵元 (87)
- “名丑”汤义甫和他在柳州彩调剧团的活动 ..... 庞邵元 (89)
- 鱼峰业余文艺学校创办始末 ..... 朱光华 (92)
- 50年代下乡蹲点记 ..... 覃忠恒 (94)
- 柳江县水利建设简况 ..... 覃桂禄 (97)
- 民国初期柳州城郊的个体商业简述 ..... 柯定坤 (104)
- 1948年邓老板专机运银抢生意小记  
..... [陈立初] 口述 (106)  
陈广锟 记录整理
- 民国时期的柳州广西银行 ..... 杨庆宁 (109)
- 广西第一家精神病医院在柳州创建的回忆 ..... 张童昌 (117)
- 广西广播电视台大学柳州市分校的创建与  
发展 ..... 卢黄基 阚培桐 (122)
- 记鱼峰民办中学半工半读的勤工俭学 ..... 巫邦隆 (130)

柳州化工学校的创建始末	杨育晞(136)
广西第一所中等农技校在柳州创办的回忆	廖 钜(142)
广西第一所林校在柳州的创建与发展	蒋 纪(151)
广西大学学生促校返梧运动的回忆	沙君涛(161)
柳州市成人教育发展概述	陈雄子(165)
解放后柳州山歌活动概况	张绍伯 于辉云(178)
柳州市50年代初期的社会文化活动见闻	于辉云(180)
试谈刘三姐在柳州	覃桂清(189)
忆壮族老山歌手韦成勋	张绍伯 于辉云(195)
生活书店柳州分店的建立经过	苏尹铨(199)
海外同胞卢玉衡题诗“鬼子坳”忆奇袭	覃 帆(201)
抗日烽火中的柳州广西学生军	罗怡林(205)
忆柳州抗日游击队成立始末	董咸熙(215)
我方在芷江市接受日军投降见闻	穆 岳(218)
壮村“团结路”建成的经过	覃桂禄(220)
越南革命同盟会在柳州的成立与活动	叶瑞庭(223)
我在新桂系军政体系工作十一年目睹记	潘炳煌(227)
百岁拳师白崇晖与柳州“崇武”国术馆 的建立	胡万良 胡康怡(执笔)(232)
柳州桥史话	冯光祥(235)
抗日战争时期一位美国人在柳州的记事	晓 菲(240)
对《中国工程师学会广西考察团在柳州》 一文的商榷	覃仙毓(244)

# 以十四大精神为动力 加快步伐迈上新台阶

## 我市年工业总产值提前 一个月实现一百亿

本报讯 记者伍杰、周彤报道：全市人民共同关心并为之争作贡献的大事，市委、市政府根据邓小平同志南巡谈话和区党委六届四次全会精神而定出的战略目标——实现年工业总产值100亿元，已经提前一个月胜利完成。据统计，至11月30日止，我市工业总产值已实现101.0059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7.85%；而且销售收入和经济效益的增长幅度大于产值，达30%以上。这一扎实的辉煌业绩，使我市在全国五个少数民族自治区中率先登上了“百亿城市”的台阶。

邓小平同志南巡谈话掀起了新一轮改革大潮，龙城人民蕴藏着的改革热情如火山喷发。市委七届五次全会根据柳州市的实际情况和内在潜力，适时提出了今年工业总产值实现100亿，随后又提出国民生产总值提前7年翻两番，本世纪末翻三番的战略大目标，并陆续出台了一系列改革的政策性文件，使我市在观念更新、企业机制转换、政府职能转换、引进外资等方面都有了突破性进展。全市上下精神振奋，推动“百亿战役”迅猛向前。党的十四大召开，给我市一系列改革方针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市委、市政府根据十四大精神，决心步伐更大一点，速度更快一点，作出了提前1个月实现100亿的新决策，极大地鼓舞了龙城人民的积极性，全

市各行各业围绕这个目标奋力拼搏。“我为百亿多奉献”形成了龙城社会氛围，更使“百亿战役”呈现了冲刺速度。今年9至11月，平均每个月的工业总产值达到10亿元以上，增长幅度是今年以来最高的3个月。

（原载1992年12月2日《柳州日报》）

## 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发来贺电 热烈祝贺柳州市工业产值过百亿

本报讯 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12月3日给市委、市政府发来电报，热烈祝贺柳州市实现工业总产值超过一百亿元。贺电全文如下：

中共柳州市委、柳州市人民政府：

你们《关于柳州市工业产值突破百亿的报告》悉。

在柳州市工业战线全体干部、职工和全市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同时，工业生产取得了较快的发展速度，工业总产值超过百亿元。对此，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向你们表示祝贺！希望你们继续深入学习贯彻十四大精神，切实贯彻落实《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扎实深化企业改革，扩大开放，加强企业技术改造，增强后劲，提高产品质量，提高经济效益，开拓两个市场，在竞争中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

预祝你们取得新的更大的成绩。

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

1992年12月3日

（原载1992年12月5日《柳州日报》）

# 百亿之后的思索

## ——访中共柳州市委书记陈雷卿

新华社记者 荆明君 壬祚胜

今年11月，广西柳州市工业产值突破100亿，成为我国5个少数民族自治区率先突破100亿工业产值的城市。

100亿，铁一般证明了这个工业城市的发展潜力和速度。

但，100亿很快成为历史。

百亿之后带来什么思索？为此记者专访了柳州市委书记陈雷卿。

### 100亿的真正内涵

“今年，我们提出一百亿目标，是克服了失落感和困惑的。”

市委书记陈雷卿介绍情况时，感触颇深。年初，柳州市提出的目标是93亿，不是100亿。不少人认为93亿已是顶点了。这也难怪人们当时的心理。曾为广西做过重大贡献的柳州，前几年发展步子停滞了，产值增长速度落于全区平均水平之后。加上自治区投资重点南移，柳州人便有了失落感。

是消沉，还是振作？

5月份，市委召开了七届五次全会，认真领会邓小平南巡谈话精神，增加紧迫感和危机感，克服失落感，提出实现工业产值100亿的目标，开始了自费改革的实践。

一年来，100亿成了全市各行各业的主旋律。人在想100亿，鱼峰山下唱山歌也唱100亿。一个菜农给市委写信说，他要种好菜，也为实现100亿作贡献。经过全市人民努力，柳州人的梦实现了。100亿，从形式上讲它只是一个工业产值。但它的真正内涵及意义在于，通过100亿的奋斗目标，激发了龙城人的奋发精神。而这一点，正是柳州继续腾飞的最大的推动器。

### 扬长促短全方位发展

“100亿是工业产值，但柳州的其他行业还较落后。对比沿海发达地区，对比江南正在崛起的某些中等城市，特别是对比十四大市场经济的战略思路，柳州并没有什么优越感。因此我们已开始实施‘扬长促短’的发展战略，全方位全速发展。”

市委书记陈雷卿异常冷静地对记者说。“扬长”，即发挥工业这个“长腿”优势，加速大中型企业经营机制的转换，尽快适应市场经济的运作。在工业发展方向上，以汽车工业为龙头，带动其他各业的发展。柳州市投资11亿多元，目前正利用今年最后的时间，加快对60多家大中型企业进行的170多项的技术改造步伐，为明年实现工业总产值达120亿元创造条件。

“促短”，即以大中型企业的辐射功能，促进乡镇企业、外资企业、第三产业这三条“短腿”的发展。为使乡镇企业迈上新台阶，实现明年乡镇企业产值10亿元的目标，柳州市已从企业中抽调38名技术骨干到乡、镇任职，加强对乡镇企业在管理、技术、信息等方面帮带，并选择有发展前

途的乡镇企业投入8000万元进行重点“输血”，对实现千万元以上产值的乡镇企业厂长、经理实行重奖；进一步完善招商引资政策，按国际惯例简化手续，提高办事效率，创造宽松环境，使外资引进朝深层次发展；加快飞机场、三座大桥、桂柳一级公路等项目的兴建，加快汽车交易市场、农副产品批发市场、日用品批发市场等10大专业市场的培育和发展，使全市第三产业形成“公私一齐上、社会事业社会办”的新格局。

### 走向市场要胆识并举

“走向市场要胆识并举，要天天转换脑筋，日日更新观念。”陈雷卿书记“胸有成竹”，一语破的。他说，一是企业要变“找市长”为“找市场”，丢掉“等、靠、要”，凭真本事在市场中“抢跑道”，在市场中寻求“生存空间”。二是政府部门要变“求稳怕乱”为“先放后导”。要靠市场经济这个“无形的杠杆”去治“乱”，而不能靠行政命令去指手划脚。三是要变怕当“出头鸟”为敢为天下先。市场经济只以成败论英雄，而得胜者往往是敢于想在别人前头，干在别人前头，才取得“先发利益”的。四是要变“无债一身轻”的小农经济观念为敢于举债建设的商品经济观念，要“先当债户，后当财主”。

柳州，这个被誉为“龙城”的工业城市，正以日新月异的成就和坚实的脚步，走向市场经济的大潮，谱写更加壮丽的篇章。

（原载1992年12月3日《柳州日报》）

## 祝 百 亿 大 捷

### 《柳州日报》社论

我市今年工业总产值突破100亿元的目标，提前一个月实现了。这是了不起的成就，也是改革开放以来最令柳州人兴奋的大事。

100亿具有特殊的意义。这是全国各少数民族自治区和自治州盟中的第一个“百亿城”，在158万人口其中不到70万城市人口、20多万产业工人的柳州完成100亿，人均水平在全国是可以“叫响”的；销售收入和税利增长高于产值的增长，表明这100亿是有效益、有市场的100亿；更重要的是，100亿是柳州经济发展的转折点、里程碑，标志着我们这个城市的整体经济实力上了一个新台阶，标志着柳州人民从危机和失落的窘迫中走了出来，走上了一条既有较高速度又有较好效益的路子，雄风再现，精神抖擞。总之，这100亿值得在柳州史志上铺写浓墨重彩。

100亿来之不易。我们有过错过良机的教训，有过躊躇徘徊的苦闷。邓小平同志南巡谈话东方风来，市委五月全会掀起大潮。“能快就不要慢”、“发展才是硬道理”大大解放了思想，周密调查，慎重论证，提出了100亿目标；观念的突破，政策的突破，领导作风的突破，措施的落实到位，激发全市人民多年未有过的积极性，各项工作出现了多年未有过的勃勃生机。上下共付心血汗水，党群同力奋斗拼搏，终于干出这辉煌的100亿。

100亿仅仅是柳州加快发展的第一站。“而今迈步从头越”，我们在十四大精神驱动下，将光大“百亿风采”，弘

扬“百亿伟力”，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埋头苦干，克服一切困难，更坚定地、更快地奔向翻两番、翻三番的目标。 (原载1992年12月2日《柳州日报》)

## 我市各民主党派 工商联向市委市政府发贺信 祝贺工业总产值提前实现一百亿

我市今年工业总产值提前一个月实现一百亿的消息振奋人心。十二月二日，市民革、民盟、民建、民进、农工民主党、致公党、九三学社等七个民主党派及市工商联欢欣鼓舞地联合向市委、市政府写信表示热烈祝贺。

贺信说，本市年工业总产值提前一个月实现一百亿，成为全国五个少数民族自治区中的第一个“百亿城市”，这是全市人民为之拼搏的结果，也是中共柳州市委正确领导、大胆决策的结果。它说明我市人民自上而下在邓小平同志南巡谈话精神鼓舞下，已形成了统一的意志，团结的力量。作为参政党的民主党派，在这新的改革开放形势下，更要加强自身建设，认真学习、贯彻十四大精神，提高自身素质，发挥各自优势，发动全体成员，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积极履行参政议政的职责，并主动投身到火热的经济建设大潮中去。坚持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步、大胆、埋头苦干，克服一切困难，更坚定地为明年柳州经济发展迈上更新的台阶，更快地奔向翻两番、翻三番的目标作出新的贡献。

(原载1992年12月3日《柳州日报》)

# 柳州工业城并集诸业优势 于一体史实

曹 竞

柳州，山环水绕，风景秀丽。清澈的柳江象条矫健的游龙，蜿蜒穿城而过，把北面市区绕成一个巨大的“U”型。登上马鞍山眺望，“江流曲似九回肠”的壮观景色，引发人们美妙的遐想。国际友人惊叹为“世界第一天然大盆景”。

柳州是一座有着2100多年历史的古城。早在旧石器时代晚期，这里就是古人类繁衍生息之地。至今仍有“柳江人”、“白莲洞人”洞穴的遗址。西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为潭中县治，贞观八年（公元634年）为柳州治所。柳州因柳江得名。天宝元年（742年）改为龙城郡，故柳州又有龙城之称。明清为柳州府，民国初废府仍为马平县。后又更名柳州县，1937年始称柳江县。1949年11月25日柳江县解放后，在原城区和郊区设柳州市。1950年3月为广西省辖市，现为广西壮族自治区辖市。

柳州市位于广西中部偏东北。总面积5259平方公里（包括所辖柳江、柳城两县），市区651平方公里，建成区已发展到64平方公里，相当于40年前21个柳州城。总人口166万，市区人口73万，聚居着汉、壮、苗、瑶、侗、回、仫佬等33个民族。近年来，城市建设发展很快，80年代后4年，城建投资1.3亿多元，相当于70年代两个10年的总投入。修建和拓宽城市干道30多条，在柳江上连续建成4座公路大桥，正

在兴建的两座公路大桥也将在近年竣工。同时，筑河堤、建喷泉、装塔钟、架立交、修广场，一座目前广西最高、誉为“八桂第一楼”的30层工贸中心大楼拔地而起，成为市中心高楼林立中的佼佼者。近年兴建了一批住宅小区，不断进行旧城改造，并且加速城市绿化，建成区绿化复盖率为30.35%以上，市区绿化道路总长度137.51公里。

柳州是现代工业崛起的城市。它是从过去工业基础很薄弱的情况发展起来的。1949年，全市只有19家机械化程度不高的小工厂，只能生产碾米机、手工榨油机、犁头、骨粉、卷烟、火柴等简单产品，全市职工仅有2000多人，工业总产值913万元。建国以后，经过40多年的努力，特别是近1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作为全国经济体制改革综合试点城市的柳州，其发展速度令人瞩目。1980年到1985年工业总产值由15个亿上升到31个亿，1990年，中国社会科学院测度全国187个城市的社会发展水平，柳州名列全国第18位。1991年已达到86.47亿元，上缴税利9亿多元，被列为全国工业总产值和税利总额最大的50个城市之一。劳动生产率居全国5个少数民族自治区7个重点城市的前列。1992年，柳州市工业产值超过百亿大关，成为全国5个少数民族自治区中率先进入百亿的城市。1992年，在全国城市综合实力50强中，柳州名列第27位。柳州是跻身于全国“科技兴市”的8个试点城市之一。这为第二个经济发展战略目标迈步揭开了新的篇章。

柳州市是广西重要的工业基地，基础雄厚。现有工业企业800多家，其17家企业工业产值超过亿元，工业企业职工21.4万多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柳州市把投资重点

转向原材料基础工业和轻工业的技术改造，致力于开发适销对路的轻工业产品，在机械工业方面，重点投资发展汽车工业，其他加工工业也由过去的单一性变为多向服务和多方位的转移。目前全市已建成以汽车、钢铁、有色金属、纺织为主导产业，以工程机械、通用机械、建材、家电、造纸、化工、卷烟、食品、塑料、电工仪表等为支柱的36个工业大类，占国家统计的40个工业大类的90%，其中轻工业占53.5%，重工业占47.5%，已基本形成工业门类齐全、结构配套合理、具有较强实力的工业体系。“七五”期间，新增工业固定资产20.22亿元，完成技改项目800多项，开发新产品、新品种、新花色500多种，其中200多种填补国家和广西空白。主要工业产量和1980年相比，汽车增长14倍多，装载机增长169.2%，棉纱增长231.9%，水泥增长89.4%，机制糖增长2.29倍，卷烟增长13.58%，牙膏增长9.9倍，钢增长160.4%。全市现有各类产品4000余种，其中500多种工业产品获国家、部、和广西的优质、名牌称号和“百花”奖。一批机械、纺织、轻工、家电、建材、有色金属产品在全国同行业质量评比中名列前茅。有100多种工业产品还畅销国际市场，如“环宇牌”空压机、“芭蕉牌”氧化锌、“五羊牌”、“鱼峰牌”水泥、“雄狮牌”注塑机、“仙葫牌”两面针牙膏、“都乐牌”各色糖果、“双马牌”电器，以及ZL40B、ZL50B装载机、微型汽车、电动油锯、针棉制品、扬声器、塑料制品和卷烟等等。柳州已初步形成了现代化都市的规模。

柳州市对外贸易事业也迅速发展，已同3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经济贸易关系。1979年全市出口企业只有20多

家，出口产品只有30多种，到1990年，全市出口创汇企业或具有出口创汇潜力的工厂达到90多家，出口品种已增加到170多种。1985年到1990年的5年间，全市外贸出口收购总值增长8.7倍，出口创汇增长3.7倍。在利用外资方面，日益蓬勃发展，已批准开业的合资合作企业30多家，注册资本已达到6000多万美元，这些企业在经营实践中不断得到完善，逐步达到预期的效果。

柳州气候宜人，物产资源丰富。这里属南亚热带北缘气候；年平均温度20.5℃，平均降雨量1489.8毫米。冬无严寒，夏无酷暑，适宜生长常绿林木和南方水果、木材、蔗糖、桐油、油茶、香菇、木耳、桂圆、柑桔、金桔以及多种药材。这些，久负盛名。另外还有重晶石、石灰石、大理石以及锰、铅、锌等矿藏，石雕、石砚、唐三彩陶瓷器、盆景、工艺小棺材等也很受赞誉。

唐代修建的柳州和桂林之间的桂柳运河的通航以及和北方的贸易逐步频繁，使柳州在历史上就是广西各地的工业品、农副产品、土特产品和手工业产品的集散地，又是广东、湖南、江西、贵州、云南、四川等地商品物资交流的通道，素有“桂中商埠”之称。柳州是中国南方重要的交通枢纽，是柳州铁路局所在地。湘桂、黔桂、枝柳3条铁路干线在此交汇。柳州火车站是西南各省最大的中转站，是连接内地与港口的桥梁，担负着广西70%的客货运输和西南物资的外运任务。还与越南铁路相通，是我国边陲到越南的一条重要交通干线；水路顺柳江东南而下，可直达梧州、广州和港澳；空中有航线直飞广州；公路运输也很发达。柳州现在已是国家一类口岸，程控电话可直拨世界各地。柳州机场已开工修建，

将于1994年建成大型的白莲机场。此外还开辟桂柳一级公路和一批高等级公路，兴建柳江水陆联运码头和集装箱码头。而且在现有2万门程控电话的基础上再增加2万门，使柳州的交通、通信能力进一步增强，为柳州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创造更有利的条件。

柳州是广西较大的商业中心，在西南四省五方经济协作区中占有重要地位。在发展工与商、商与商、农与商联合方面，柳州市一直是走在广西前列的城市之一。近年来，先后发起和建立了15省（市）糖酒副食品集团，湘桂黔和枝柳两条铁路沿线商业经济协作区，以及一批与华东地区联合的批发和联销集团，触角遍及全国20多省（区）、43个地、市。每年全国性的一些商品洽谈会、产品展销会都在这里举办，贸易洽谈，十分活跃。柳州市的一些综合商场、农副产品以及日用工业品贸易市场，都被列为广西最大的商场和市场之一。全市建立了以国营商业为主导、多种经济形式、多条流通渠道的商业体制；形成了以城市为中心的多渠道、少环节的批发商业体系；编织起城乡畅通，地区交流，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商品流通网络。另外，柳州的夜市在国内小有名气，较大的有10余处，入夜开张，到凌晨二、三点钟才收市，有的通宵达旦，夜市上各种地方风味小吃琳琅满目，香飘四溢，令人交口称道。

“柳州有个鱼峰山，山下有个小龙潭，终年四季歌不断，都是三姐亲口传”。素有“歌乡”之称的柳州，流传着壮族女歌手刘三姐在鱼峰山唱歌成仙的神话故事。柳州人至今仍有唱山歌的古朴遗风。每年中秋节之夜，龙潭印月映峰，游客如织，歌声不绝；平日的黄昏或夜晚，都有成群的

歌手自发地在一起对唱山歌，中外游客每游至此，都被这少见的场面所吸引，惊赞这是国内少有的地方民风一绝。唐代著名的文学家、哲学家、政治家柳宗元（773—819）曾任柳州刺史，在这里度过他一生最后4年时光，此期间他积极推行善政，明显地提高了当时这个边陲城镇的开化和文明程度，深受柳州人民的爱戴。至今保存完好的柳侯祠、柳宗元衣冠墓，都是为纪念他而兴建的。柳州还享有“体操城”的荣誉，中国体操队里拥有多名柳州籍优秀选手，有“体操王子”李宁，有被称为“布娃娃冠军”的女子体操世界冠军群体的黄群、姜薇、覃奇志、许叶梅，还有技巧世界冠军曾建华和名将骆丽红。他们不仅为祖国争得了荣誉，而且为家乡柳州增添了光彩。在市委、市人民政府高度重视和关心下，在全市人民以及各有关单位的共同努力下，柳州市近年来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取得了优异成绩，自1986年以来在全区五市的“优质服务、优良秩序、优美环境”及“学雷锋、焦裕禄、王进喜等先进人物”的评比活动中，柳州市连续6年创先名列第一。1990年以来，柳州市还先后荣获“全国卫生模范城市”、“全国少年儿童工作先进城市”、“全国拥军爱民、拥政爱民模范城市”的称号。

柳州市附近的县镇乡村，山水俊美，风光秀丽，这里聚居着壮、侗、苗、瑶等少数民族，他们有着各自独特的语言、服饰、村寨建筑、民族风情和风味小吃和传统的民族节日。有苗族的芦笙踩堂舞、斗马；瑶族的婚俗、跳盘王舞、黄泥鼓舞；侗族的抢花炮、斗牛，以及壮族的盘歌、对歌，等等，构成了一幅幅浓郁的民族风情画。

柳州是国家甲级旅游城市。两亿多年前，这里原是一片

汪洋大海，后来地壳变动，海底石灰岩上升为陆地，经过风化剥蚀和雨水溶蚀，形成了发育充分的喀斯特（岩溶）地貌。因此，市区内外由石灰岩构成的奇山峻峰拔地而起，千姿百态。有的轻云萦绕，象天马腾空，有的平地矗立，宛如巨鱼跃潭；有的象孤鹤临江，有的又象奔鹿相逐……山青、水秀、洞奇、石美构成了柳州自然风光的旖旎景色，风景旅游资源十分丰富。座落在繁华闹市区的立鱼峰，平地崛起66米，山上7个岩洞彼此相通，玲珑剔透。岩洞内有许多古人的石刻题记，山脚有一泓潭水，终年碧绿，传说这里是刘三姐对歌成仙骑鱼升天的地方。柳侯公园以纪念柳宗元得名。是市中心区综合性公园，内有柳侯祠、衣冠墓、柑香亭以及思柳轩等名胜古迹。都乐岩风景区距市区12公里，占地300万平方米，由岩洞、碑林、自然风光三大景区组成。岩洞内石笋、石柱、石幔、石花千姿百态，瑰丽多彩，气势恢宏，被誉为“大自然的奇幻艺术之宫”。离市区仅4公里的大龙潭风景区，占地560万平方米，比北京颐和园还大。24座形态各异的山峰环抱着一湖二潭，这里天然植被保存完好，山幽林密，石径流清。平均温度比市区低2℃左右。分为9个各具特色的风景区，目前已开发建成雷塘胜迹区和民族风情区，侗族的鼓楼、风雨桥以及各种少数民族村寨点缀其间，堪称国内最大的山村公园。白莲洞以奇特的洞穴结构和丰富的史前堆积物著称。考古工作者在此发现了人类牙齿化石、石器和骨针，为旧石器时代晚期遗物。在这里，人们既可以观赏岩洞内钟乳石的奇姿异态，又可从洞壁上的化石了解古代的地质现象，是中国第一座兼供游览的自然洞穴博物馆。

柳州工业城并集商业、交通、文化、旅游优势于一体的、古老而又年青的柳州，在改革开放的今天，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欣欣向荣的气象。

## 我成为“国家有突出贡献技术专家”的奋斗历程

曾吉恕

我在基层从事农业科技工作已有37年。现在柳城县甘蔗研究中心工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一直在进行农作物的组织培养试验。经过十多年的艰苦努力，先后取得六项科技成果，其中四项是我实验成功的，另两项由我负责并与有关同志一道试验成功的。已获成果奖的有五项，其中蔗叶育苗法，获自治区科学大会荣誉奖；甘蔗体细胞胚性细胞团的发生和利用，获自治区科研成果一等奖；甘蔗良种桂糖11号快速繁殖和推广获市科技成果一等奖和区农牧渔业厅推广成果三等奖；甘蔗组织培养工厂化育苗研究和应用，获自治区科技进步奖二等奖；甘蔗芽器官液体培养工厂育苗新技术，获市科技进步奖一等奖。近年各地应用上述科技成果，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10年来，我曾先后被评为“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科技专家”等称号并获奖励。现简要回忆我艰苦奋斗，为农业科技事业贡献力量的一些经历。

在20年前，我从事农业科技工作也曾取得一些成果，获评为县甲等模范工作者和先进工作者。在10年“文革”期间，“四人帮”疯狂推行极“左”路线，农业科技工作和科技人员深受其害。在这期间，我虽然始终坚守工作岗位，坚持科学实验，但却被扣上走“白专道路”的帽子，家也被抄了，

我搞了多年试验的资料也被抄走和损失了，致使一些正在进行的科研课题无法正常进行。但我还一直是热爱自己所从事的农业科技工作，潜心农业科学实验研究，渴望能为祖国的农业科学事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粹粹“四人帮”后，在党的关怀下，科学的春天又到来。我继续进行艰苦的奋斗。由于农业科学实验周期较长，需要长期坚持不懈的研究，有些项目要坚持一年、两年或者更长时间。这当中不论星期天还是节假日，几乎天天坚持工作。不知度过多少个不眠之夜，每日工作时间常达10小时以上。不少实验还是在工余时间自觉进行的。因为星期天和工余时间进行实验工作，一般是没有任何加班报酬的，没有自觉性是不行的。

从1976年起，我开始从事植物组织培养实验。当时实验条件十分困难，一缺资金，二缺资料，三缺设备，四缺实验室。在没有具备基本条件的情况下，如何开展研究工作呢？我自力更生，自己买了几个小三角瓶，带到柳州地区农科所作这一实验。得到有关同志的支持。后来，县农业局专门给一间小房子（约 $10\text{M}^2$ ）供我作实验室。由于当时没有实验经费，我只好向兄弟单位借来接种箱和手提高压锅，自己还得亲自动手制作必要的设备，如没有恒温箱就自己做，没有培养室就自己动手用塑料薄膜搭一个露天培养室。有的同志称它为“蒙古包”。炎热的夏天在这样的培养室进行观察和工作是十分艰苦的。因为白天温度高达 $40-42^\circ\text{C}$ ，汗流浃背，就是培养物的生长也受到一定影响。除了工作艰苦外，还要经受住一些人的冷嘲热讽和流言蜚语的打击。由于当时自治区内的县级基层单位基本上还没有开展这项课题的研究工作，一般均由地市级以上的科研单位和农业院校进

行。所以有的人说我是“饿狗想吃天鹅肉”。有的说我做这些“蒙古包”是“曾氏博物馆”（意思指这些东西没有实用价值）。所有这些，我都力从思想上排除干扰，决心坚持下去，设法把实验搞好。起初我搞水稻、小黑麦的花粉单倍体育种实验，获得水稻花粉绿色植株1千多苗和小黑麦花粉绿色植株数10苗的成果，获得79个水稻花培株系供大田鉴定。县委、县政府十分关心我的试验，县委几个主要领导同志多次到现场检查指导工作。由于我县是甘蔗产区，当时糖厂常常“吃不饱”，县领导希望我研究一下甘蔗。因此，从1977年1月开始，我就进行了甘蔗组织培养的研究。过去我县一般在4至5年就有一次霜冻，一遭重霜，蔗种就受冻害甚至成灾。当时我县曾因此多次到广东大量调运蔗种。这样，国家不但为蔗区补贴很多运费和蔗种损失费，而且由于需蔗种量大，每亩需种苗0.5吨，几万亩蔗地需种苗一、两万吨。尽管大量调进，种植计划仍远远不能完成，同时也造成地方财政、糖厂和农民各方面受到很大损失。如1975年重霜冻坏甘蔗41495亩，坏死蔗芽3节以上的12448亩，能够留种面积仅179亩，损失9百万元左右。为此，我想党和政府之所想，急农民之所急，决心致力于研究甘蔗组织培养，以加速甘蔗良种繁殖推广和解决蔗种问题。

根据植物细胞“全能性”的理论，我首先做了不同器官、不同品种、不同方法的诱导试验，后来获得甘蔗叶育苗法试验成功。柳州地区农科所情报室首先以《柳城甘蔗组织培养取得重大进展》为题报道这项成果。消息传开后，蔗农很感兴趣，很多蔗农前来参观和学习蔗叶育苗法。一些地、县兄弟农科所的科技人员也先后到我处参观指导，我毫无保

留地向他们介绍具体作法，还亲自操作示范，耐心介绍，直到他们能完全弄懂为止。他们回去按这个方法做，同样取得成功。有的还在报刊上介绍经验。对此我也感到高兴，受到鼓舞。但是，我并不为此满足，又进一步精心研究。我发现，虽然蔗叶育苗法作选育优良品种有一定作用，但这种办法得到的数量还不多，仍不能适应大田生产大面积种植的要求，于是我又进行细胞育苗的探索性研究。这项实验的根据是：(1)甘蔗细胞有可能通过人工培养而达到繁殖的目的；(2)植物细胞是全能性的，因此，甘蔗细胞也潜在着诱导出绿苗的可能性。过去我曾做过农业微生物的试验研究，设想通过液体培养，象细菌那样繁殖大量的细胞。由于对愈伤组织结构不了解，对其发展变化规律还未弄清楚，因此，开始试验就遭到失败。失败不灰心。后来经过反复试验和细致观察，发现甘蔗愈伤组织有两种显然不同的类型：一种是球状颗粒型，一种是透明光滑型。它们不但外部形态不同，而且细胞结构也是不同的。第一种类型的细胞排列整齐而紧密，很有规律。第二种类型的细胞大小、长短不一，而且游离细胞较多。我将它们挑选出来分别培养，结果第一种类型的愈伤组织不但繁殖速度快，而且分化频率高，根苗生长也较协调，而第二种类型分化频率低。实验证实了甘蔗球状颗粒型愈伤组织除了通过不定芽成苗外，还可通过胚状体成苗。经过一段时间的不断试验研究，到1977年7月，我通过筛选，获得“一”、“八”、“九”三个胚性细胞无性繁殖系，并成功的用于大田生产，加速甘蔗优良品种的繁殖。这类研究当时在国际科技报刊上尚未见到报道。各级党委、政府都比较重视这项研究，国家科委和自治区科委拨款54万元在我县建立甘

蔗组培苗中试工厂。这是我国第一座甘蔗组培苗中试工厂。这项研究成果获1979年度广西科技成果一等奖。这一研究成功，为我县甘蔗组培苗工厂化生产良种甘蔗苗奠定了基础。

1978年春，我还在甘蔗组培苗圃里首次发现组培苗可以形成仅有笔杆那么细的蔗茎，它具有饱满的蔗芽，成茎率极高。我将这些小茎剪下，在营养钵里试种获得成功。当年作了夏植蔗对比试验，证实第二代（组培种茎）比第一代（组培苗）茎径增粗百分之二十六，为后来应用组培苗作为苗圃生产组培种茎打下基础。

为了进一步运用这些成果，我和广西甘蔗组培苗研究协作组合作，又成功地完成了甘蔗胚性细胞团生产组培苗及其性能和利用的研究，并获得国内同行专家一致好评。他们认为，以少量蔗梢心叶培育出大量组培苗，即繁殖种茎应用于大面积生产，至今国内外尚未见报道。用培育组培苗和繁殖组培种茎相结合的二级育苗法繁殖甘蔗良种，1年繁殖的系数达4万倍以上，可缩短良种的推广时间，这是解决秋植蔗种苗来源的有效途径。这种方法在国内还属首创。据有关部门统计，运用这项技术快速繁殖甘蔗良种桂糖11号，仅3年时间全区就推广50多万亩，使推广时间由6至8年缩短为3至4年。组培繁殖桂糖11号的蔗茎产量比当家品种台糖134增产27.4%，蔗糖份含量平均增加1.03%（绝对值），其中柳城县采用上述新技术快速繁殖推广桂糖11号良种的共12万多亩，占全县甘蔗种植面积90%以上。由于早熟、高产、含糖量高、抗寒力强，改变了我县“一年重霜后，三年难翻身”的历史面貌，而且连续10多年甘蔗种苗能自给有余，还支援外地几万吨蔗种和几百万株组培苗，推广到河南、河

北、湖南、湖北、贵州、广东等19个省和30多个市县。取得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仅卖蔗种一项，柳城县蔗农就增收两百多万元。成为国际上首次组织培养甘蔗生产大规模应用的实例。

在这基础上我又进一步研究，发现利用甘蔗胚性细胞团固体育苗法，仍然是工序较多，成本较高。为克服这些缺点，我又自行开发研究甘蔗芽器官液体培养工厂育苗新技术，结果获得成功。采用这项新技术繁殖甘蔗组培苗不但继代能力强，繁殖速度快，植株健壮能获得品质较稳定的组培苗，还具有节省劳力、节约原料、降低成本等优点。1985年通过自治区级技术鉴定，被专家们一致确认：这在国内外是一项创造性的新技术，处于领先地位。这项技术在1987年被编进《中国技术成果大全》一书，获国家科技成果登记。近年来运用这项技术，为广西实施甘蔗“1105工程”提供了一批早熟、高糖、高产甘蔗良种的组培腋芽苗和腋芽组培种茎，取得良好的效果。

为了推广应用以上科技成果，我还通过多种途径，先后培训科技人员及农民技术员达3百多人次。并在专业刊物上发表有关论文及科技文章20篇，其中发表在全国性专业刊物7篇，省级刊物9篇，其他刊物4篇，其中1篇获广西优秀科普作品二等奖，两篇获市优秀论文一等奖。在国际上如美国、日本、古巴等国的同行专家教授曾多次来信索取资料，对学术交流和科学普及起到一定作用。

这些年来，我在甘蔗组培育苗工厂化的试验研究中能够取得一点成绩，是和各级党委、政府以及有关部门的支持和帮助是分不开的。我只不过做了自己应该做的工作，党和人

# 我从平凡到科技“拔尖”的二十八年

张达俊

我是广东省人氏，现在柳江造纸厂工作。1964年我以毕业设计100分成绩毕业于广州市华南理工大学制浆造纸专业。还在学生时代，我就有为祖国的造纸事业献身的抱负。参加工作以来，我已经历28年艰苦的历程了。

大学毕业后，我没有任何选择，完全服从组织分配，来到吉林省造纸工业公司工作，地点在长春市。虽然这里气候寒冷，生活不习惯，但组织的需要，我别无二言。到岗位后，领导征求我的意见，是留在机关还是到企业工厂去。我选择后一个工作。我想，只有到生产第一线去，才能锻炼提高自己，才能更好地把书本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我第一年的生

---

民都给予我很高的荣誉和奖励。1983年获自治区人民政府授予广西劳动模范称号，同年又获国家民委、国家劳动人事部、中国科协给予少数民族地区先进科技工作者奖；1986年获国家科委批准为国家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科技专家；1989年获自治区人民政府授予广西先进工作者称号，同年又获国务院授予全国先进工作者称号。这使我深受感动和鼓舞。我深深感到在科学事业的领域中有很多知识自己还不懂，我决心继续不断地学习，刻苦钻研，努力完成上级交给的科研任务，不辜负党和人民的期望，为发展农业科技事业，为振兴中华贡献更大的力量。

产见习是在吉林省北面白城市造纸厂。那里盛产芦苇，但地域很荒凉。我和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在“三同”和生产实践中，倾听工人们意见。我用书本理论联系本厂实际，细心调查研究，发现该厂漂白车间的贝尔曼式漂浆机蒸汽加热部位的设备欠佳。我大胆提出了改进的合理化建议，得到厂部采纳，还派了3名师傅与我配合搞技术改造。经过一番功夫，终于取得成功，使漂白池的温度分布均匀，节约了蒸汽，降低了氯耗，纸浆质量提高了。厂部予以鼓励，并广播宣传。1965年10月，我为期一年的生产见习就要结束，时值吉林省梅河口造纸厂即将进行扩建、改造。根据我的要求，组织上分配我来到梅河口造纸厂工作。

我到梅河口造纸厂后，安排在生产科工作，并任命我为技术负责人。在深入生产第一线中，我看到厂部的科学管理工作很薄弱。在厂领导的支持下，我制订了生产工艺技术的标准和岗位安全责任制，得到厂部采用，从而加强了科学管理，提高了生产水平。1966年正当本厂日产30吨牛皮箱板纸扩建工程开始的时候，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一夜之间几乎全厂所有的工程技术人员都成了“牛鬼蛇神”，唯独我不受冲击。因为我一心扑在生产上，又不参加任何一派。大家很信任和支持我。厂长被打成“走资派”后，大家推我出来支撑全厂的生产和工程的扩建工作。我未做过领导，但有一颗搞好造纸事业的责任心，全厂职工一齐支持配合。在“文革”不正常的情况下，大家共同克服了各种困难。经过几年的共同努力，梅河口造纸厂日产30吨牛皮箱板纸的扩建工程终于竣工，于1972年正式投产。

我走上工作岗位的28年中，从不放松对科技的追求和攀

登，就是在“文革”大批“洋奴哲学”的日子里，我也一直偷偷地阅读钻研中外文科技资料。偶尔到外地出差，有时间就逛到书店去。当时在“读书无用论”的影响下，有人把“洋”书、科技书当作废纸卖，我从旧书摊中用很低的价钱买到不少有价值的关于造纸技术的外文书刊。我乐在其中。我潜心苦读，坚持作笔记，加上外出学习参观时细心向别人学习请教，对别人的经验技术，我一一详细记下，因此，我的笔记本写得满满的，放在口袋里常翻阅，把它作为事业成功的基本功。

1974年我调到柳江造纸厂工作，当年4月到柳州市报到，组织征求我的意见，我表示一切服从分配。当我到达柳江造纸厂时，正是厂准备开机生产，领导安排我在生产调度室工作。1年后（1975年）又抽出来，让我负责全厂的技术更新改造工作。为使全厂的生产得到平衡，添平补齐设备，我经常借外出开会之机到外面收集技术资料，还在外面画图回来，以改造厂的某些薄弱环节，这对于促使生产正常发展，逐步扭亏为盈，起到了较大的作用。本厂1974年开机生产以来年年亏损，直到1978年才转亏为盈。

在厂的领导下，我决心和全厂职工共同努力，不断开创工作的新局面。厂领导予以信任并交给更重要的任务，柳江造纸厂的“六·五”、“七·五”、“八·五”、“九·五”生产技术及科技发展规划，全部交由我起草，并经组织讨论上报。过去、现在柳江造纸厂的生产、科研与发展，基本上是按照这些规划实施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柳江造纸厂贯彻改革开放的方针。在厂的领导下，我大力发挥自己的潜力和作用，大胆进

行技术引进工作，从1984年至今，我负责联系并先后组织10个国家20多个公司的外国专家前来本厂进行技术交流，引进国外的高科技、高技术理论（并组织出版专辑），使全厂的工程技术和工程技术人员、工人的知识得到更新。1984年我曾到芬兰、日本等国进行技术考察，并担任主谈判，引进新技术、新设备，对我厂3940毫米纸机进行技术改造，使纸机抄速提高到600米/分。引进的顶网BeL—Form是80年代末国际的先进生产设备，对我厂产品由凸版印刷纸升级为胶印书刊纸，产量由日产80吨提高到日产160吨起到很大作用。从1988年起，我厂每年实现税利1800万元。1989年胶印书刊纸获国家轻工业部优秀新产品奖，1990年获自治区、柳州市优秀新产品奖。我担任主谈判，引进板式外流降膜蒸发器和1180MICRO计算机自控系统，为企业降低成本，提高质量创造了良好的先决条件。这在全国造纸行业中是率先对外引进的一项高新技术设备，为造纸行业作出贡献。

1987年本厂纸机第一期改造工作完成后，纸机生产能力扩大，制浆能力偏小，厂部研究由我主管二期改造扩建工作，我又致力攻关扩建日产100吨全漂白化学木浆的工程项目。这是以自己的生产顶进口项目，填补了国内的空白。目前中国大陆依然无法生产全漂白化学木浆，每年要从国外进口40万吨才能满足造纸工业需要。我们研究，要利用广西盛产的马尾松木材为原料，引进先进设备和技术进行生产。从1987年起，由我起草了项目建议书，而后，我又带领有关技术人员，先后跑到南宁、北京等地有关部门申报。几乎跑遍了区内林场进行林业资源勘察，并作设计工作。我和二期办的同志经过几年的共同努力，先后完成了项目的可行性论证、

环境保护论证、扩初设计和组织筹措投资等一系列工作。至1991年11月5日，国务院以国生技改（1991）71号文批准这一项目后，我厂日产100吨全漂白化学木浆工程项目正式开工。

在上级和本厂领导关怀下，为了进一步对外引进技术，我和厂长于1992年2月参加我国代表团到瑞典、芬兰、加拿大进行技术考察。1992年4月至5月，在北京与外国专家进行技术和商务谈判，我依然担任主谈判，又引进二氧化氯制备生产线和二氧化氯漂白防腐洗涤设备。1992年5月25日至6月12日，我随田纪云副总理率领的北欧采购团到芬兰举行签字仪式。我担任这一工程的技术总负责，进行了一系列艰苦复杂的工作。

目前我国的造纸技术还有许多难关，全漂白化学木浆不得不依靠进口度日。作为一个造纸工业的工程技术人员考虑到这些问题，倍感责任重大，科技竞争，时间紧迫，因而必须争分夺秒，加紧工作。20多年来我不度季节假，十几年来从没看过一场电影，没请事假，甚至病了也不请假。1976年我父亲在广州病逝，当时我在南宁抢时间为我厂新建三个大浆池项目，却没有回去奔丧。平时，晚上也作为白天用起来。有的青年工程技术人员问我：“张总，你为什么要作出那么大的牺牲？”我说：“我的时间是有限的，事业是永恒的，只有挤出更多的时间，才会换来永恒的事业。为了民富国强，再苦再累也甘心。”

我从1982年起，承担了国家科技攻关项目“柳桉、柠檬桉速生丰产林培育技术及其应用研究”和“9年生柠檬桉硫酸盐法漂白全桉木浆抄胶印书刊纸”两个项目，经过我和大

家共同努力，现已完成。于1991年4月经国家科委组织全国有关专家进行鉴定结果，两个课题均评定为属“国内首创”，国内领先水平。

其中柳桉、柠檬桉速生丰产林培育技术是利用广西亚热带地区的优势，在来宾县维都林场开辟八千亩林地，从1983年起，经过数年的试验、培育，至1989年已成为造纸用材林系列，并整理了整套的技术数据和经验。这一科技研究成果，获柳州市1991年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同时，用9年生柠檬桉组织中间生产试验，用硫酸盐法制浆、漂白，终于获得全桉木浆生产胶印书刊纸成功，得到广大印刷厂用户的热烈欢迎和好评。经全国有关专家评定，均达到“国内首创，国内领先”水平。本人获柳州市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1992年被评为柳州市首批科技拔尖人才。多年来，我在全国造纸行业和其他报刊上发表有关制浆造纸论文共11篇，其中有《竹子制浆及其在高速纸机上的抄造》和《影响马尾松漂白硫酸盐浆的重要因素》及《板式降膜蒸发器试机过程和自控仪表的特点》在中国造纸学术会议评为优秀论文并获奖。

我现任中国造纸学会碱法草浆专业委员会常委、广西造纸学会副理事长等职。我还负责主办《造纸学习》、《广西造纸》定期刊物，这在全国造纸行业中交流和发行，对推动造纸事业的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

我虽然取得一些成绩，但与事业的要求，和自己的愿望差距还很大。任重而道远，我决心再接再厉，攀登不歇，攻关不已，为造纸事业、为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大的力量。

# 柳州市第一家中央投资 企业忆述

庞成口述  
盛德萱记录整理

解放前我是柳州大生盐业公司的小职员，也是参与少量资本的小股东。柳州解放后，我们响应市委和市政府关于艰苦奋斗，克服困难，大力恢复和发展工商业的号召，1951年我们几家大盐商，即时和行、永昌行、均泰行、福记行、永生盐号等合并起来，组成私私联营的大生盐业公司。这是柳州市工商业私私联营最早的一家。共有资金7亿5千万元（旧人民币，折合新币7万5千元）。联营后推动了生盐经营的发展。

为了贯彻执行党和政府提出“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繁荣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联营大生盐业公司面向乡村，把大量食盐送到柳城、柳江、来宾等县城镇乡村出售，受到当地政府和群众的欢迎。工作顺利，业务发展很快。“五反”运动后，根据当时的情况，政府又号召批发商业转向工业。联营大生盐业公司即将全部资金和人员转入利民五金厂。该厂主要是生产五号煤油灯头（当时郊区及农村人民普遍点煤油灯照明），产品由五金公司包销。产品销售到各县乡镇和农村。到了1956年，全市进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年底实行全行业的公私合营。我们利民五金厂和云桂电镀厂、吴松昌电镀厂、羊义兴翻砂厂等几间小厂与永丰利刀片厂合并，成立了公私合营永丰利刀片厂。当时的生产设

备仅有5台小冲床和4台车床，职工80多人，承接电镀和加工另件，产品只有刀片和锁头，生产过程大部份是手工操作。而厂里只有工程师史国明1人（原私营永丰利刀片厂的创始人之一）搞过几十年制刀片热处理参炭，有较丰富的制刀片经验。公私合营后，史国明同志日夜钻研，大胆创新，用低钢板铺上小块合金，附在刀片的切口上，经过锻炼处理后，不但刀片锋利耐用，而且降低了成本。他和大家刻苦钻研技术一年多时间，刀片质量显著提高。经过检测，超过英国，赶上美国。而且刀片的品种也逐步扩大，生产出各种机械刀片，如各种规格的切纸刀片、圆刀片、切烟丝刀片、打浆机刀片等。产量也年年增加。产品行销到全国20多个省市，供不应求。那时厂里供销工作由我负责，供销任务也很艰巨。为了保证原材料和产品推销，我不辞劳苦走南闯北，年年月月完成供销工作任务。原在小南路的厂房较小，为适应生产的发展，经市政府批准，在市郊五里卡建立新厂房和车间。

当年中央轻工部、文化部、印刷设备材料公司得知我厂的刀片质量在很短时间内超英赶美的消息后，便向全国各省（区）、市和厂、矿、企业发出通知，要求尽量使用国产柳州市永丰利机械刀片。过后不久，全国各地厂、矿、企业纷纷来函来电订购，很多单位还派人来厂签订长期供应合同。到1956年8、9月间，中央轻工部马处长来厂视察，在厂里住了几个月，详细了解厂房设备、技术力量、生产能力、原材料来源、经营管理、发展潜力和领导及干部工人的雄心壮志等方面的情况。经过论证后，马处长回部经过再研究，于1956年4月即通知我厂派人到部里商讨。5月间我厂派工程师史国明和副厂长庞成到轻工部，受到部里热情接待。经部里商

量，决定大力支持我们，由轻工部拨给我们资金60万元，以扩大生产。到1973年，国家又增投资金40万元，改造了热处理车间和设备。经过全厂工程技术人员不断的钻研和全厂职工的共同努力，产品质量更上一层楼，获得用户一致好评，在全国刀片评比中名列第一。时隔不久，又接轻工部通知，继续增拨资金60万元，增添设备，扩大生产能力，由轻工部增拨300吨65锰钢板指标，并指定我厂产品保证供应中南区6省、西南区3省，还指定由四川重庆钢铁公司与我厂签订供应合同，保证我厂生产所需的钢材。这是柳州市第一家获中央投资的企业。

中央的重视和鼓励，全厂职工受到很大的鼓舞，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不久又研制成功051油锯链条。经过试产质量检测，达到部颁标准，销售面越来越广，厂的信誉卓著，影响很大。不久北京刀片厂、大连刀片厂等派人到我厂学习培训，还经常派技术人员、干部、职工来厂学习，互相交流经验。1969年厂扩建了几个车间，新建几幢职工宿舍大楼，职工增加到400多人。但产品仍是供不应求。当时每年上缴国家税利已达100多万元。1970年以“母鸡生蛋”方式，分出链条厂和量具厂。由于原来厂址不敷，便将链条厂迁到箭盘山附近，量具厂建在刀片厂旁边。当时厂长是冯锦织。3个厂的职工已发展到1300多人，新增了很多机械设备，每年上缴税利增到1000多万元，3间厂均达到中型企业规模。

永丰利刀片厂在解放初期是开设在河南鱼峰路一带仅有几间小房的一家小作坊，由史国明师傅带着几个工人和学徒，以手工操作生产切纸刀片，当时仅能维持现状。经过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不断地引导扶持，从无到有、从小到大、逐步发展起来的。这一成绩应归功于党的领导，是历届厂的干部职工团结奋斗的结果。

# 柳州彩调剧《刘三姐》的 创作和演出

庞邵元

传说，在广西壮族民间有个勤劳勇敢、喜歌善唱的壮族女歌手刘三姐，她在柳州鱼峰山鲤鱼岩里唱歌成仙，然后骑鱼登上青天。对此，壮乡人民历代广为传唱着一首山歌：“柳州有个鱼峰山，山下有个小龙潭；长年四季歌不断，歌仙美名天下传。”

在50年代，柳州市文艺界根据这个传说，创编了彩调剧《刘三姐》。市彩调团将它排练，先后在市、区内及湖南、湖北、四川、云南、广州、上海等省市演出，我市的部份创作演出人员还参加广西《刘三姐》剧团赴香港、新加坡演出。该剧的创作和演出引起很大轰动，至今海内外仍享誉不衰。笔者当时是柳州彩调剧团的一名演员，曾参加过一段较长时间的演出活动，现回忆记述如下：

柳州市彩调剧《刘三姐》的创作始于1958年底。那年，柳州市副市长黎达愚在市长接待室里召开了一个座谈会，参加座谈会的有市委宣传部副部长邓凡平、市文化局副局长牛秀、地方老者和有关人士陈显扬、肖泽昌，剧作者龚邦榕、陆国灿、曾昭文等人，会上商讨我市拿出什么剧目到自治区参加国庆10周年献礼演出。经研究，大家认为，献礼剧目必须是具有柳州地方特点、壮族特色、有代表性的题材，要从

柳州地方历史、民间传说中找出有价值人物故事来，如刘古香、蓝生翠、张翀、李文茂、侬智高、刘三姐、柳宗元等。最后确定，创作戏剧桂剧《蓝生翠》、粤剧《李文茂》、彩调剧《刘三姐》，作为献礼剧目。《刘三姐》由市文化馆创作员曾昭文负责编剧。曾昭文接受任务后，在原来掌握刘三姐传说素材的基础上，再深入收集资料。他到鱼峰山拜访老和尚慧师傅，召开柳州民间歌手李二姐（李春华）、黄二娘（黄琼珍）、韦伯（韦成勋）、熊坤山等人的座谈会。在收集大量素材之后，进行构思，确定剧本《刘三姐》是以歌颂壮族女歌手刘三姐用山歌来歌唱劳动、赞美生活、痛斥邪恶精神，以反抗封建统治为主题，突出她喜欢和善于唱山歌的特点，用山歌来与财主莫怀仁作斗争为主线，安排了洗衣、定计、歌圩、说媒、对歌、砍藤、遇救、报讯、成仙等场次。这是第一稿本。交由柳州市彩调剧团排演。

1959年3月，柳州市和柳州地区联合在市河南剧场举行专业文艺汇演。市彩调团的《刘三姐》首次参加汇演。《刘三姐》编剧兼导演曾昭文。音乐设计黄友琴、叶春旺，舞美设计陆俊杰。由何佩云饰刘三姐、林秀发饰李小牛，黄松林饰刘二，罗善林饰老渔翁，张文君饰兰芬、庞绍元饰亚木，林章华饰莫怀仁，秦顺治饰莫进财，宁木保饰陶先生，樊桂连饰李先生，唐茂坤饰罗先生，李玉琼饰媒婆，等等。

这次汇演，共有两个剧种的《刘三姐》参加演出，一是柳州市彩调剧《刘三姐》，二是宜山桂剧团的桂剧《刘三姐》。汇演后大会评议组举行评议，大家认为柳州市彩调剧《刘三姐》的剧本和演出都有一定的质量，基础较好。还认为，用彩调的表演形式较之桂剧更适合于塑造刘三姐反对

封建统治的性格。因而大会决定进一步加工整理彩调剧《刘三姐》，以该剧代表柳州地、市参加全区向国庆10周年献礼汇报演出（彩调剧的《山区巨变》（现代戏）、桂剧《蓝生翠》、粤剧《李文茂》也作为献礼剧目同时参加全区汇报演出）。会后由龚邦榕、吴嗣强、熊枫凌组成导演组，进行加工排练，把演出水平提高一步。

4月，区文化局在南宁举行向国庆10周年献礼剧目汇报演出大会。柳州市代表团在艺术剧院汇报演出的《刘三姐》，受到与会代表和社会的关注。演出后会刊和《广西日报》分别发表了专题评论文章。大会举行报告会和座谈会，剧作者曾昭文在大会上作了创作彩调剧《刘三姐》的体会发言。从北京专程到南宁来观看演出的著名剧作家贺敬之、中国戏曲研究院院长张庚、还有郭启宏同志，观看演出后非常高兴。座谈会上，张庚说：“这出戏的地方色彩和民族特点非常浓郁鲜明，形式新颖，故事优美动人。”郭启宏说：“这出戏就是这样拿到北京演出，就足以把北京观众迷住了。”区文化局副局长郭铭说：“这就靠你们的帮助和大家进一步努力了。”贺敬之说：“在这良好的基础上，要把刘三姐的形象塑造得更丰满，要深刻阐明《刘三姐》的社会意义，突出剧中人物性格。”他要求我们进一步把剧本修改好，送上北京，他亲自组织专家讨论研究。

返柳后，市文化局派市戏剧工作室龚邦榕及市文联秘书长黄勇刹与曾昭文共同修改，写成了第二稿本。由于在人物的增删上有一些意见，这一稿本并未付诸排练。

中共柳州市委十分重视这项工作，5月间决定组成柳州市《刘三姐》创作小组，对剧本进一步修改提高。创作组成

员：邓凡平、牛秀、黄勇刹、曾昭文、龚邦榕。区党委宣传部副部长葛震专程来到柳州，在柳州饭店召开创作组座谈会，会上他对《刘三姐》的修改问题作了指示：要排除外来干扰和思想障碍，勇于探索，大胆创新；要坚定不移地运用民歌，并创作出更好的民歌来编好《刘三姐》；要正视缺点，发扬优点，把《刘三姐》创作演出水平更大的提高一步，编写出更完美的《刘三姐》来。

7月，创作组完成了以歌圩、定计、说媒、对歌、禁歌、出走、成仙等场次设计的《刘三姐》第三方案稿本创作。一面交由剧组排练，一面由牛秀、黄勇刹、吴超凡带剧本上北京，交贺敬之、张庚组织专家讨论，征求意见。

7月19日，中国戏曲研究院院长张庚及罗合如同志，分别会见我市3名作者，听取了关于《刘三姐》修改情况汇报。

7月22日，《剧本》月刊在中国文联茶馆召开彩调剧《刘三姐》（第三方案）剧本座谈会，由贺敬之主持。到会的有中国剧协秘书长孙福田、《剧本》编辑部主任严青、编委凤子、范溶、诗人剧作家乔羽及田川、任萍等11人。讨论中专家们对剧本作了充分的肯定，也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诗人任萍说：“彩调剧《刘三姐》歌颂爱情的诗多么令人陶醉；歌颂劳动生活的诗多么富有南国风光；讽刺财主和那几个秀才的诗多么深刻和痛快；对歌发展到高潮时，三姐质问秀才‘你的鼻梁有几斤’又是多么淋漓尽致！这个剧本，仅作一首长篇叙事民歌来看，就已是美不胜收了。”孙福田同志说：“我看完《刘三姐》剧本，兴奋得一塌糊涂！”严青同志说：“我们好久没有收到这样好的稿子了，这次看到《刘三姐》剧本很兴奋。刘三姐淳朴、善良、勤劳、勇敢、

能歌善唱，富有反抗封建统治的精神，剧本中塑造的这一形象很有感染力。对歌和禁歌的场面很精彩，社会意义也很深刻。”贺敬之同志说：“在某种意义上讲，彩调剧《刘三姐》的修改本，打破了中国民歌的沉寂局面。这不单是广西文艺创作的收获，也是全国文艺创作的收获。”

在缺点方面，专家们认为，戏剧性不够强，特别表现在如何把丰富的民歌给予戏剧的形象化，也就是把歌变成戏，把戏和歌结合得天衣无缝，这点尚嫌骨多肉少；细节的描写很少，如抢兰芬的那场戏，尚嫌简单化，还留有从概念出发来写人物的斧迹，而且兰芬这条线后来断了，但又没有交待；整个戏的发展尚嫌平稳，刘三姐反抗财主的歌一般都比不上《对歌》那场戏艺术性强；小牛性格不突出，形象不鲜明等等。最后，贺敬之请乔羽、严青同志具体协助修改。

8月中旬，中国剧协组织诗人乔羽、导演周星华、音乐家舒铁民随同牛秀等来柳，帮助修改《刘三姐》。他们到柳后，首先与《刘三姐》的作者到宜山、罗城、柳城等地方去熟悉生活，看群众对唱山歌，收集山歌素材，然后集中在柳州饭店讨论修改剧本。

8月14日，修改后的彩调剧《刘三姐》（第三方案）由柳州市彩调剧团在柳州剧场进行首场演出。这是一个从剧本到导演、表演、音乐、舞台美术各方面都较为完整的方案。全剧以唱山歌作为塑造人物性格的主要手段，塑造了一个勤劳善良、聪明美丽、出口成歌的歌仙——刘三姐形象。表演方面，以彩调行当的旦、丑、小生、摇旦的表演技巧为基础，如媒婆过场，运用摇旦的扭步、亮相和团扇、手帕，青年男女歌伴上山砍柴走的矮步扇花，三姐与李小牛定情用的

彩调双人扇花舞蹈身段及绣球舞等，把民间舞蹈艺术融汇于戏中，增添了民族色彩。音乐方面，把广西民歌与彩调音乐融合起来，对于彩调音乐的革新与发展的尝试，取得较好效果。

彩调剧《刘三姐》（第三方案）的工作人员，导演组是：龚邦榕、吴嗣强、熊枫凌；音乐设计组是：黄友琴、周志强、叶春旺；舞美设计组是：陈惠琪、何格培。演员由何佩云、蒙敏珍饰刘三姐，庞绍元、陈锦文饰李小牛，黄松林饰刘二，张文君饰兰芬，罗善林饰老渔翁，黄克饰莫怀仁，秦顺治饰莫进财，宁木保饰陶秀才，林章华饰李秀才，吴发书饰罗秀才，韦秀荣饰王媒婆，等等。

8月29日，彩调剧《刘三姐》在南宁区人委礼堂首次为来我国访问的蒙古人民共和国主席泽登巴尔招待演出。这场戏除何佩云饰刘三姐、庞绍元饰李小牛外，其他人物原饰演者不变。

8月30日，在区人委礼堂为招待广西壮族自治区三级干部会议代表及区文艺界人士演出。

10月中旬，在南宁明园饭店礼堂向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班禅·额尔德尼作汇报演出。

12月22日，在区人委礼堂向广西壮族自治区首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全体代表和区政协一届二次会议全体委员及特邀人士汇报演出。中共中央委员、原广西省主席张云逸、国家民委领导人谢扶民观看了演出。

彩调剧《刘三姐》（第三方案）在市内外和区内外演出后，反映很好，影响很大，全广西掀起了群众性演唱《刘三姐》的热潮。全区众多农村、城镇、机关、学校、工厂、农

场、直至幼儿园，都纷纷排练演出。前来剧团找要剧本和要求去辅导的单位连续不断。剧团演出到那里，就应邀辅导到那里。如在9月至12月这段时间中，剧团先后到南宁地区和柳城、融安、融水、忻城、柳江、鹿寨、来宾等县为县四级干部会议演出，并同时辅导各县业余剧团排练《刘三姐》。

1959年8月中旬，《剧本》月刊发表《刘三姐》（第三方案）第四场《对歌》，编剧署名：邓凡平、牛秀、黄勇刹、曾昭文、龚邦榕。

8月下旬，《广西日报》全文连载《刘三姐》（第三方案）剧本。

从8月29日起至9月14日止，《柳州日报》全文载《刘三姐》（第三方案）剧本。编剧署名：邓凡平、牛秀、黄勇刹、曾昭文、龚邦榕、吴嗣强、吴超凡、廖剑鸣、章文林、黄文祥、熊枫凌集体创编。邓凡平、牛秀、黄勇刹、曾昭文、龚邦榕执笔。

12月，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出版社出版《刘三姐》（第三方案）单行本。1960年7月和1964年1月，先后增印10万册。第三方案剧本编剧署名为：《刘三姐》整理小组集体创作。执笔：邓凡平、牛秀、黄勇刹、曾昭文、龚邦榕。

1960年，《诗刊》8月号刊登题为《〈刘三姐〉（歌剧拔萃）——“对歌”》一文。署名为广西《刘三姐》剧本创作组。

1960年1月，柳州地、市文化局联合举行《刘三姐》汇演大会，计有柳州市彩调团、柳城、柳江、鹿寨、融安等14个地、市、县文艺代表队参加演出。

1960年2月，彩调剧《刘三姐》在南宁明园饭店向周恩

来总理汇报演出。陪同周总理观看演出的还有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同志。这次演出是以第三方案为基础，把7场戏压缩为4场，增加序幕和尾声。由郑天健、江波、龚邦榕、吴嗣强组成的导演组排练。剧本由导演组和柳州《刘三姐》创作组共同修改。演员以柳州市彩调团为主，同时区文化局还抽调了百色、南宁、桂林等地，市扮演刘三姐的演员及广西彩调团的一些演员参加演出。刘三姐一角由何佩云（柳州市彩调剧团）、马若云（南宁市）、李长榕（百色地区）、邓孟琼（桂林市）、张丽贤（百色地区）分场饰演，庞绍元饰李小牛，黄松林饰刘二，罗善林饰老渔翁，张文君饰兰芬，黄克饰莫怀仁，秦顺治饰莫进财，宁木保饰陶先生，林章华饰李先生，吴发书饰罗先生，韦秀荣饰王媒婆。演出结束后，自治区领导韦国清、伍晋南、葛震陪同周总理、陶铸上台接见全体演出人员并一一握手，鼓励大家把《刘三姐》修改得更好、演得更好，还合影留念。

同月，广西电影制片厂来柳拍摄《歌圩》、《定情》、《对歌》三场片断，编入新闻纪录片《广西十年》中文化艺术成就部份。

陶铸同志在南宁看了《刘三姐》演出后，很感兴趣，给予好评，随即邀请柳州市彩调团带《刘三姐》到广州访问演出。他委托广东省文化局主办。这是柳州市彩调团自建团以来第一次赴省外访问演出。柳州地、市领导非常关心和重视，抽调了柳州地区各县《刘三姐》剧团和柳州市桂剧团的部份演员，与柳州彩调剧团共同组成了有120多人的队伍。经过一段时间的排练和准备，于1960年3月下旬乘车赴穗。

演出团团长为邓凡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编剧），副团

长阮保和（地委宣传部科长）、黄保强（柳州地区《跃进日报》社社长）、周志强（柳州市彩调团副团长、作曲）、秘书长祝景炎。编剧曾昭文。导演组成员有龚邦榕（执行、编剧）、吴嗣强（市文化局戏剧研究室副主任）、张至昭（《跃进日报》社记者）、彭世贤（柳州地区文工团导演）；作曲组成员有黄友琴、郭冠芳、刘斯云、陆炳兰；舞美设计组成员有陈惠琪、何格培。刘三姐由马婉玉、黄孟秋饰演。

在广州，从4月1日起至9日止，9天时间分别在中山纪念堂、东乐戏院演出7场。陶铸同志在百忙中接见了邓凡平团长和牛秀、阮保和副团长，导演龚邦榕及部分主要演员马婉玉、梁玉格、张文君等，陪同接见的有胡乔木等。4月6日在中山纪念堂演出，广东电视台转播了演出实况。《羊城晚报》连续发表文章：4月3日以本报记者署名在一版发表题为《柳州彩调唱歌仙——广西彩调戏〈刘三姐〉演出散记》的报道并配发刘三姐骑鱼上青天的剧照一幅；4月5日（三版）刊发《广西彩调介绍》，作者小龙；4月6日（二版）发表了广西区文化局局长郭铭撰写的《广西大演〈刘三姐〉》一文；4月7日（二版）刊出《山歌彩调舞翩跹》，作者秉箴；4月12日（二版）发表尚陵写的《向彩调〈刘三姐〉学习什么》剧评。

在广州成功地完成首次访问演出任务后，于1960年4月10日乘车直赴南宁，参加广西壮族自治区举行的全区《刘三姐》文艺汇演大会。

4月11日至27日，在《刘三姐》文艺汇演大会上，柳州市文艺代表团以第三方案为大会作开幕式首场演出，刘三姐由黄孟秋饰演。第五方案刘三姐由马婉玉饰演。

广西《刘三姐》专题文艺汇演后，6月间自治区从柳州彩调剧团抽调了吴发书、秦顺治、庞绍元、韦秀荣、蒙敏珍、温运球、刘桂加等演员参加广西壮族自治区歌舞剧《刘三姐》演出团到北京及各省市演出。因调出了这一部份演出力量，而且原抽出来参加《刘三姐》演出的柳州专区的演职员和市桂剧团演员也分别回团工作，因此，柳州彩调剧《刘三姐》的演出遂告一段落。但是，《刘三姐》剧本的修改工作，仍继续进行。

1963年6月13日，《刘三姐》（第七方案）修订本的编写工作完成。编剧的署名为邓凡平、牛秀、黄勇润、曾昭文、龚邦榕、包玉堂。

1966年后，在“文化大革命”中，彩调剧《刘三姐》被打成大毒草，进驻文化系统的“文革”工作队，组织队伍对《刘三姐》的作品及作者展开了大批判。

1970年春，广西壮族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发出通知，要求彻底批判“大毒草”《刘三姐》。4月23日，《柳州日报》转载《广西日报》4月21日洪辛兵《大毒草〈刘三姐〉的要害是反对暴力革命》一文。说《刘三姐》是“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的一个黑标本”。接着，柳州市再次开展对《刘三姐》的批判。

1977年10月，被禁锢10年之久的彩调剧《刘三姐》获得平反，柳州市彩调剧团首次恢复了演出。一开始就在柳州剧场、东风剧场、柳铁工人文化宫、柳州地区礼堂演出数十场，座位爆满，盛况空前。复排导演：龚邦榕（执行）、陆国灿、吴嗣强、何佩云；音乐整理人员：周志强、覃尚勇；配器：黄海萍、梁明（兼指挥）；美术：何格培；舞蹈设

计：陈锦文；剧中主要人物饰演者：李彩霞、廖全玉饰刘三姐，庞绍元、陈锦文饰李小牛，陈锦文、庞绍元饰刘二，罗强华饰老渔翁，于洁饰兰芬，熊超群饰莫怀仁，林秀发饰莫进财，吴兰耀饰陶先生，李锦泉饰李先生，吴发书饰罗先生，韦秀荣饰王媒婆。

1978年初，柳州市文教办副主任黄泽忠在上海会见了上海市艺术处处长蒋可夫。蒋处长对柳州市演出的《刘三姐》彩调戏很欢迎，他要求彩调剧团到上海演出。黄泽忠同志回柳后，便向柳州市市委书记黄云同志汇报。黄书记很支持，指示黄泽忠同志与上海方面再行联系。经商量确定为营业性演出，同时定了赴沪演出时间。经请示得到自治区文化部门的批准，市文化局立即着手进行准备工作。

市委和市政府十分重视和关怀赴沪的演出，为使该剧得到进一步充实提高，便抽调了柳州市歌舞团部份演员、乐手参加演出。还聘请武汉市歌舞剧院金运祥、谭卿云，湛江市粤剧团张宏忠、莫介珊等几位舞台美术行家来柳，对《刘三姐》的舞台美术，化装进行加工提高。赴沪演出队由市革委文教办主任夏德春领队，副领队是市文化局局长洗光位、副局长于海鹏；剧团团长是杨洛生（市彩调团团长）、副团长陈振生、吴嗣强、罗强华、易志国、林秀发。男演员30人，女演员30人，乐队30人，舞台队13人，加上其他人员共119人。1978年3月下旬乘车抵沪。

在上海演出《刘三姐》的主要人物饰演者：刘三姐由练凤英、雷玛玲饰；李小牛由张青、陈义康饰；兰芬由于洁、张文君饰；刘二由陈锦文、庞绍元饰；老渔翁由罗强华饰；莫怀仁由熊超群饰；莫进财由林秀发饰；陶先生由朱华忠

饰；李先生由李锦泉饰，罗先生由吴发书饰、梁应初饰，王媒婆由韦秀荣饰。

在上海，从3月29日至5月28日共67天，演出了57场。除在徐汇剧场定点演出外，还为上海耐火材料厂作了5场慰问演出，观众达7.2万多人次，其中包括在上海参观访问的美、英、法、日等15个国家的3千多名外宾。

上海市党政领导非常重视和欢迎《刘三姐》的演出，上海市市长彭冲同志及宣传文化部门的领导同志亲临观看。上海市文化局为该戏演出，专门邀请了音乐、舞蹈、戏曲界的著名编导、演员、歌唱家、化妆师、乐队指挥开座谈会，参加座谈会有上海淮剧团的丁是娥、上海越剧院袁雪芬、上海淮剧团徐佩华、上海音乐学院教授周小燕、上海戏剧学院教授陈绍周等数十名专家。会上他们对《刘三姐》的剧本、表演、导演、舞台美术等方面给予很高评价并提出了宝贵的意见。演出后，上海新闻界进行了一系列宣传，《文汇报》于4月5日发表了《“刘三姐”千里送歌来上海》的报道及《山歌越禁歌越多》的评论文章。《解放日报》也发表了评论文章及剧照。上海电视台于4月9日、14日、28日3个晚上先后转播了《刘三姐》演出实况。4月28日晚，中央电视台向全国转播演出实况。剧团在上海耐火材料厂的慰问演出中，厂党委书记毛连康、厂长丁俊海、工会主席刘四环等同志上台会见了全体演职员，并赠送了一面锦旗，上书“《刘三姐》重放光彩，彩调剧誉满上海”的赞句。在徐汇剧场的一次演出中，有22人的美国纽约州俱乐部演员访华团看了演出并上台会见演员。一位名叫米趣林的访华团成员说：“戏剧是没有国界的，你们的演出我完全看懂，希望有机会

在纽约再看到你们的演出。”他还赠送了一本自己翻译的京剧《野猪林》剧本给剧团。

在上海的繁忙演出中，全团同志还参观了上海耐火材料厂、上海重型机器厂、党的一大会址，青年演员还到龙华革命公墓扫墓。剧团先后组织演员到上海乐团、舞蹈学校、京剧团、歌剧院、沪剧团、越剧院观摩学习，还派演员学习上海舞蹈学校的《荷花舞》和上海越剧院的《祥林嫂》等节目。在向兄弟剧团学习中，何佩云、陈锦文与上海舞蹈学校的同志互教互学，把彩调戏的扇花舞蹈也传授给他们。通过以上活动，加强了柳州与上海人民的联谊。1978年5月28日，剧团离沪返柳。

同年9月，广西电影制片厂和上海电影制片厂联合摄制舞台艺术片《刘三姐》。市桂剧团演员张青应邀饰演小牛，市彩调团演员吴发书应邀饰罗秀才。

1979年10月，柳州彩调剧《刘三姐》在中央文化部举办的庆祝建国30周年献礼演出评奖中，获剧本创作一等奖。

1980年9月，广西《刘三姐》剧团演出团赴香港、新加坡作营业性演出。市文化局局长牛秀任该团秘书，市桂剧团演员张青饰小牛，市彩调团演员吴发书饰罗秀才。

1981年5月30日，在市文化局牛秀局长的带领下，柳州市彩调剧团以杨洛生为团长，全团60余人赴湖南、湖北二省作巡回公演。《刘三姐》的主要人物饰演者：刘三姐由雷玛玫瑰饰，李小牛由秦克强饰，刘二由陈锦文饰，兰芬由于洁、张文君饰，老渔翁由罗强华饰，莫怀仁由熊超群饰，莫进财由林秀发饰；陶先生由庞绍元饰，李先生由何海祥饰，罗先生由吴发书饰，王媒婆由韦秀荣饰。随团指导有导演龚邦

榕、陆国炳、吴嗣强。演出进程：5月30日至6月8日在衡阳市红旗剧院演出9场；6月9日至20日在长沙市演出6场；6月22日至7月14日在武汉市机床厂、塑机厂、湖北剧院、人民剧院演出11场；7月15日至7月24日在黄石市商业礼堂演出5场；7月26日至30日在岳阳市影剧院演出4场。

1983年，柳州市彩调剧团应市物资局邀请，又赴四川攀枝花钢铁厂、云南省昆明市、贵州省贵阳市、水城煤矿作慰问演出，历时1个月。此行由团长刘万生带队，全团60余人参加演出。刘三姐由雷鸣珍饰演。柳州市市委副书记田民、柳州市物资局局长刘振泰等领导亲自随队指导。

12月，彩调剧《刘三姐》作为词目收入《辞海·增补本》。（1983年12月版本453页）

1987年12月26日，经柳州市有关方面和人员集体研究商定，《刘三姐》创作组作者署名名序作了调整，并报请市文化局备案。调整后署名名序为：曾昭文、龚邦榕、黄勇刹、邓凡平、牛秀。

# 柳州文化古城概貌

戴义开

## 一、概述

### (一)

柳州建城已有2100年历史。

潭中县（治所今柳州市）建置于西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是今广西壮族自治区五个直辖市中行政建制较早的城市之一。汉代潭中县辖地大致当今柳州地区属县和柳州市（含两县）境。

两晋（265—420）时，潭中县是桂林郡治所。南朝梁（502—557）、陈（557—589）两代为马平郡治所。唐武德四年（621）起，为昆州（南昆州）州治。贞观八年（634）更名柳州。五代、宋仍之。宋末迄元，州、路治置于柳城县。明、清府治均置柳州城。

柳州自西汉设县迄民国，先后称潭中、马平、柳州和柳江县，除民国初年曾短暂停一度废马平县置柳州府外，县建制历二千余年。自两晋及南朝置郡，唐、五代、宋置州，迄明、清置府，除中经南朝宋、齐及隋、元等朝代短暂停时间外，柳州城近二千年均为县以上郡或州、府行政区治所。

清代，柳州军事地位重要，从康熙元年（1662）至光绪十二年（1886）为广西省提督驻地。

## (二)

柳州有众多的史前期人类文化遗迹。

“柳江人” 在市东南郊柳江县境新兴农场通天岩发现的“柳江人”化石，是旧石器时代晚期新人，具有蒙古人种主要特征。是中国以至整个东亚迄今所知最早的现代人代表。其年代距今约5万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研究所《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59年版吴汝康《广西柳江发现的人类化石》结论说：“柳江人是早期的智人类型，较周口店的山顶洞人和四川的资阳人为原始，是至今在中国以至东亚发现的最早的新新人化石。”

白莲洞石器时代洞穴遗址 位于市东南郊都乐乡白面山南麓。在这里发现人牙化石和石、陶、骨制品以及烧火堆遗迹。有旧石器时代晚期、中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三个时期的文化层。距今约3万—7千年前。

鲤鱼嘴新石器时代贝丘遗址 位于市南郊大龙潭公园鲤鱼嘴。出土的文物至少代表6个个体人骨化石以及陶、石、骨器。分别为新石器时代早、中期的两个叠压的文化堆积。年代距今1万—7千年左右，为母系氏族公社时期。

蛮王城石铲 于市城区东南隅社湾坳西江造船厂区石山“蛮王城”洞穴。这里发现的桂南型双肩石铲两件，可能是农业祭祀礼器。年代距今约4千年前，为父系氏族公社时期。

在城郊和市属两县柳江两岸台地蓝家村、鹿谷岭、响水和众多的山丘喀斯特溶洞九头山、都乐岩、思多岩、陈家岩、甘前岩等，已发现不少石器时代人类文化遗址。

对古人类学有重大价值的“柳城巨猿”化石，于柳城县楞寨山发现，此地被称为“世界古猿的故乡”。

### (三)

在汉代潭中县城所处的今鱼峰区驾鹤山以南约3公里的九头山村，发掘西汉墓、东汉墓各一座。出土约100件文物，有汉武帝（公元前140—公元前87年）、汉宣帝（公元前74—前50年）五铢钱、昭明镜、日光镜等。该两墓与广西贵县罗泊湾、平乐县银山岭的汉墓有许多共性。

位于柳江县白沙乡大田村至永山村长约8公里的地段内，沿柳江西岸台地，分布有古墓群，俗称“九十九堆”，近年发掘30余座，出土一批汉代陪葬物。其中东汉线刻滑石面具，是有“古文化活化石”之称的傩戏文化艺术珍品，为国内所罕见。

### (四)

柳州历来是壮、瑶、苗、侗等少数民族聚居地。先秦时期，今桂东北的西瓯人和桂西南的骆越人分布柳江流域两岸。几千年来，作为柳江流域中心城市的柳州，是汉族和岭南各土著民族经济、文化交流、融合的汇集点。具有深厚的民族传统文化积淀。如铜鼓是南方各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柳州市博物馆收藏有从东汉至明、清时期的铜鼓28面，是广西各县博物馆或文管所保存数量最多的单位。明代已有山歌活动。岳和声《后移莺录》记万历39年（1611年）3月在柳州城郊对歌情景：“遥望松下，搭歌成群，数十人一聚，其俗女歌与男歌相答，男歌胜而女歌不胜，则父母以为耻，

又必使女先而男后，其答而相当，则男女相携而去。”民间有传说千多年前壮族歌仙刘三姐在柳州传歌的故事。1958年经柳州文艺创作人员创作、由柳州彩调剧团演出的彩调剧《刘三姐》享誉国内外。富于民族风情、有鲜明壮乡特色的“柳州山歌”活动，明代已有文字记载，至今对唱山歌犹富壮乡特色，是社会文化生活中一个重要方面。

### (五)

柳州州学，创建于初唐。柳州是有史籍记载的广西建州学校早的城市。

唐元和十年至十四年（815—819年），杰出的文学家、哲学家和歌治家柳宗元（773—819）任柳州刺史时，在柳州革除陋俗，发展生产，兴办文教。当时湘湖以南文士不远数千里来柳求教，世人称他为“柳柳州”。他被誉为“中国山水游记文学之宗主”，又有历史上第一位景观建筑家之称。他的游记中篇幅最长的是《柳州山水近治可游者记》，柳州“东亭”是他经营的最后一座景观建筑。在柳州著诗文百篇。柳宗元大为丰富了柳州历史人文内涵。今存柳侯衣冠墓、柳侯祠，千多年来柳人祭祀不绝。有《柳州罗池庙碑》、《荔子碑》韩愈撰文，分别由沈传师、苏轼书写，还有其它众多的历代有关碑刻，是国内存留柳宗元文物最多的地方。宋代哲宗、徽宗、高宗和元代泰定等皇帝均有赠封。

唐会昌、大中年间（841—859），以《贤良方正》策文抨击时弊被贬柳州的刘蕡，劝农时卒于田间。柳人于地建刘贤良墓，现存墓明代重修。

明代理学家王守仁撰文说：“唐之时，柳宗元出为柳州

刺史，刘蕡斥为柳州司户，……以礼教治民。……自是寓游其地若范祖禹、黄庭坚、孙觌、高颖、刘洪道、胡梦昱辈，皆忠贤刚直之士，后先相继不绝。故柳虽非中土，至其地者，率多贤士。是以习与化移，而衣冠文物，蔚然为礼义之邦”。

### (六)

北宋大观（1107—1110）年间，柳州入州学的学生300人，被称为当时岭南各州之中学生数最多的。宋代岭南西路各州进士数柳州居第二（次于桂林）。《粤西文载》卷二十五卷〔宋〕汪藻《柳州修学记》：“昔唐柳宗元尝为此州而新庙学矣，被其教者，至今为可观。故大观中，士之弦诵者至三百人，为岭南诸州之最。”

南宋绍兴二年（1132），前宰相吴敏、汪伯彦、王安中于今城区驾鹤山下建驾鹤书院，北流县勾漏书院也于是年建成，同为广西最早见于史籍的书院。

同年，灵泉寺（天宁禅寺）新殿落成，王安中撰文盛赞寺宇宏丽，“未数之士，指以千计。”誉为广西第一。

今存宋代摩崖、碑刻20余方。主要分布于柳侯祠、马鞍山、陆道岩等处。其中《荔子碑》、《新殿记》等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和艺术价值。

宋代柳州纂修成《龙城图志》、《重修龙城图志》、《龙城志》、《柳州志》、《柳江志》等地方志，是宋代广西少数几个修成方志最多的城市之一。绍兴初年，《柳州旧本河东先生集》在柳州出版。最早问世的一种柳宗元《年谱》是柳州知州文安礼编成，也可能是在柳州出版。

北宋时，桂西北地区经济有较大发展，柳江上游的龙江和融江流域的土产特别是大量木材沿江运到柳州城下集散。“柳州杉”蜚声海内，柳州棺材也著名于世；和“生在苏州，死在杭州；吃在广州”联在一起的“死在柳州”的古谚语由此产生。

宋代柳州手工纺织品生产已达到较高的水平。用苎麻纤维加工织成的“柳布”是驰名国内的产品。从龙江延绵数十里的沿岸地带发现大量宋代瓷窑遗址，窑器品种繁多，质量也相当高。从窑址数量之多和产品款式之高档，可知销售市场远不止于柳州地区。近年东南亚发现大量中国广西宋代陶瓷器，柳城宋窑更引起人们的注意。

### (七)

明洪武元年（1368）置柳州府治于马平县。府辖2州10县，是明代广西领州县最多、面积最广的府。明初将今城中区内原唐宋土城拓展并易以砖砌。“东西三里，南北二里，高一丈八尺，周围七百四十八丈，为门五。”“外城长五百九丈，高一丈四尺，为门三。”明城历时六百年，民国年间修马路时拆除。今存东门城楼一段。桂、门历代修葺完好。是广西仅存年代较早的古城建筑之一。明太祖朱元璋曾题《咏柳州城戍守》诗：“城居边徼垒遐荒，烟瘴盈眸瘴气芒。旦暮海风摇屋树，春秋溪水泛篱墙。思君久戍炎蒸地，重慎还劳餐辑肠。但愿昊穹舒造化，洗清郁结利同乡。”明代柳州府城实际街区已扩张于城垣外。远在唐代开元（713—742）年间，柳江北岸城内编籍居民六百户，南岸三百户。到明代，旅游家徐霞客记：“其城颇峻，而东郭之聚庐，反

居于城中。”明后期，城内街市有尚书坊、太中丞坊等牌坊20座。

徐霞客于崇祯十年（1637）两次游览柳州，历时半个月，记述城内外近50个自然地理实体，乡村名称和建筑物。细述立鱼峰、柳侯祠等自然的和人文的景观。他盛赞立鱼峰岩洞之美，“即桂林诸洞所不多见也。”

明代柳州誉称“粤西声名文物之盛郡”。明代柳州八贤之中，户部员外周璕“邃于学问”，刑部主事戴敬诗文“蜚华文苑”。嘉靖、万历二三十年间，就有工部尚书徐养正“以文学名”，兵部左侍郎余立“以清节著”，刑部左侍郎张勗“以忠谏显”。他们的事迹“书之国史，传之海内外，天下仰之，若景星庆云。”

#### （八）

明、清时期，柳州作为纵贯广西南北邕桂大道和横亘广西东西的西江北支融、柳、浔江中段的水陆交通交汇点，中心城市地位愈加显著。清代，广西提督署、右江道署和柳州府署都设于柳州城内。“桂中商埠”的经济活动益形活跃。城南沿江码头、渡口有20处。来往广东、贵州的食盐、米谷、木材和桂西铅、锡等多种有色金属，沿柳江航运停泊集散于此。今存清康熙至光绪间各种捐献的商号题名一般均达百家以上。香签街（今曙光中路）有数十种行业。

据不完全统计，清代柳州人的著述出版40余种，较明代为多，其中开发台湾宜兰县的杨廷理（《台湾省志》有传）岭南五大古文家之一的王拯（《辞海》有词目）尤为见著于世。

## 二、文物古迹

### (一) 古城址

#### 汉城

西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于今鱼峰区驾鹤山下设潭中县城。两晋于县置桂林郡治，南朝梁、陈置马平郡治。至隋开皇十一年（591）历时700年。

#### 隋城

隋开皇十一年废潭中县，于今柳北区鹊儿山以东置马平县城。至唐贞观八年（634），隋城废，历时40余年。

#### 唐城

唐贞观八年（634）原南昆州更名柳州，城址位于今城中区内，为土筑城。宋代有修葺，宋末州治迁柳城，经元代城址荒废，至明初，历时740年。

#### 明城

明洪武十二年（1379），原土城易为砖砌，城区扩展当今城中区南部居中，南临柳江。至民国二十四年（1935）开辟马路，拆除城墙。现存东门城楼。明城历时550余年。

### (二) 柳宗元文物古迹遗存

#### 柳侯祠

柳侯祠兴建于柳宗元逝世后三年，即唐穆宗长庆二年（公元822年），庙位于罗池边上，原名罗池庙。宋哲宗元祐七年（公元1092年）赐额灵文庙，历代习称柳侯祠。

祠宇历代都有修葺，现祠按清代乾隆时绘图重修，为明清建筑风格。三进，大殿置柳宗元及三部将塑像。两厢碑廊存碑刻数十方。

### 柳州罗池庙碑

柳州罗池庙碑立于唐长庆三年（公元823年）。韩愈撰文，沈传师书。碑文记柳宗元在柳州的政绩和死后成神的传说，是研究柳宗元在柳州政绩和晚年思想的重要资料。也是沈传师著名书法作品，现碑据拓片复制。

### 荔子碑

宋代嘉定十年（公元1217年）立碑。碑文是韩愈《柳州罗池庙碑》中的《迎享送神诗》，用诗首“荔子”一词为名。苏轼书行楷。以一碑而集“韩诗苏书柳事”，有“三绝碑”的称誉。

### 龙城石刻

因碑文首句“龙城柳”得名，也因有“出匕首”一句而称“匕首铭”，又以出土短剑有以铭文而称“剑铭碑”。相传是柳宗元手迹。但是否真迹，宋以来每有争议。文字出处早见于晚唐时，已历千年以上。碑石出土于清雍正年间，有附记称明天启时出于柳井中。现碑是据天启拓本复制。

### 元刻柳宗元像

柳侯祠存元代石刻柳宗元图像两方，一方是至元二十六年（公元1289年）制，上刻柳宗元《柳州文宣王新修庙碑文》，下刻柳图像，一方是至元三十年制，有刻像跋语。

### 柳侯墓

唐元和十四年（公元819年）柳宗元在柳州病逝。后一年，灵柩运回长安万年县。柳州人在原停放灵柩处为他建衣冠墓。现墓碑“唐代柳宗元衣冠墓”是郭沫若题书。

### 柑香亭

柳宗元曾在城西北边上亲手种植黄柑二百株，并作诗刻

石为记。后人因此建柑香亭以纪念。现建筑是按照乾隆年间的式样重建的。边上有清人题碑。

### 罗 池

罗池是柳宗元在世时喜爱游玩的地方。韩愈《罗池庙碑》里写他托梦要建祠在罗池旁，罗池因此成为游览胜地。历代题咏柳州景物的诗文也以罗池为多。

## (三) 古寺庙建筑

### 灵泉寺

灵泉寺是佛教禅寺，始建于唐代，宋代曾改称天宁万寿寺并扩建寺宇，宋相王安中撰文誉称为“广西第一”。寺院历代屡经兴废，现建筑是民国年间重修。海外归侨朝拜者很多。

### 西来寺

西来寺是佛教寺宇，明代创建，清代重修，又经多次修整。建筑保存我国古代庙寺的传统特色。有柳州历史上有记录的最大洪水碑记。市内兴建大桥测量水位的标高时，都以这碑记为准绳。

### 清真寺

清真寺，这里是本地仅存的伊斯兰教寺院。清康熙十一年，即公元1653年创建；经历道光、咸丰、光绪和民国时期兴废修理。现寺内存木刻彩色可兰经文碑3方。

### 雷塘庙

雷塘庙，祭供雷神、龙神。唐柳宗元曾在这里祷雨求雨，有《雷塘祷雨文》，原庙宇废坍，现建筑是近年重建。近旁有祷雨坛、祷雨碑亭。是本地唯一的古代民间诸神信仰祀庙遗迹。已成为大龙潭风景区重要人文景观。

## (四) 古 墓

### 刘蕡墓

刘蕡墓，唐代中晚期，以敢于抨击弊政为当时誉称“刘贤良”的刘蕡，被权奸诬陷贬柳州为司户参军，在田间劝农时，不幸坠马而死，柳州人就地礼葬建墓纪念。现墓为明代嘉靖时重修，牌坊是清代乾隆时建置。

### 戴钦墓

戴钦，明代“柳州八贤”之一。在北京任刑部郎中，诗文著名于世，位列“西台十四才子”之中，嘉靖时因“议大礼”被廷杖重伤致死，有文集传世。墓处鱼峰景区，近年曾经修整。

### 张翀墓

张翀，明代“柳州八贤”之一，因弹劾奸相严嵩被贬贵州九年，复起，官至刑部侍郎，死后追赠兵部尚书，有文集传世，陵墓前有万历九年皇帝谕祭碑，以及翁仲，石马等遗存。

## (五) 古代摩崖

### 马鞍山宋代摩崖

柳州市城区和市郊错落簇拥的群山之中，有众多的古代摩崖。在马鞍山、驾鹤山、陆道岩三处，就遗存有三四十方宋代的石刻。曾经为柳宗元在《柳州山水近治可游者记》详细描述过的马鞍山仙弈岩，洞内外的宋刻群里，以淳化二年即公元991年的蔡仲典游山题记年代最早，至今已有1002年的历史。

马鞍山西坡梓潼岩，有“钓台”遗址，是宋绍兴初吴敏、汪伯彦、王安中三相结伴游览处，今存记文和宋嘉定间方信孺篆书“钓台”摩崖。

马鞍山西麓是唐宋时期柳州宗教活动中心。宋宰相王安中撰文并书灵泉寺《新殿记》摩崖刻于绍兴二年，记述山下灵泉边上灵泉寺佛事活动的兴旺，说这殿宇建筑的宏丽，称得上是“广西第一”。附近还有《光孝禅寺开堂疏》等多处记载宗教活动的摩崖，反映出北宋至于南宋初柳州作为一个佛教中心的盛况。

### 立鱼峰元明清摩崖

立鱼峰有许多洞穴，互相上下前后贯通，奇妙的景观经过柳宗元、徐霞客的生动描绘。留存有约60方元、明、清石刻铭文。有罗汉洞、鱼山清梵、西天玉洞、纯阳洞、清凉国、螽斯岩、三星洞、重踏金鳌等岩洞题额，表明这些洞群在元、明、清时期，是柳州佛、道和民间诸神信仰汇集的宗教文化活动中心。

### 驾鹤山宋代摩崖

摩崖“驾鹤书院”是宋绍兴二年王安中所书。这里是与勾漏书院同年建成的、广西最早的两个书院之一的驾鹤书院地址。是他和吴敏、汪应辰共同营建的，因而又有“三相亭”的铭记。当年这里是桃花千树的园林胜地，遗存有宋代“小桃源”等石刻6方。

### 陆道岩宋代摩崖

陆道岩的自然景观在徐霞客的《粤西游记》里，和马鞍、鱼峰两山一样，有具体生动的描述。陆道岩洞壁有3首宋人题咏的七律诗和两付对联，表明在中古时代这里是游览

# 柳州解放前夕保护电厂的回忆

阙培松

1949年我在柳州电力公司任甲种实习员。当时我解放军已渡江南下，国民党溃败逃遁。一天，有位在柳州专员公署工作的同学告诉我一个秘密消息：国民党军当晚逃走时要炸毁发电厂和浮桥。我把情况向经理林培深报告，转告电厂组织的护厂队（编者按：该厂的护厂队于1949年秋成立，为中共地下组织掌握），准备武装，保护工厂。我的父亲阙维雍是国民党军131师师长、抗日烈士。柳州国民党守军军长是他的同事。电厂命令我守卫大门，设法阻止国民党兵进厂。11月24日深夜，国民党兵来到大门外叫开门时，我说军长指示，不许外人进厂。他们说要找经理。我们假装去找，就一直拖延到翌日晨零时许。这时他们来了一个副连长，质问他部下的人，为什么还不进厂，又扬言说，如不给进厂就

---

景点，又是佛、道教徒的活动场所。有一方塑神像捐献题记，对了解700年前柳州道教文化、货币经济、姓氏学、民俗和城市建设发展等，都有重大史料价值。

## 猪头塘明代摩崖

猪头塘摩崖“天山万里”刻于明代嘉靖三十九年即公元1560年，整体高1.3米，宽约7米，每字约1米见方，书法雄健浑厚，显示明代统辖10县2州府城的宏伟气派，是柳州古代城市发展上升时期的表征。

要开枪。我们遵照护厂队的嘱咐，放进了副连长等二人。由会计课长林云引入办公室，向他们作宣传工作，给予金条贿赂。他们答应了护厂队的要求，不炸电厂。一小时许，国民党兵在空地上施放了两件爆炸物，爆炸后逃走。除把一根电杆炸倒和电厂门窗玻璃震坏外，其他发电机、锅炉及变压器等主要设备仍完整无损。当天上午，我人民解放军入城，柳州解放。军管会接管工厂后，军代表批准奖励护厂有功人员。授我记大功一次和晋升一级，林云记大功一次并晋升二级，老工人、班长吕茂德等都获记功晋级奖励。军代表是赵熙宏同志。当时和我在一起工作的同事有：经理林培深、会计课长林云、老工人班长吕茂德、吕茂荣、陆宏泉、杜金耀，技术员张铭新、吴望卿、梁载规、白崇林、陈洪辉、杨光淮，工程师黎国庆、黎书节、卢建业、成狄儒、沈栋坚等。

# 柳州解放时我这老板的忧与乐

陈立初 口述

陈广锟 记录整理

## “我们保护你”

1949年11月25日柳州解放。解放前夕，城里一片混乱，从飞机场方向传来一声声油桶爆炸的轰响，冲天的黑色烟云遮住了城区的南方。

在市民交头接耳的低语中，各种消息飞速地传遍全城：“听说国民党军要炸浮桥，解放军打到沙塘了。”……

“友成隆”布行商店（现曙光中路市五金文化公司的一个维修点）的大门紧闭着。三层楼房里店员们跑上跑下，几个年青的自卫队员（当时由商会出现抽各店一些年青店员组成）蹲在阳台上，不安地倾听着北方不时传来的枪炮声。我一家老少七口卷缩在房里，听着外面匆忙的脚步声。

入夜，气氛显得更加紧张。突然，从门口传来一阵黄包车铃响声。我的老友梅叔伟（柳州老中医）带着老花眼镜，柱着手杖气喘吁吁地进来对我说：“立初表侄，你们友成隆分店还有个铁门（当时的店门是栅上大铁门的），今晚我就来你这里避避吧！”话刚停，我忙迎他进来。这时店里住下的亲友及店员家属已有几十人，见到这种情况，我真是六神无主了。因为1944年秋走日本的情景还历历在目。……再说，共产党来了会怎么样，我还不懂。因此，打算把铁门栅上10天半月再说。想到这里，我马上叫女佣人赶快再买5斤

腊肉（原来买有10斤）回来备用。

不安的一夜过去了。第二天天刚亮，还未开门，店员温德指着门板上喊了一声：“字条！”原来在铁门下面，不知什么时候，有人从外面插进了一张宽约2寸、长约尺余的白纸字条。店员马上送上楼交给我。我一看，上面是用墨写着几个大字：“陈老板，不要慌，我们保护你！”怪，这是谁送来的呢？啊，我想起来了，是地下党同志送来的！得了这字条后，我心里就潭定（白话，即心里安定）多了。

黎明时街上还是一片寂静。我和伙计们从窗口偷偷往外望，只是偶尔看见一两个身影闪过。而到了10点钟左右，街上就逐渐热闹起来了。有人在街上高兴地喊起来：“柳州解放了，柳州解放了！”中午，人来人往，跟往时没有两样。友成隆店在中午也打开了大门。大街上宣传队员们正在忙着张贴柳州解放和迎军的标语呢！

过了几天，我叫伙计们买一封鞭炮点了起来。友成隆布行商店批发布匹又开始营业了。

### 7艘运米大船开走又回头

解放军进城的第二天，我就与当时商会负责人之一的陈潮鸣商量借粮支前。陈潮鸣又找庞怡泰酱园的老板庞晋商量。庞晋知道沙街平码行的邝广（又叫邝老广）有米。但当时邝广对解放军不甚了解，解放军要借粮，他心里有些慌，于是就把泊在马草坪（现柳堤北端的江边草坪）的7艘木船大米（每船约2至3万斤）开上柳城去。庞晋了解这情况后又来找我，商量此事如何处理。我眼见解放军入城以来，秋毫无犯，心想，用不着慌。于是对庞晋说，不要怕，快放返

船落来（白话），我担保。

庞晋马上去找邝广。经讲清后，7船大米又从柳城拉回了柳州，全数借给入城解放军部队。没过几天，解放军就把钱送给邝广了，都是白花花的现大洋。

### “就借你穿的这件”

解放军进城后，有一支宣传队就借住在“友成隆”的三楼里。宣传队员都是些年轻人，他们出出进进，对我一家人极为客气、亲热，常说：陈老板，你放心，我们绝不会动你的东西。一些女解放军同志还常抱逗着我那刚出世不久的二女儿玩玩。

一天，宣传队几个同志来找我，问道：“陈老板，想跟你商量一件事，向你借件长衫。”“这有什么！”我当即答应并叫我爱人去取。谁知宣传队的同志却笑着说：“陈老板，就借你身上穿的这件，下午我们来要，明天早晨给你送还”。我说，“这件衣穿脏了，我给你一件干净的不好吗？”可他却笑着再说，“就借穿的这件！”我在纳闷，为什么非借这件旧衣服不可呢？我没敢多问，还是借了。解放军同志挺认真的，每天下午4点多钟来借衣服，第二天早晨7点钟铺子开门前就送回来了。接连几天都是这样。

过了几天，邻居的后生回来告诉我才知道，原来是宣传队要演出，缺一件“老板”长衫。

## 半夜敲门来交枪

卢星锦

1952年，柳州市郊区土改复查工作队来到柳东乡进行土改复查。我是队员，被分到牛车坪村工作。该村情况很复杂，成年的男性中几乎都与土匪有些关系，有的受骗或被迫参匪，拦路抢劫，有的济匪、窝匪。我初进村时，由于情况还没有摸准，就暂住在中农覃亚七家里。

11月间有个晚上，工作队召开关于收缴民枪动员大会，宣传交枪政策，说明凡是过去自己有或别人转移到自己家的长短枪都要交出来；凡是隐瞒不交者，被查出来后果自负，等等。翌日两点钟左右，覃亚七突然敲我的房门，他急忙悄悄地对我说：“卢同志，起来。你有一支手枪，我也有一支手枪。”当时我觉得他讲的话有些反意。为防万一，我把带着睡的那支手枪，先在被窝里上好子弹，然后才起来。他弟和我同床睡，这时，也起来了。我问：“亚七哥，你的手枪在那里？”他吞吞吐吐的，双手又在后背乱动。我顿时紧张起来，大声说：“快拿手枪来！”他回答说，枪放在厕所里。我催他快去拿回来。他立即往厕所方向走去。我在紧张地等待着。很快，他拿回一红布包交给我，打开一看，是一支日本造的左轮手枪和八发子弹。这时我才放心。同时也意识到刚才他讲的那些话，也许是惊慌不知所措而讲的呢。为安定他的思想，我重申有关政策，同时表扬他，说带头交枪是好榜样。他情绪安定后，就跑到屋外面摘回两个大沙田柚。我们吃完

抽子，他说：“你来我家住之前，我这条枪都是放在枕头下的，你来住当晚我才拿到厕所去收藏。这支枪原是我岳父的。他是雷村的地主。有个晚上他转移给我保管，叫我到半路接回来，此事任何人都不知道。今晚交给你，是由于你讲清了党的有关政策，又看到你到我家住后，一言一语，一举一动都很老实，你对我家人也很好，我考虑几个晚上，睡不着觉，最后我相信你一定能按党的政策办事，交出来不会找我什么麻烦，因此我才交出来的。”

覃亚七交枪后，我看他的精神还不够愉快，好象还有些什问题似的。我记得，在访贫问苦时，个别群众反映他过去有支长枪。于是我继续做他的思想工作，和他谈心，我说：“别村有个地主，原有三支枪，只交一支做挡箭牌，那两支枪死不承认，后来我们挖出来了。根据群众意见，认为这个地主很不老实，不死心，就给他‘充军’去（调到别村住）。”我又说：“准备再开一次交枪动员大会，表扬你亚七带头交枪……”这样一讲，第二天一早覃亚七就和他弟弟一起去岩洞里挖出一支长枪和一支短枪，带回交给我。他说长枪是过去买的，解放军来问过却没有承认，短枪买回来时是坏枪，后来一起拿去埋的。原先我以为交了这支短枪后你们就不会再怀疑我有枪了。但听到你和我谈心讲那番话，好象是“点”我一样，经我考虑，一起交出来算了。最后他说：“卢同志呀，真是天不知，地不知，神不知，鬼不知，就是共产党什么都知，什么都瞒不过你们啊。”

## 1952年六人创建红会医院 第一门诊部的亲历

程国栋

1949年柳州解放后，柳州市委和市人民政府从国民党手中接收的旧柳州是一个烂摊子，百废待兴。当时，民主改革尚未进行，国民经济又处在恢复初期，市财政十分困难，拿不出钱来兴建新的医院。原有的医疗机构少、设施差，群众看病难的问题十分突出。

为了解决这个突出的矛盾，关心群众的疾苦，市政府卫生科科长兼市红十字会会长丘美水同志便组织开业的唐健民、胡章考、程国栋、马象辰、李生、刘毓桢6位医师学习毛主席著作和党的方针政策。通过学习，大家提高了思想觉悟，一致认识到，关心群众疾苦，解决市民看病难，为党和政府分忧，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们本着强烈的爱国心和事业心，发扬救死扶伤和无私奉献精神，发挥各自技术专长，把各人的医疗器械，药品和家具集中起来，不要国家一分钱，于1952年9月1日正式创办了市红会医院第一门诊部，并同时开诊。开诊第一天，门诊就来几个病人，之后逐步增多，发展到日接病人3百至4百。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后来又在市区的河南河北先后成立了红会第二、三、四门诊部，红会医院得到不断壮大发展。

从创建开始，我们在思想上就以为人民服务为宗旨，艰

苦创业，在工作中，我们比贡献、比医德、比技术、比质量，从不计较个人得失，把病人的疾苦作为自己的疾苦。病人感到温暖，因而受到广大病人和市民的欢迎，特别是我们坚持每天24小时门诊制度及星期天半天义诊，更是受到群众和领导的赞扬。

1953年9月5日，国家正式接收了红会医院，全体医务人员转为国家公职人员。接收后的红会医院归市红十字会直接领导，下设的门诊部以第一门诊部为主，增设了放射科、检验科，扩大了业务范围。门诊部实行24小时门诊制，日接诊病人由三、四百人扩大到1200人左右。在没有增加医务人员的情况下，我们的医师经常下了夜班还不休息，坚持工作。以多看一个病人，多为病友解除一点痛苦为荣。每个医师还负责2至3张家庭病床，利用休息时间送医送药上门，为病人服务。

1958年，医院增设了20多张简易病床，使得一些需要观察治疗的病人得到及时治疗。到了七十年代，病床增加到40多张，八十年代以来，在党和政府的重视和关怀下，医疗事业大发展。红会医院建立了新的领导班子，健全了包括内、外、妇、儿、口腔、眼科在内的综合医院，医务人员职工增到300多人，各种专业医疗设备比较齐全。在原三门诊部的旧址建成一座八层高的综合医疗大楼。

## 柳州解放初制止十二年来 通货膨胀纪事

刘郁卿

“看，黄金又涨价了！”昨天黄金最高价每市两（旧市斤16两制）是光洋86元，今早开盘是88元，有人标到90元。昨早米价每市担5元5角，今天卖到6元（光洋）。由于黄金价格的上升，影响到米价，由米价的上升，诱发有关副食品和日用生活必需品的连锁反应跟着涨价。这就是1950年春节前柳州物价波动的情况。

物价的飞涨，由来已久。1935年11月4日，国民党政府发行法币。原法定发行14亿元，但到了1948年8月20日发行金圆券时为止，法币已发行到660万亿元，为法定发行额的47万倍。物价飞涨，为抗战前的3492万倍（见全国《文史资料》第7期45页）。特别是1946年，所谓“戡乱”开始，国民党为了扩大军费打内战，大量印发钞票，到1947年，印制的10元面额钞票，工本费已经亏本了。1948年币制改革，发行金圆券，以贬值的法币300万元，兑换金圆券1元使用。国民党政府强制收购民间黄金、白银、外币。当时派蒋经国坐镇上海督行，虽一时雷厉风行，但无法“严打”，一个月后，金圆券、法币更快速膨胀。在1948至1949年间，金圆券发行流通仅10个月时间，就由发行总额的1095万亿元，飞增65万倍，批发物价上涨120万倍。据有关资料表明，1949年6月上海银元黑市，1个光洋（1元）可换金圆券16亿元。柳州物价的连年飞涨，是国民党统治时期通货膨胀的缩影。解放初，由于社会秩序尚未稳定以及其他原因，物价更是暴涨。

1950年3月，柳州市人民政府首次召开了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会议发出“肃清匪特，巩固治安，稳定物价，恢复工商业”的号召，在这前后市委和市政府领导全市干部群众同心协力，艰苦奋斗，克服困难，采取各种措施，制止物价的飞涨。

一、禁止银元流通，使用人民币（解放区1948年发行的人民币称旧币。1955年3月发行的人民币称新币，新币1元兑旧币1万元）。春节前，市政府发出公告，禁止银元流通。规定一切公私交易，必须以人民币为单位。为此，一方面由中国人民银行柳州支行组织人力广为宣传政府的货币政策，说明人民币的意义作用，消除群众对使用人民币的顾虑；一方面为方便兑换人民币，在河北的小南路口及河南路，设立兑换点，还派出流动汽车兑换。市商会积极协助政府做好宣传工作。首先召开理监事联席会议和各业公会理监事联席会议，商会负责人刘郁卿、叶日青、陈潮鸣分别在会上号召各行业要认真贯彻执行市政府对银元的政策和规定，提出买卖交易必须使用人民币，拒绝收用银元，并要求各公会负责人以身作则。同时商会还在解放戏院召开全市商民大会，请魏伯市长在大会上作关于禁止银元流通，广泛使用人民币的动员报告。为了打击黑市，照顾持有银元者的利益，人民银行还将银元牌价与人民币的比值，由每元光洋兑换4000元人民币提高到7000元。于是仅7天时间，人民币即兑入银元52715元，黄金153两，东毫19.98元，港币4189元。

二、推销人民胜利折实公债。自2月26日成立柳州市人民胜利折实公债推销委员会，开展宣传动员后，全市人民立即行动起来，纷纷组织分会，踊跃认购公债。到4月上旬，全市推销公债159368分（含铁路局）。超额完成任务16%（当时

每分公债约为旧人民币31310元）。

三、抓紧税收，大力开辟税源。3月间在20天内征补1949年工商业税10亿另2千万元（旧币），增加财政收入，紧缩流动资金。

四、充实市场货源。由于刚解放，社会秩序未稳定，城乡交通不畅，货源短缺，粮价猛涨，市军管会除向市商会暂借大米35万市斤外，还自己直接拨款交顺利行，委托代购部分粮食，解决驻军粮食和支援前线。当时，采购粮食工作由军粮采购委员会统筹，根据市场粮食上市情况，多时多购，少时少购，甚至暂停不购，调节了市场。而且，在市工商行政管理局号召下，市商会动员各行业向柳江上游附近各县积极组织货源，保证春节供应。市贸易公司从2月14日至16日两天平价售出大米20万市斤，平抑了粮价，其他物价也相应缓解。

五、制定并实行政府机关的现金管理办法，统一财政收支和加强仓库物资清理工作。发动各单位厉行节约，紧缩开支，同时动员商店将每日销售现金存入银行，因而大量减少现金支出。

六、大力对工商业者进行宣传教育，动员他们迅速开业和恢复生产，加强物资交流，促进市场贸易，稳定物价。

此外，在市军管会的关怀下，军分区和商会共同组织商民护航队。4月中旬，护航大队30余人，分乘“德昌”、“桂德”、“安龙”三艘大船，满载桐油、茶油等土特产驶往梧州。与此同时，“泰德”电船首次由梧州送来大批生盐、洋纱及百货等。从此，使柳江上游的粮食土产，和下游的进口物资都得以充裕市场，从而平稳物价。因此，“从3月下旬开始，物价不断下跌。到5月中旬政府用一切措施使物价止跌为稳，以物价指数3月下旬为213.9，4月上旬为170.2，下旬为120.2，5月份上旬降至最低114.7，到5月中旬，开始稳定”（1950年11月25日柳州日报《一年来的财经工作》）。从而制止了在国民党统治下柳州12年来的通货膨胀。

# 记50年代柳州百货业的劳资关系

陈天泰

柳州解放初期，柳州百货全行业的店员工人有100人左右，主要分布在9家批发店。1951年春，百货店员工会和同业公会先后成立，店员参加工会活动，资方参加同业公会活动。为了协调劳资关系，1951年春，百货店员工会和百货同业公会建立了劳资协商会议。店员工会以张树声为首席代表，同业公会以陈天泰为首席代表。每次举行劳资协商会议，由劳资双方首席代表轮流主持。劳资协商会议建立后，共召开过约10次会议。协商的问题有：（一）关于资方不守法经营；（二）关于资方消极经营；（三）关于工人不够遵守劳动纪律；（四）工人提出工作时间过长；（五）关于工人的福利；（六）扩大城乡物资交流，送货下乡，为群众服务；（七）关于解雇工人；（八）店中节约开支，改善企业经营管理，以及创造条件争取走上国家资本主义道路，等等。根据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原则，为了协调劳资关系，搞好生产经营，经过双方协商，针对以上存在问题，议出解决办法，双方共同贯彻执行。例如：第一个问题，由同业公会对当事人进行教育，讲清政策法令，提高认识，指出错误，使其自觉遵守国家政策法令。第二个问题，也由同业公会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启发他们提高自我改造觉悟，使之安心经营，积极走上国家资本主义道路；同时工人也主动团结资方搞好生产经营，树立资方的经营信心。第三个问题，由工会对工

人进行教育，纠正劳动纪律松弛现象。第四个问题，过去工作时间超过12小时的改为营业时间和工作时间为12时。第五个问题，1953年年终，各店发给店员双薪，以后年终有盈利，按四马分肥的办法，除税收，公积金，股东红利三马之外，一马给工人25%的福利金。第六个问题，各店组织送货下乡时，劳资双方都踊跃参加。第七个问题，对合理解雇的工人，合情合理发给解雇费。第八个问题，各店进行节约开支。召开改善经营管理会议时，除工会和同业公会人员参加外，邀请劳动局派人参加。在会上动员资方人员及店员工人，月薪较高的，自愿将月薪降低，并将原制定的各店职工在店中开膳，伙食费用全部由店中开支的制度，无条件撤销。通过劳资协商，解决了劳资间的问题，协调了劳资间的关系，促进了生产经营发展，使私营企业积极接受社会主义改造。

1952年春夏，在全市私营工商商业中开展“五反”运动。在运动中店员工人毫不留情地大量检举揭发并力促一些老板坦白交待“五毒”行为。在六七月召开全行业的斗争大会，店员工人对严重违法户进行面对面斗争，令其在会上通一交待“五毒”行为。坦白交待好的给予宽大处理。百货业在“五反”定案中，对基本守法、半守法和严重违法户，分别处理，区别对待。经过“五反”运动教育，私营工商业者受到很大教育，基本上消除“五毒”，大家爱国守法经营。使企业逐步走上初级的国家资本主义道路，1956年全行业实行公私合营。

# 50年代国营企业财产 管理的两件小事

彭存立

1950年，党和国家发出为争取财政经济的根本好转而斗争的号召。柳州市广大干部职工热烈响应，团结一致、艰苦奋斗，发扬无私奉献精神，坚持勤俭办事原则，杜绝一切浪费现象。当时我是在花纱布公司工作，回忆起来，记忆犹新。现述两件小事：

## 两个笔筒帽

当时对国营企业财政的管理，是以财产的使用年限和价值分别按固定资产、低值易耗品、无价财产三大类来管理的。凡是单价达不到低值易耗品的要求，又非消耗性的物品，都称为无价财产，如办公用的算盘、沾水钢笔杆、毛笔笔帽、直尺等都属于这个范围。在管理上规定，购进物品要有计划，要有申请手续，购入后要登记、验收；领用时要分户记载，负责保管，不用的要交回。每个职工，都有一个领用公物卡片，由行政科总务管理。属于上述无偿财产的，领用人要负责到底，季末年末要进行盘点，工作调动，要列表交待，办好手续。记得1955年公司有一位副经理调任商业局副局长，在离职时，交回领用的公物仅仅短少了两个毛笔笔套，总务人员也坚持要办好报损手续，然后才在离职表上盖

章。当时当事人双方都认为这样做是理所当然的事，因而非常认真，丝毫没有小题大作或者是多余繁琐的想法。

### 一块竹片

在50年代初，国营企业在经营中留下的一些下脚料，如不计价的废包装品等，职工都以爱护国家财产的态度，认真收集，点滴归公。当时花纱布公司的商品，在批发拆大件时，所拆下的包皮铁丝、铁皮、垫角竹片等，大家都很仔细，尽量做到拆下的包装物完好，而且有专人收集，退回仓库，由公司有关部门统一处理，收入全部作为企业其他收入。职工都很自觉地把收集、保管下脚料的工作，视为本身的职责，所以经手这项工作的同志，每拆一捆布或一捆纱的包装物，都非常注意清点。发现不够，一定要找够。记得有一次拆布时，发现少了一块竹片，就到处查问、寻找，直到找到为止。

---

(上接73页)

在市政府的关心下，1958年，该厂并入了粮食局，改名为杂粮加工厂，迁入白沙，生产面条、切粉，并招收一批新工人。当时，谢锦荣已调走，调来了徐庆同志任书记；我任厂长，李焯任副厂长。

# 柳州市第一家公私合营企业 建立的经过

陈立初 口 述

陈广焜 记录整理

协生淀粉厂是柳州市第一家公私合营的企业。我自始至终参加合营的建立工作，现回忆如下。

1950年初，“友成隆”布行解体，另行合股成立了“协昌”绸布行，我任经理，李焯任副经理。为恢复发展工商业，1951年市委和市政府号召商业批发户转向工业，“协昌”商店响应号召，转业为协生榨油制粉厂。1952年，由于榨油原料不足，榨油车间（厂址在谷埠街）歇业，厂方将榨油车间卖给当时的一个劳改农场，另合并了几家响应商转工的沙街平码行（类似现在的经纪行），再由李焯到广东筹借到500元做流动资金，修建了淀粉车间，并改名为协生淀粉厂，加工木茄粉。厂址在今水南路67号。

协生厂在私营期间，一直得到市长魏伯、市委秘书长兼统战部长梁山等领导的关怀，首长们肯定我们响应市政府商转工号召的积极行动，要我们大力发展生产，支援国家建设，支援抗美援朝。当时由于缺乏工业生产和管理经验，加之人员过多，开支过大，经营十分困难。后来，在政府帮助下，向银行贷款3200元作流动资金，并与市外贸公司挂钩，以米料加工来维持生产。我本人当时任市工商联常委，在工

商联领半薪，在协生厂领半薪。我常带队下乡搞城乡物资交流工作，前后到过来宾等地推销产品。从1953年起，由组织保送，前后到南宁等地学习，达一年半之久。

1954年，通过学习，明确了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重大意义和方针政策，回厂后与李焯商量，我们认为这是势在必行。同时还觉得，如果没有政府的支持，我们协生厂早已蚀完本钱、关门散伙了，我们那点资产还算什么。记得私营时，我们的资金少，我有1400元左右，李焯约有5000元，而到合营前清产核资时，每人只余下几百元了。想到这些，对政府号召公私合营，我们都很拥护。于是我代表私方人员，第一个表示响应政府号召，搞公私合营。

不久，市政府派工作组来这里搞试点。我记得，工作组成员有谢锦荣、黄立义、康成禧等同志。有一天晚饭后，梁山、康成禧、胡习恒等同志从东门沙滩坐小船来厂里开会，动员清产核资。在按当时的价值估核各类资产工作中，我们没有斤斤计较个人得失，不争不闹，工作组十分满意。经过核算，全厂最后核定资产为2万元；顺利地完成了清产核资阶段工作。在公私合营过程中，我还多次在市召开的有关会议上，向同行介绍了协生厂合营工作情况和经验。

经过两个多月的充分酝酿和筹备，柳州市第一家公私合营企业协生淀粉厂，在1954年8月29日正式建立。市政府下文，由谢锦荣任公方厂长，负责全厂工作；我任私方厂长，负责业务洽谈工作；李焯任副厂长，负责安排生产。全部职工转入公私合营工作。

到了1957年底，由于当时原材料紧缺，厂里生产困难，该厂领导想将厂解散。但梁山不同意。 《下转71页》

# 柳城太平乡解放初民兵剿匪记

韦焕庚

1949年11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与柳北人民解放总队配合，共同解放了柳城县太平乡。太平乡解放后，国民党反动派残余和地主阶级妄图颠覆新生的人民政权，夺回他们失去的天堂。解放才3个月，恶霸地主全伯昭、梁昭懋就在1950年2月27日、3月5日，先后两次在杨梅、庙口屯组织土匪武装暴乱。

太平乡是中共地下组织活动的据点之一。1947年，柳北地下党组织就派党员到此进行革命活动，播下了革命的种子。1948年冬，柳北地下党以下良、板贡等村为据点，发动贫苦农民起来反抗国民党政府的“三征”（征兵、征粮、征税）。太平乡曾先后有100多人参加柳北人民解放总队的地下革命活动，有半数的村屯成立农会和民兵组织。

太平乡的民兵是保卫人民政权的一支重要武装力量。他们从1950年起，在单独与匪周旋，以寡敌众，击溃敌人多次进攻和配合解放军剿匪，都发挥重要作用。他们在战斗中英勇顽强，不怕牺牲，前赴后继，直到最后胜利。笔者当时是一名干部，参加过战斗，现将见闻、采访、查阅档案资料综述如下：

## 龙兴民兵初试锋芒

1948年冬，地下党员侯信来到龙兴村中扬屯发展廖明、

韦日欢等农民参加江猛武工总队。解放后1949年12月，韦日欢参加人民政府征粮工作队宣传征粮政策，恶霸地主韦日登怀恨在心，便勾结融安县大良乡新寨村匪首罗义勇（绰号马桶盖）、罗济群等组织土匪武装，于1950年3月28日围攻韦日欢家。韦日欢与罗琳等民兵武装抵抗。当时里品村下良村的民兵闻讯迅速赶来援救。土匪见势心惊，狼狈逃遁。

事后，韦日欢和一些民兵便转移到武装民兵较多的里品村驻守。敌人跟踪扑来。原国民党太平乡乡长地主恶霸韦日登便勾结融安县匪首罗济群、罗义勇等，纠集土匪40多人，于3月31日攻打里品村农会。该村民兵勇敢抵抗。融安县下清和村民兵韦志方等8人及时赶来支援，内外夹攻，敌人仓皇逃进深山。

龙兴村下良屯，是侯信烈士的老家，也是柳北游击队活动主要据点之一，侯信曾发动该村20多人参加柳北游击队，有的队员曾参加10多次战斗（其中有7人参加过抗日战争）。匪敌知道，要推翻太平乡红色政权，必先夺取下良屯民兵武器，因此，在1950年4月初，匪营长莫际益派匪兵数人来到下良村“借枪”。并威胁说，如不“借”，就有同融安县沙子区那10多个干部一样被杀的下场。民兵侯举才等面对凶匪，理直气壮地说：“要枪，只有把枪打成竹扫把才给你们！”匪敌用软的不行就用硬攻，先后三次派一匪连长率匪兵数十人攻打下良农会，结果均被民兵击溃。第三次来包围下良屯时，却被来此防守的龙兴、中洋、里品、古么、上塘、盒蛇等村屯30多名民兵共同英勇击退。从此，土匪再也不敢攻打下良、里品农会了。

## 板贡龙台民兵出奇制胜

由于解放前地下党的宣传教育，太平乡西部的板贡、龙台、珍洞等村农会民兵觉悟较高，基础较好，曾多次打退了比自己强大几倍的匪“湘桂黔边区第七纵队第四支队”司令陈德华、副司令兼县长陈德明股匪的进攻。

1950年4月22日晚，珍洞村民兵得到匪首陈德华将率匪路过珍洞村的情报后，原柳北游击队周桂才率板贡村民兵7人埋伏于新桥东北面；珍洞村农会副会长韦亮、民兵团副队长韦豪（均是原柳北游击队队员）率珍洞民兵20多人埋伏于新桥西北边，龙台村农会会长何廷昭、游击队队员何勋率民兵8人埋伏于离新桥四里的炭坳。当晚9时许，陈匪100多人进入新桥时，被新桥的埋伏民兵突然袭击。陈匪在溃逃中又被埋伏在北边的民兵阻击。陈匪在一片慌乱中放枪半小时许，便绕小道往龙头乡棋山村逃窜。次日黎明时，发现炭坳下还有散匪2人逃不出去，被农会民兵追击俘获，缴驳壳枪1支。清晨发现当铺里被击毙的匪尸4具。这次战斗缴匪迫击炮一门、马一匹、手枪一支，各种子弹400多发，以及其他军用物资，俘匪2人。陈德华原是国民党军团长，他一再自吹说什么，“解放军在湖南还是我的手下败将，土共的民兵，更不是我的对手。”可这下却被民兵打得丢马而逃。

1950年6月中旬，有一次龙台农会接到陈匪要来进犯龙台农会的情报后，由曾打了20年长工的农会会长何廷昭率民兵到金山坳埋伏。直到第4个晚上，陈匪40多人进入了伏击圈，当即被我民兵袭击。匪丢下伤匪2人，慌忙向棋山逃遁。

同年10月中旬，陈匪打算派一名中队长率匪进攻我古

蒙村农会。我们接得消息后，何廷昭又率民兵10多人，于10月23日抢先占据古蒙村的小岭。当晚匪30多人于半夜赶来围攻我左蒙农会，还纵火烧房，民兵居高临下猛攻，匪又逃之夭夭。

10月20日左右，六塘区政府转移到洛崖街，这时陈德明股匪更加嚣张，公开把布告贴到县城大铺街上，同时还写信造谣威胁龙台、板贡村农会干部说，六塘区土共已撤到洛崖，龙头乡民兵枪支大都被缴，你们要在10月29日那天拿枪到棋山村下维屯缴械投降，否则就要进村烧杀。经何廷昭与板贡农会长周善球等商量后，“答应”匪的要求，叫陈匪按时到下维屯等待。而在10月29日拂晓前，已由板贡民兵团长周桂英带领板贡龙台40多名武装民兵赶到下维，拂晓前分两路占据下维村边两个制高点。黎明，民兵周桂英（国民党起义人员，参加过解放军）吹响军号发起进攻，土匪以为解放大军来到，即化整为零，收藏枪支伪装老百姓逃走。

龙台、板贡、珍洞村的民兵，能多次出奇制胜，是由于与群众密切联系，因此，土匪的活动行踪讯息能及时掌握。如土匪在新桥被我伏击的前晚，上碑村有1名土匪骨干参赌，在深夜收场时，有人邀他明晚再来，他说，明晚要过太平那边，去把农会民兵全部铲光。得到此情报，及时作好部署，故能取得伏击胜利。

### 江头里湘鏖战

江头河是太平乡东部一条小河，距四十八界大山约10华里，自古以来这山界是土匪出没之地。太平乡山咀村，是四十八界大山之咀，解放初国民党的散兵游勇、特务在这里潜

伏，伺机反扑。1950年2月，在一河之隔的沙埔乡大安村的恶霸地主冯常钧（匪“桂中军政区”128军312师师长）先在白马山下的农场组织土匪暴动，后又与姚水妹、周龙甫、周世琼、张英甫（匪312师副师长）、孔孟梨（匪312师政工室主任兼县长）等股匪集结，匪组织从原100多人发展到500多人，并在山彝里建立匪巢。

江头河南岸的江头和里湘村，距山咀村10多华里。1949年春，柳北地下党曾到此活动，一些农民参加过柳北游击队。1950年春，乡干部又到此进一步巩固发展农会民兵组织。这里的民兵是解放军剿匪的得力助手，1950年5、6月间，在江头、里湘两村进行两次鏖战：

### 里湘战斗

旧历四月初，太平乡政府得到土匪即将来攻打里湘村的情报，初七晚即派出龙兴村农会的正副会长周开义、周承荣率民兵六人到里湘村防守。

旧历四月初八（公历5月24日）零时，冯常钧派匪首周龙甫率匪150多人扑来包围里湘农会。里湘民兵登上高房迎战，该村农会会长覃玉勋、副会长李祖运、民兵团长莫继武带领民兵配合激战。土匪喊杀连天，不敢进攻，纵火烧房。纵火的匪中队长罗光福，当场被我民兵击毙。覃玉勋脚虽受伤，仍指挥战斗。激战到上午九时许，区中队10多人，加上黄宜村民兵共20多人赶来，登上花山尾岭头，沿岭顶冲过去，下良村民兵由观音岩爬上龙寨岭，在两路援兵夹击下，匪边惊呼“解放军来了”边慌忙逃窜。这仗中午结束。匪烧房9间，抢去耕牛11头。民兵覃秀养在战斗中壮烈牺牲。

## 江头战斗

旧历五月初十，匪营长莫际益等到山咀村向匪正副师长冯常钩、张英甫报告，说江头村民兵约10人，都是无战斗经验的穷汉子，只有手枪、步枪，还说太平街无驻军。冯匪听后，决定亲自率匪来围攻（冯匪抗日时期，当过自卫队队长，1949年任柳城县民团总队副队长）。旧历五月十二日（公历6月26日）冯派一匪连长在山咀村，强迫群众拆门板搭浮桥。当夜土匪600多人倾巢出动（其中箩筐队100多人）。

26日拂晓，由国民党江头村村长带匪包围江头村。冯匪600多人摆阵在10里长的战线上，由山咀村的马屁股岭至近村、芳田村、仁村、山票村、外甫村、上造村直至江头村背，把江头村团团围住。冯匪认为，自己有这么多人枪，其中还有机枪5挺，八二炮2门，又有一批国民党正规军的散兵，这一下是“大拳头打蚂蚁了”。

在先，我江头村民兵早已从各方面做好战斗充分准备：1、疏散群众和耕牛；2、布置好站岗放哨；3、到太平乡政府领取更多的枪支子弹；4、把石灰搬上炮楼，以便在拼枪托时用石灰撒匪眼睛；5、在炮楼下挖新枪眼。

26日晨，江头村四周遍是土匪，黑压压一大群。民兵们都沉着气，待土匪冲近时，突然猛烈反击。这时，在江头村西边油榨房的匪机枪集中火力向民兵驻的炮楼扫射，南边土匪则攻炮楼正面。战斗直至中午匪未敢进村。太平乡的1名乡警升为匪排长刚3天，他为了抢头功以报答匪首的恩宠，在匪密集的火力掩护下，冲到炮楼西侧的平房边，被我民兵队长莫继武击毙。同时农会小组长莫怀献向南击伤一匪。匪

攻势受挫，便纵火烧房。

在匪进攻江头村的头一天，大埔区政府已把板贡村的民兵调到太平街。次日上午10时许，周桂才率板贡民兵8人与乡干部一起登上花山，居高临下，攻击花山下仁村的土匪。板贡村农会会长周善球也率领民兵与周桂才并肩作战。冯匪知道仁村是战线中间地带，离近村河仅3华里，如中间突破，近村浮桥被攻，退路被堵，有全部覆灭之险，因此用机枪和八二炮猛轰民兵阵地。民兵坚守阵地，在仁村背激战6小时。

中午十二时许，下良村民兵六人，赶到江头村西北的龙肚山猛攻匪阵地。下午二时许，匪为抢出死尸，以密集的火力攻民兵的炮楼。激战正酣时，龙兴村农会会长周开义率5名民兵赶到，在江头村背东北边开辟第4个反击点，向匪阵地攻击。这样，匪摆设由山咀村的马屁股岭到江头村背10华里长战线，被我民兵四处突破，终于击溃了敌人。这是保卫太平乡红色政权关键一仗。我民兵无一伤亡。土匪在这里烧房23间，抢谷160多担，砸锅头30多个，猪、鸡、鸭、衣、被等洗劫一空。

### 配合解放军重点剿匪

1950年6月，美帝侵略朝鲜，妄图入侵我国。敌人乘机大肆造谣，说第三次世界大战就要打起来了，美帝和蒋介石就要打回来了。7至10月间，全县匪乱逐月猖狂起来。10月下旬，六塘区政府转移洛崖街，敌人又乘机散布谣言，说共产党败走了。10月下旬，全县匪乱达顶峰，到处烧杀抢劫，奸淫掳掠。1950年正月20日（公历3月8日）盘踞于柳城、

融安、鹿寨三县交界处的匪首罗义勇由其老家融安县大良乡新寨村窜到太平乡赤罗村，勾结恶霸周世琮到四十八鼻建立土匪组织，罗任匪中队长（后任副大队长）。

四十八鼻位处柳城、鹿寨、融安三县交界处，东西长约40多华里，南北长约60多华里，鼻里山峰林立，山高洞多，洞洞相连，易于潜伏，是土匪的巢穴。从1950年春起，匪“反共救国军桂中军政区”司令部司令何次山，副司令兼128军军长向天雷（何中钊）等匪首就活动于这个山鼻及其边沿地带。匪128军312师师长冯常钧等，活动于山鼻和边沿柳城县的山咀、六广、尖石、古六、章村一带。

冯匪于山咀、满往、古六、章村等地骚扰被我击败溃逃后，1950年10月26日，又在融安县泗顶圩被大军围剿，死伤100多人，被俘100多人。冯匪残部与直属营长姚水妹股匪共50多人又于11月窜回沙埔乡大安村及山咀交界的白马山一带骚扰群众。12月冯匪又逃到四十八鼻的金洞等地，与匪营长莫际益、韦学刚等集结，设卡放哨，不准群众来往，封锁消息。白天到太平乡木界村威胁群众要粮，晚上一部份驻山上，一部份驻村里，还派人到沙埔、太平刺探我军情报。1951年元月2日，冯匪与罗义勇、莫际益、韦学刚、姚水妹等股匪活动于四十八鼻的黄村、板料、古板、饭洞、古雨一带山鼻，在锅底鼻等地搭茅棚居住，匪首周龙甫和二子周世琮于10月30日率匪潜到龙头乡棋山村一带，与陈德华合为一股，作垂死挣扎。

根据毛主席的指示，由广西省军区部署，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2军统一指挥，进行重点剿匪。为了歼灭四十八鼻一带残匪，解放军215师配合地方在鹿寨县雒容镇召开鹿寨、

柳城、融安三县县委书记会议，会议决定从3月20日开始，向四十八界全面进剿。鹿寨、柳城、融安三县民兵2937人（其中太平区民兵500多人），配合解放军215师，柳州军分区437团、438团，桂林军分区440团共同进剿。

匪司令何次山是回乡的国民党军官，副司令向天雷（何中判）从香港派来。他们诡计多端，对匪众施“连环保”和“（向共产党）缴枪者，杀无赦”等手段。在重点进剿前他们杀了不少投降的匪众。还强迫群众搞“空室清野”，“人上山、物入洞”，造成匪民难分。同时破坏道路，设施障碍，加上界内地形复杂，山大洞多，有的洞长达十多华里，而且丛林密草，山路崎岖，因此，进剿十分艰难。

从1951年3月19日深夜开始，解放军在民兵的配合下，以民兵为向导，分27路进剿。当时采取村村驻兵的办法，宣传发动群众，由于解放军和民兵模范遵守纪律，群众信任，在进界5天内，上山躲避的群众全部回家。民兵与大军一道，白天搜山，夜间伏击。白天，哪里冒烟就往那里搜；晚上，哪里有火亮就往那里围。逼得土匪无法煮吃。同时动员群众挑粮下山，出村劳动不带食物。这样迫使有的土匪饿了化装成老太婆出来找红薯吃，被我民兵捕捉或击毙，如匪副司令向天雷就是下山找红薯被我活捉的。也有不少土匪找不到粮食饿死在山上。匪司令何次山在大白天煮吃冒烟被发现，由民兵引路，大军追踪，将何匪击毙，同时毙俘其卫兵各1人，缴枪3支。匪师长冯常钧逃到鹿寨县高坡村被我民兵抓获。

中共太平区委十分重视民兵工作，3月20日，区委召开农会会长、民兵队长会议，部署民兵配合大军进行重点剿

匪，会后组织民兵2百多人运粮，把1万2千多斤粮食送到前线。同时发动全区民兵在各地放哨守卡、夜间巡逻，布下天罗地网。

民兵运用“民”的特点，与群众紧密结合，在剿匪中发挥了多方面的作用。3月19日深夜，原游击队小队长侯才、覃飞带领民兵30多人进到崖内上油村。行进到响水崖的羊肠小道时，突然有一人冒充民兵扛进队伍，民兵立即搜查辨认，这人原是匪副官。搜身得12枚大印。在进剿中侯才等民兵曾分别为解放军作30多次向导，与解放军分头到过30多个村庄共同发动群众，其间，参与大军帮群众打柴、喂猪、种菜、扫地等服务劳动。一天，游击队员周祖通、曾荣率领民兵10多人到融安县大良区古龙村侦察时，了解到一匪连长在山洞里躲藏，便对其母亲做劝导教育工作，终于劝得其母叫子出来投降。3月25日深夜，里湘村民兵覃健民、莫尔清等巡逻村附近的山岭，发现匪莫尔腾（地主）、匪连长覃老彩躲在独寨岩里，当即发动民兵围剿，结果把覃老彩击毙于山脚，莫尔腾逃到山顶，也被活捉公审枪决。另外匪首罗义勇于3月27日早爬到崖边下脉屯讨饭吃时被我民兵紧追击毙。匪营长莫际益、罗荣生于3月28日晨逃到西岸村讨吃，也先后被我民兵侦查击毙，共缴得枪3支。军民配合进剿，散匪纷纷落网，至4月6日已歼敌4744名，其中排长以上315名。

### 开展政治攻势瓦解土匪

在近一年半的剿匪中，民兵协助大军在军事进剿的同时，发挥民兵的优势，开展强大的政治攻势，对分化瓦解土

**匪**队伍，起到很大作用。

在进剿满往的战斗中，民兵侯引太用壮语喊话、宣传我宽大俘虏的政策，感召了土匪。据后来被俘的匪众说，听了喊话早就想投降，只是匪首拿手枪在背后逼着他们打。匪“前进指挥所”副主任周龙甫、匪大队长周世琮等7名匪首，原先负隅顽抗，由于民兵配合大军做大量的宣传工作，在强大的政治攻势下终于分化瓦解，除周龙甫、周世琮逃到罗城县三防，于1951年4月被俘公审处决外，其余5人均先后投降。赤罗村农会会长周黄吉，民兵队长周自修，先是劝得匪众周庭玉投降，后又叫周庭玉到龙头乡棋山村，以自己得到宽大的事实现身说法，感召了匪支队副司令陈德华、周世琳，于1950年12月7日到县公安局自新。接着周世理、周世斌、周德彪等匪纷纷自首。

民兵在协助解放军剿匪中，英勇顽强，艰苦努力，受到党和人民政府及解放军和群众的好评。1951年4月周胜利完成剿匪任务，民兵光荣回家。解放军高度称赞民兵的作用，说民兵既能打仗，又会做群众工作。称民兵是“五员”，一是战斗员，二是宣传员，三是翻译员，四是向导员，五是侦察员。

# 解放初期投诚人员在柳城 改造自新的回忆

何宗棠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1兵团第53军217师651团，于1950年10月由湖南醴陵进军广西剿匪。1951年2月，由该团政治处负责，集中800多名原“反共救国军”自新人员，在柳城大埔办学习班，进行改造自新教育。学习班工作干部是36名解放军官兵。

这些解放军干部，一年前大多原是国民党军湖南省陈明仁部队的军官，其中有无线电通信大队教官、电台台长、尉级报务员等人员。他们于1949年8月起义后，改编归解放军21兵团，送进湖南军政大学学习。毕业后来此担任学习班工作干部，转而教育自新人员。我是1950年元月在广西南丹县起义（原国民党桂西军政区莫树杰部和平改编），改编后送桂林广西军政大学学习，毕业后参军，调进湖南21兵团的。651团工作队党支部也派了一些学生出身的工作干部来担任政治指导员。在学习班中，这些干部不但热情宣传党的方针政策，耐心教育，以理服人，而且还以自己起义投诚得到宽大处理和优待的事实，现身说法，从而感化了学习班的自新人员。

在两个月的教育改造中，工作干部同自新人员同吃同住，促膝谈心。教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没有共

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谁养活谁》、《军民团结来剿匪》等新歌；上政治课、形势课，宣传抗美援朝的意义，阐明中朝人民必胜，美帝必败的道理。还开展阶级教育，通过诉旧社会的苦，说新社会的甜，算细帐，挖苦根、认清地主阶级剥削压迫人民的本质，树立一心跟着共产党走的思想。

在“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立大功受奖”和“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等政策感召下，许多自新人员交待了自己的问题，认识了错误，检举揭发了土匪头的罪行，还提出要带路去抓土匪。不少人交出了隐藏的枪支弹药。例如，我在的一中队的170多自新人员中，交出步枪子弹1千多发，手枪子弹3百多发，手榴弹2百多枚，各种手枪40多支，其中有美国左轮手枪2支，美国拉八1支，日本手枪1支。通过学习，激发了他们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热情，年纪在22岁以下的适龄青年积极报名参军去抗美援朝。

那年，柳城县人民政府县长龙腾，在自新学习班开学和结业的会上，曾到会讲话。

# 柳州解放后最初的文 艺演出活动

■ 楚文林 庞邵元

1949年11月25日柳州解放。12月上旬的一天，柳州专区专员魏伯（后为柳州市首任市长）路过娱乐戏院（今人民电影院）时，进入院内找到桂剧艺人王昌明、王昌宗等人，了解剧团情况，并向他们讲解共产党的政策，希望剧团尽早地恢复演出，以安定民心。不久，振业桂剧团在娱乐戏院演出了《洪武登基》、《木兰从军》、《三岔口》等传统剧目，以庆祝解放。这是柳州市解放后最先恢复演出的剧团。1950年元月，市军管会文教接管组组长沈章平邀请在柳州的零散艺人座谈，号召他们组班建团，恢复演出。一些流散在外的艺人，闻讯相继回归。艺人们一反过去受股东老板长期把持戏班的状况，自己组织共和班戏班，自己管理。于是柳州市先后成立桂剧工作团（简称桂工团），50余人，团长王盈秋；联艺桂剧团，百余人，团长廖斌南，副团长肖平武；群联桂剧团，80余人，团长何金章。同年5月，粤剧界有叶少玉组建飞龙粤剧团，在河北商场罗池戏院演出；10月，有粤剧艺人朱笑珊、玉英英来柳，组建了群星粤剧团，在河南商场演出。党的繁荣文艺政策使长期在农村演出的地方剧种——彩调剧也相继进了柳州演出并扎根。1950年10月，有黄村调子艺人重组的同乐调子班在河南商场（今东风商场）演出，石

龙调子艺人叶瑾坤组建的石龙调子班在马鞍山脚演出；柳州市调子艺人张远来到永福去邀请彩调“名丑”汤义甫到柳州组建了以永福县的调子艺人为主的桂乐调子班，在河北西园饭店、鸿发茶社演出，后又迁到河南商场演出。这个戏班发展成为今天的柳州市彩调剧团。而“桂工团”、“联艺”、“群联”及粤剧的“飞龙”、“群星”分别为柳州市桂剧团、粤剧团的前身。柳州市在解放后仅仅几个月时间，即汇集了桂剧、粤剧、彩调剧的8个剧团（戏班）演出，对活跃群众生活、安定民心、稳定社会秩序起到一定作用，也为柳州戏剧事业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柳州市戏剧界人士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当时，剧团是民营的，自负盈亏，艺人的生活也很困难。尽管这样，他们仍积极为抗美援朝捐献。1951年6月，群联桂剧团、联艺桂剧团、桂剧工作团响应文艺界捐献“鲁迅号”飞机的号召，举行义演，历时51天，将门票收入300多万元（旧币）全数捐献。8月，柳州市飞龙粤剧团、群星粤剧团由玉英英、杨秀珍、余海珊、潮流发、吴尚英、邝艳非、唐丽卿、罗剑虹、朱翠云等主演，联合演出《狂歌入汉关》，所得门票收入也全部捐献。

1950年10月，柳州市出席华南文代会代表丘行，在解放电影院（原中央大戏院）向全市文艺工作者传达会议精神，从旧社会过来的艺人们，从此明确了党指出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也认识到，当时的文艺工作是为保卫世界和平，争取人民民主和为党的中心工作服务。因此12月间桂剧工作团排练演出《白毛女》、《九件衣》、《仇深似海》，配合阶级教育、发动群众进行清匪反霸和土改等运动。1951

# “名丑”汤义甫和他在柳州 彩调剧团的活动

庞邵元

汤义甫（字友生）是柳州市彩调剧团名丑角演员。他原籍永福县湾里村，生于1908年，卒于1971年，享年63岁。

汤义甫长于丑行，其它烂丑、摇旦、老生也很在行。建国前，他曾到桂林地区的临桂及柳州地区的鹿寨等县农村演出彩调戏并开馆授徒。他所扮演的丑角，表演滑稽、幽默。他在自己的拿手戏《海老三卖罗裙》中饰海老三一角，活灵活现地塑造了一个赌鬼的形象。在《卖嫂失妻》中，他扮演吕保，更为成功。他用幽默的语言，夸张的动作，逼真的神情，讽刺的手法，把一个吹烟鬼、无赖之徒的丑恶灵魂表现得淋漓尽致。观众看后捧腹大笑拍手称绝。除此之外，他扮演《四妹反情》中的李四（正丑）、《兄弟和睦》中的陈二（烂丑）、《毛国珍打铁》中的毛国珍（小丑）等角色，都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他不仅长于喜剧，对正剧、悲剧也

---

年冬，柳州桂剧工作团及由桂林实验剧团来柳的尹羲、周文生、周英等10人编入广西省土改巡回剧团第三分团，配合土改宣传，巡回柳州地区县镇演出。演出新戏《九件衣》、《白毛女》、《仇深似海》、《小二黑结婚》等。历时两月之久。推动了清匪反霸，土地改革运动的开展。

都深有造诣。如《娘送女》中的娘（摇旦）、《云南追夫》中的老根须（老生）等人物，也都饰演得真实感人，令人观后难忘。他一生曾在《长春教子》、《石崇谋妻》、《李四下湖北》、《胡三连砍柴》、《张古董借妻》、《王八卖侄》、《甘托生对帐》等100多个彩调剧中担任主要角色。

汤义甫是柳州市彩调剧团的创建人之一。1950年10月，柳州彩调艺人张远来去永福县找到汤义甫，请他组班到柳州市演出。汤义甫即邀请了永福县白马村的彩调艺人吕九、吕九弟（丑），湾里村的龙世源（花旦）、平岭村的陈庚弟（小生）、刘王弟（二胡）、黄岭村的李荀妹（老旦）、陈八斤（花旦）、高街的戴癸甫（丑）、林翠莲（花脸）及毛八妹（杂角）、吕小弟（杂角）、梁六（管箱）等13人，组成了桂乐调子班，来到柳州河北柳荫路“西园”（即今二轻礼堂）及映山街鸿发茶社演出，时达半年之久。演出的剧目有《娘送女》、《毛国珍打铁》、《跑菜园》、《七仙姑下凡》、《张古董借妻》、《卖子投崖》、《蒋三下南京》、《打狗劝夫》、《打楼救弟》、《三份家财》、《胡三连砍柴》，《三看亲》、《双看相》、《卖嫂失妻》、《浪子回头》、《店房换妻》、《卖罗裙》等20余个剧目，其中《娘送女》最为叫座。

1950年冬至1951年春，柳州市不仅有桂乐调子班在河北演出，也有由黄村调子艺人龙光显组织的同乐调子班在河南商场同乐茶社演出，还有石龙调子艺人叶瑾坤组织的石龙调子班在马鞍山脚演出。这是柳州戏剧演出从未有过的情况。

1951年4月，同乐调子班、石龙调子班因故解散。桂乐

调子班受同乐茶社老板的邀请，迁到河南同乐茶社作长期的固定演出，更名桂乐彩调团。为了扩充剧团的阵容，提高演出质量，汤义甫四处邀请彩调名角，使桂乐调子班人员从12人增加到29人。增加的人员有莫景光（主胡）、阳怀卿（生）、李群英（花旦）、黄松林（花旦）、樊桂连（小生）、林秀发（小生）、周秀弯（花旦）、唐德山（丑）、莫怜菲（花旦）、叶瑾坤（上手）、叶春旺（下手）、林子南（生）等等。

1951年秋，广西农村进行土地改革，桂乐彩调剧团的部份人员离开了剧团，返回家乡参加土改，以求分田分地。剧团仅剩下汤义甫、阳怀卿、李群英、林秀发、叶瑾坤、叶春旺、龙世源、唐德山、田菊英、黄云晖、莫怜菲、吴超等13人，其中有3人还是前台工作人员，因此，演出日渐萧条，收入菲薄，已濒临解体。这是剧团最困难的时期。汤义甫带头坚持演出，他毅然脱下金戒指兑钱换粮，以解剧团燃眉之急，而且还继续组织演出。由于大家的共同努力，使剧团保留下来，为后来的柳州彩调团奠定基础。

1952年10月，市文教局把桂乐彩调团易名为和平彩调团纳入国营范围。陆义寿为团长，何佩云为副团长，汤义甫为团委、艺委会成员。1959年改为国营柳州市彩调团。1974年定名为柳州市彩调剧团。

# 鱼峰业余文艺学校创办始末

朱光华

鱼峰区政府为了速成培养基层文艺人员，于1958年秋开办了一所两年制的文艺学校，由鱼峰区文教科主办。文艺学校开设文学、美术、戏剧（桂剧、彩调、文场、京剧）及歌舞四个专业班。

校址在太平东街驾鹤公社（今鱼峰区干部宿舍）内，由鱼峰区政府聘请授课教师与行政人员。最初由中共鱼峰区委宣传部部长马龙飞兼任校长，不久调柳石公社主任麦遂隆专任校长，聘李彦为教务主任兼文学班教师，聘朱午迟为美术班教师，戏剧班分别请董双山（桂剧）、李卓才、沈善文（彩调、文场）、刘艳侠（京剧）担任教师。聘张玲为歌舞班教师。文印收发员王丽和张玲亦精通桂剧，于是又兼桂剧班的辅导员。当时我任学校秘书干事，协助校长处理日常教学及行政事务。总务主任韦承德的工作最为繁琐，一人忙不过来，文学班学员侯中源自告奋勇，协助总务专管发饭菜票及伙食事务。学校的机构编制人员，彼此协助兼任，还算是精兵简政的。

值得提出的是，这所文艺学校的开办经费，不是由政府拨款。全由当时的制钳社、起重工具厂、陶器厂等几间民办工厂全力资助的，承担100多学员的食宿。本着节俭办学的精神，更没有大兴土木，而是因陋就简，在校内用木板间隔了两间男女宿舍，床是太平铺，规定学员一律在校住宿，衣物

日用品自备。伙食每日3餐，集中在天马食堂（今屏山小学对面）开饭，每人每餐凭票备领饭一罐，菜铺饭上，青菜小肉，大家都吃得十分香甜，乐滋滋的。

学校录取的学员均通过初中文化考试，正规考选。文学班考语文、政治，美术班加试基础素描，戏剧班、歌舞班除考语文及政治外由任课老师进行口试并审视身段、仪表相貌，还作即兴演唱及表演舞蹈动作。最后录取文学班20多人，美术班20多人，戏剧班30多人，歌舞班30多人。全校共130人。在1958年12月中旬正式上课。

当时学校没有正规的课本教材，乃由各科老师参阅搜集有关资料，结合实际，自编教学大纲和授课讲义，印发给学员。如文学班选取我国古今名篇，重点在近代现代文学作品，并加授应用文体。戏剧班和歌舞班利用校内原有的一个小舞台，台前有大空地作为练功和排练的场地。美术班晴天一般外出风景写生，雨天在校内临摹人体和静物素描。朱午迟老师当年已年逾花甲，他是柳州地方名士，诗词书画戏曲都有专长，抗日时期，柳州一流的大戏院“曲园”的建筑造型和舞台设计都出自朱老之手。学员们对他十分敬重。朱老对教学更是严谨要求，如果有学员上交的作业有马虎之处，往往被通还作多次重画。总务韦承德亦擅长水彩画，成为了朱老的西画助教。

通过两年办学，这所民办文艺学校，培养了一批人才，成为备战线的领导和业务骨干，如文学班的侯中源，后来在区市报刊发表了不少文学作品，成了柳州市作家。美术班的刘道正、方大庆都进了工艺美术厂，专攻美术设计，刘道正还担任了该厂的业务副厂长。美术班的何志云也进了美陶

## 50年代下乡蹲点记

覃忠恒

1953年，党中央向全国农村发出组织农民开展大生产运动和组织农业互助合作、引导农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号召。当时我是在中共柳江县委工作。领导研究决定抽我到成团乡蹲点，发动农民搞大生产并进行互助合作试点。那年春节刚过，组织找我谈话，明确任务，我当即愉快地接受了。当时我年仅22岁，是个新晋团员，朝气蓬勃，党指向哪里我就奔到那里。那时是执行供给制的，我把发得的衣服、被子、蚊帐等用品捆成背包。4月3日，我背起行李从县城拉堡步行近两个小时到达成团乡金磊屯。当时在金磊屯蹲点的工作队领导小组负责人是柳州专署互助合作科科长莫尚礼同志。他住在覃龙保家。经研究安排我住在熊贵民家。他家3口人，贵民的母亲年过半百，贵民是个20岁的青年人。我背行李来到他家时，贵民妈很热情地接待，她对我说：“小覃同志，你和贵民共睡一个铺，你们像亲兄弟一样，互相关照。”这是一间用木板隔着约有10平方米泥砖墙的小房，厨房就在对面那一米多宽两米多长的巷道中。

---

厂，曾任副厂长。歌舞班和戏剧班的学员进步很快，成绩优良，在校期间1959年于河南文化馆作过多次对外演出，颇得群众喜爱，经常满座。他们毕业后大都成了街道基层文艺宣传队的骨干。

蹲点领导小组的同志提出蹲点的具体任务是：领导农民发展生产、改善生活；组织农业互助组、合作社，互助组合作社的生产和农民收入要达到和超过当地中农的水平；教育引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时值春耕下种季节，农民赶着犁田、耙田和运肥下田，一片繁忙景象。俗话说，“早出三早当一工”。我和贵民每早起床洗完脸就出工了。做两个小时的活路才回来吃早饭。我们年轻人，挑担都是百把斤一担。开始头几天感到腰酸腿痛，过了几天就慢慢习惯了；越做越勤，一心都想农业大丰收。蹲点两年多时间，除了开会和学习外，每天都与住户共同下田劳动。有的老农见到沉甸甸的稻子压在我的肩上，怕我劳累，总是劝我们多休息。而我们不但白天和农民一样劳动，晚上还要走家串户，找群众谈心、交朋友，了解民情，组织群众学习党的方针政策，进行爱国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号召群众组织互助组，搞大生产，多打粮食、支援国家建设。

为了带动群众夺高产，我和住户研究选择一块距村400多米远，蓄积1亩零6厘的田亩作为高产试验田，计划亩产要达8百斤以上。为此我和技术员研究、采用科学种田、科学管理办法。精耕细作，合理密植，放足基肥，亩放70多担，追肥亩放人粪尿20多担、壮苗晒田，及时防治病虫害。基肥不够，我和贵民就到成团岭背拉牛粪。在我们的带动下，互助组的10多户都采用了先进技术措施，精耕细作，加工施肥。为以点带面，我们还组织一些有代表性的群众到田头参观，看禾苗长势，到收割时，又组织验收过秤。我们这块高产田，头苗亩产860多斤，比常年亩产增产400多斤。丰收的事实教育群众克服保守思想。因而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

经过一年的艰苦努力，全屯终于夺得了生产大丰收，平均亩产达1500~1600斤，比常年每亩增产两百多斤。互助组、合作社社员收入超过了当地中农的生活水平。农民们丰收不忘国家，积极卖爱国粮。住户熊贵民卖了2000多斤，起了带头作用。互助组长覃龙保，积极分子韦老二、熊成富、熊振韬等每户都卖1000多斤，从而带动了全屯、全村掀起了卖粮给国家的热潮。

我去蹲点的第一年，了解到有些群众在春荒时生活有困难，我们就组织他们搞副业生产。种完头苗后，组织一部分劳动力到百朋供销社帮运生麸，增加了农民们收入，其中几户很困难的农民也渡过了春荒，使广大农民发挥了生产积极性。在与群众“三同”中，我们了解到有个中杰妈的仔刚去当兵，她老人家有思想顾虑，怕活路做不开、生活困难。于是我和屯里青年熊群凤来到她家和她谈心，讲清中杰去当兵保家卫国是应该的和光荣的道理，到了农忙季节，我们还组织互助组里的年轻人到她家帮她担水劈柴。平时到她家问寒问暖。中杰妈放心了，就写信给她的娃仔，鼓励他安心服兵役。

我下乡蹲点两年，与农民群众“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群众有心里话都对我说，亲如一家。工作队提高了他们的思想觉悟，为他们解决了许多困难。他们很感激，我离村时都依依不舍，含着热泪送别。

## 柳江县水利建设简况

覃桂禄

民国28年(1939年)原桂系军政要人李宗仁、夏威等在柳江县洛满乡兴办垦殖区，国民党广西省政府拨款，请来美国技师设计、指导，兴建成凤山河混凝土拦水坝工程。该坝高3.2米，长78米，干渠长9.67公里，灌溉面积6000亩。这个工程，后来还用了联合国救济总署广西分署赈米600吨，工款350万元(当时法币)作补充资金。民国35年(1946年)，国民党政府又在进德乡楂山屯安装一台8匹马力的内燃抽水机，给农民抽水灌田。除此以外，柳江县解放前再没有更大的水利设施了。全县农田灌溉用水，主要靠县内的逢吉、凤山、里雍、王眉、大桥、大渡、拉仁7条小河水源。农民或用石块垒坝拦河引水，或在河边安装竹筒水车提水灌田。在引水灌溉不到的田亩或在受旱时，就用戽斗、龙骨车抗旱。据解放初期统计，仅进德乡就有龙骨车1千多架，逢吉河设有竹筒车共72处，凤山河有46处。在解放前夕，全县有效灌溉面积为46200多亩，占全县水旱田的17.3%。

由于水利设施差，抗旱能力低，生产难以发展，群众生活很贫苦，旱灾之年尤甚。民国35年(1946年)全县大旱。据当年柳州《大时代报》报道，柳江县“去年一度陷敌(日军侵略)，去秋晚稻又遭虫害失收”，加上今年“久旱不雨”，“一般农民多以糠秕、树叶及草根裹腹”，“饥饿人数日在增加中”，“全县农户有十分之七、八无米为炊”。

解放后，中共柳江县委和县政府积极领导和发动全县人民大力兴修水利。笔者50年代在中学读书时，曾随师生到柳江县三都乡工农水库劳动，当时在工地上听到了县委书记武绍庭作关于全县水利建设工作的报告。全县各地正在开展轰轰烈烈的兴修水利群众运动，各行各业支援水利建设，在工地上看到了群众大干的动人情景。近年翻阅了历史资料，拜访了参与当年水利建设的领导和群众，现将柳江县水利建设的兴起和发展简况记述如下：

#### 1950~1957年

建国初，柳江县委县政府从国民党接收下的水利破烂摊子，百事待举。但当时由于国家财力有限，技术设施不足，经验缺乏和社会工作繁忙等原因，所以水利建设多是小修小补。

1955年春旱时，开始在进德、百朋、洛满、土博、穿山等地方安装了58台马拉抽水机。并续建凤山河引水工程，新建了竹山水库、横岭水库、逢吉河引水工程和一些小型水利，至今仍在受益。

这一时期的水利投资125.14万元，投入199.28万工，扩大有效灌溉面积1.29万亩，增加每一亩面积投资97元，每亩投工154工。

#### 1958~1962年

从1958年起，柳江县委和县人民政府动员全县人民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开展大规模的兴修水利运动。以工地为家，安营扎寨，抢晴天，战雨天，日夜大干，先后兴

建的工程有：

- 1、龙怀、工农中型水库；
- 2、武岗、官塘、里团、三斗、恭桐、桂林、岜浪、龙团、弄村、其林、泗浪、石桥、凤山、笔架等小（一）型水库；
- 3、琼林、石潭、打罗、只背、大塘、岸村、芳塘、同吉、太阳冲、绿照、洛满村、水潭、岜公塘等小（二）型水库；
- 4、兴建大渡河引水工程。

经过几年的艰苦奋斗，全县有效灌溉面积从1956年的6.65万亩增至1962年的11.55万亩，水利建设取得巨大成就。但由于上马工程过多，技术力量不够，加上当时只强调敢想敢干精神，注重追求进度，忽视科学治理，遗留的问题也不少。

这一时期的水利投资341.78万元，投工408.59万工，扩灌有效灌溉面积5.64万亩，每增加一亩有效灌溉面积需用投资60.6元，每亩投工85工。

## 二

### 1963~1970年

1963年进入发展电灌工程新阶段。鉴于前些年兴建的水利工程还未全面配套好，未能全面发挥其保水和抗旱作用，致使在1963年大旱时，不少农田未能保收。当年全县粮食总产从1962年的14124万斤下降到9673万斤。为此，从1963年起，在对全县原有水利工程进行续建和配套的同时，进而大办电灌工程，首先从柳州河西变电站拉10千伏高压线到拉堡

镇，再从拉堡架线到槎山、基隆、三千、四连、沙子、思贤、进德、白山、黄岭等村。第一批共兴建电站40处，装机容量642千瓦。1963年8月，县里首次用上了大电网的电。1964年，继续兴办第二期电灌工程，将高压线延续到进德、百朋、成团公社，兴建电灌站44处，装机容量740.5千瓦。1965年以后，又继续延伸高压线路，拉到进德、百朋、成团、三都的35千伏输电线23公里及10千伏高压线75公里，共安装电灌102台，296千瓦。同时还建立了洛满码头及穿山、土博、里雍等地的零星电灌站。与此同时，又陆续兴建了北弓、江村两座小（一）型水库及和村、下送、庙门、北河、母猪山、邓村、红岩、四丈、横山、六兰等小（二）型水库，进一步发挥了抗旱保水作用。

这一时期共用投资651.57万元，用工日547.74万工。新增有效灌溉面积14.66万亩，平均每亩投资44.4元，每亩用工39工，是我县年增灌溉面积最多，每亩投资最少，投工最少的一个时期。

### 三

#### 1971～1975年

过去全县水利建设虽有很大发展，但水利工程的分布还不够平衡，一些地方稍有旱象仍然受灾。因此，柳江县委和县政府作出了新的规划：1、兴建长46公里的龙南千渠，把县里较大的龙怀、北弓、白露洞、里团等骨干工程联成一个可以调节水量的灌溉网，实现北水南调的计划；2、兴建糯米滩水轮泵站，解决洛满灌溉问题；3、兴建葫芦岭电灌渠道，灌溉穿山、成团及进德琼林受旱片。为了实现以上计

划，从1972年10月开始，全县又掀起轰轰烈烈的水利建设运动新高潮。在大干以上三大工程的同时，还进行园田化和山水田林路综合治理，并对现有水利工程配套，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也还有些工程大兵团作战，缺乏严密计划、严格施工，致使工程建成后未能起到应起的作用。

这一时期水利总投资1234.29万元，总用工日755.64万工，新增有效灌溉面积5.56万亩，平均每亩投资222元，每亩投工135工。

#### 四

1976～1980年。

这一时期头两年，全县仍继续对现有水利工程进行配套，主要是对龙怀灌区的龙南干渠进行工程扫尾，并成立龙怀灌区水利管理处，统一管理灌区内12万亩农田的灌溉用水。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兴修水利不再发动民工搞人海战术，而是采取承包责任制的方式。这一时期修建的水利工程虽有增加，但一些多级抽水电站已不使用，因而有效灌溉面积只净增0.43万亩。

这一时期总共投资765.52万元，总用工692.17万工，平均每亩投资1780元，每亩投工1610工。

#### 五

1981～1987年。

这一时期，全县主要是搞基建项目——龙怀灌区配套工程，加高龙怀水库大坝5米，改建放水塔，使水库总容量从原来2175万方，增至现在的3335万方。另外，进行对北弓水

库、里团水库的配套加高、加固除险工程。这一时期面上水利投资较少，共1046.53万元，投工180,27万工，有效灌溉面积减大于增。

## 六

从1950年至1987年的30多年时间，全县水利建设取得巨大成就，共建农田水利工程976处。其中，蓄水工程151处，总库容13476.86万方，有效库容9568.5万方，有效灌溉面积9.53万亩；引水工程327处，正常引水流量每秒14.7立方米，设计灌溉面积10.21万亩，有效灌溉面积9.33万亩；提水工程447处装机487台，电力11268.8千瓦，设计灌溉面积16.82万亩，有效灌溉面积7.95万亩；此外，还有喷灌工程装机13台，电力141千瓦，设计灌溉0.29万亩，有效灌溉面积0.05万亩；水柜51处，有效水量29.06万立方米，设计灌溉面积0.04万亩，有效灌溉面积为0.04万亩。

30多年来，全县水利建设总投资4164.83万元。其中，国家投资2621.98万元，自筹投资1542.85万元。形成固定资产2915.38万元。历年完成土方1065.24万立方米，开石96.94万立米，浆砌石104.84万立米，混凝土3.4万立米。完成劳动工日3765.1万工。水利建设用去水泥42246吨，钢材1324吨，木材4238立方米。全县建成的工程设计灌溉面积43.02万亩，有效灌溉面积26.90万亩，其中达到旱涝保收的21.05万亩。

1987年全县已建人畜饮水工程74处，投资77.21万元，解决3.16万人、1.33万头牲畜的饮水困难。

解放以来兴建了大批水利工程，凡地形和水资源条件好

的地方，水利工程已基本兴建，布局也是合理的，有效灌溉面积从解放初期的4.62万亩增加到1987年的26.90万亩，占全县耕地面积86.86%。水利的大批兴建，为本县农田保水抗旱和农业增产丰收创造了前提条件。例如，1991年柳江县连续遭到了春、夏、秋三季严重旱灾，全年降雨量，仅为928.5毫米，比1990年少511.1毫米，是我县有气象记载以来第三个降雨量最少的一年。由于降雨少，气温高，蒸发大，持续时间长，全县的321条溪水中，断流了274条，塘库289座，干枯205座；地下水位普遍下降1—2米。全县有7.6万人，5.44万头牲畜饮水都很困难。有三个村公所128个村屯因旱，旱稻无法插秧，全县水稻受旱27.95万亩，其中失收5.93万亩，少插6.5万亩，旱地粮食作物受旱18.3万亩，失收7.37万亩。面对如此严重的旱灾，县委和县政府领导带领广大干部群众奋起抗旱，充分发挥现有水利设施的优势作用。结果，在大旱之年使损失下降到很低程度。据统计，全县1991年粮食总产1.62亿公斤，比1990年减少2222万公斤，但与大旱的1963年比，总产却是1963年的3倍多。主要经济作物和林牧副渔都保持增长势头。全县农业总产值3.2亿元，比上年增产2.1%，农民人均收入560元，比上年增长5.6%。

# 民国初期柳州城郊的个体商业简述

柯定坤

民国初期，柳州城郊的工商业，有个体的、有联营的。他们经营的项目，以糖、烟、油、红瓜子等为主。资本比较富裕的工商户有：广隆安号，地址在文惠路，老板秦选斋，雒容县人；“曾全盛”，地址柳家巷，老板曾某，市郊杨柳村人；“秦西和”，地址郊区黄村，老板秦老六，黄村人；“广和祥”，地址黄村，老板秦土养，继承人秦先明，黄村人；“梁朝记”地址市郊鸡笼村，老板梁某，本村人；“张合盛”地址市郊下茅洲人，老板张老火；“柯祐记”，地址市郊白沙村，老板柯运佑，本村人，继承人柯承仁，本村人；他们的营业性质均同。

他们的营业方式，春季放债，秋冬本息均收。借贷方式，有借现金的，有贷实物的，如肥料、面粉、米谷等，当即定出时价，每百银元每月利息二元，按月推算。债务人收割作物时，不论多少，全部要交给债权人，抵偿贷款，不许外售，否则，如经发觉，则以违约论处。是口头协议的债权人，就要强制执行，收回贷款及利息。如有拖欠，债权人有权责令债务人将其不动产如房屋、田园、牲畜等抵还债款，否则诉诸法院，并断绝经营交往。如债务人履行协议，偿还债款时，抵还不敷的部分，债权人次年兑收其息。这是给予特别照顾优惠，以利吸收新的客仔（旧社会对农村经营者的称呼）。如被排除的客仔（即过去违约的），想恢复已往的

交易的，债权人就要他找担保贷款的人，签订契约（即合同）。

柳州市收购农产品转手销售商户，有谷埠路的安记隆，柳江路（旧名沙街）的广合昌、广泰昌、均昌、利生、黎成信，培新路口的大吉祥等商店。这些商店，有叫平码行，九八行，经纪行等。向外埠销售的有桂平中股街的“逢生”、大皇江口“美孚商”、梧州九坊路的“逢生”。这些也是九八行。他们的交易往来，比较经常的有安记隆、广隆安、柯祐记等。那时我在广州就学，放假时经常押运货物往来，运输的工具全是载几十万斤的大木船，以桨划水的。这些行口，我都住食过。

当时的交易，彼此多凭口头信誉，并未签订书面协议。其性质有卖期货的，如销售方缺资本，先向代销方贷款，然后按时价付给商品，这叫预借。从货款中提扣百分之二的代销费，所谓九八行也。也有先交货，按时价销售后，再取款的。这原因是，有时九八行无现款或货物多，积压市场。亦有货刚到价钱低落，亏本暂时保留的，先后在九八行，预借部分款，待售完后扣还。农村还有一项农产品的交易，方式特殊，如今年定购来年的农产品，按今年的价钱，不管下年价格增减，均照今年的价核算，先付三分之一的订购款。

# 1948年邓老板专机运银

## 抢生意小记

陈立初 口述

陈广锟 记录整理

1947年，香港的资本家邓寿山（广东顺德人，50年代在香港病故）的香港总商店柳州分店“友成隆”布行开业，由我任代理人，负责其业务。当时邓寿山还同时拥有如下几个字号的绸布行：上海“友成兴”，由其侄子邓××负责；广州亦叫“友成隆”，由陈伯英负责；梧州“友成昌”，由李焯负责；南宁“友成盛”，由左锡泉负责。邓寿山本人任总经理，来往于广州、香港，指挥各布行生意。

抗战胜利后的柳州，金融业不景气。1990年出版的《柳州金融志》记载：“当时柳州商业大不如沦陷前的繁荣，金融清淡，1948年8月（广西银行）柳州分行员工仅有40人。”“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由于国民政府通货膨胀恶性发展，各行储蓄存款相继衰落直至无人问津。”“当时，柳州市面上尽管流行法币、金圆券，但一般商号间仍流通银元、双毫。”并且，随着“金圆券丧失信用，一些较大的商号、经纪行都转向金融投机。”柳州市友成隆布行开业不到一年，由于资金实力较为雄厚，秉承老板邓寿山的旨意，也干起了金融投机生意来。

当时的商号，在银行没有储蓄业务的情况下，有光洋

放在家里是死钱。所以，愿把钱放到一些有声望的、资金雄厚的商号或经纪行去，获取一些利息。而那些收进光洋的商号就做起金融投机生意，将这些光洋卖出，争收利息差。这种炒买炒卖难免有时买空卖空，一旦不能及时兑现，就要关门倒闭。据我的回忆，当时“友成隆”以100元光洋为起点，简单的（小笔的）以日息4%，大单的以5%或6%收进，给予一张有“友成隆”商号章及担保人章的本票，到期凭本票兑现。然后又以4%—7%的日息卖出，如不提取现洋，也给予一张本票，可随时来兑现。而手头拥有本票的人，也可以私下炒卖。由于邓寿山在各地拥有5个商号，所以这种炒买炒卖就可通过电报、长话与上海、广州、南宁、梧州、香港等地随时联系，跨市进行。“友成隆”日进、出现洋少则千元，多则7、8千元，一般在3千元左右。当时“友成隆”拥有一架美式吉普车，在梧、柳、邕之间来往，互相调剂现洋。如果一旦现洋吃紧，就要向广州、香港或向老板邓寿山调剂了。

在1948年4、5月间，持有“友成隆”本票的商号与个人要求兑现突然增多，甚至一连几日都是紧张。我觉得有些不对路。我估计，这是因为“友成隆”开张不久，市面上想摸摸其资金实力。而数天后，“友成隆”库存现洋不多了，虽通电南宁、梧州，亦调不出这么多现洋来。在现洋最紧张的那天晚上，我连夜向香港邓寿山总经理挂了长话，报告了柳州的紧急情况。邓寿山在电话里要我顶住，说他想办法调现洋来柳州。放下电话后，我心中还是忐忑不安的，不知他能在什么时候、用什么办法解决柳州“友成隆”燃眉之急。深夜，邓寿山打来长话，讲第二天用飞机运现洋来柳。可

是，我知道，第二天却不是班机日，这是怎么回事？我惶惶不安。第二天下午，柳州机场来了电话，要“友成隆”派车接货。我即刻派车去拉，原来是3000元大洋及双毫。一问，才知是邓寿山在香港花钱请了当时陈纳德的“飞虎队”一架细飞机（小型飞机），专机将现洋运来的。当时天已晚了。我马上吩咐伙计点起几盏大汽灯，并告诉大家，当日只兑不收，连夜兑现。这一来，轰动了柳州商界。那些要求兑现的商号、个人中，有些人就觉得抢兑得“唔化算”（不合算），不兑的还可多得一日利息。于是，就想收回要兑的本票。有的已兑现的又想返存，我说，不兑可以，现洋照收。不过，日息一律从明日算起。大家哗然，只好自认倒霉了。第二天，抢兑的风波就平息下去了。这就是当时轰动柳州的一次民间金融抢兑风波。

从这一事件后，当时除了银行外，“友成隆”基本上垄断了柳州市商界的现洋炒买炒卖生意。我亦成为当时商界要人。从那以后的一段日子里，早上到沙街大中华酒楼饮完茶后，不少人前拥后挤地问我当日行情如何。连银行的梁××襄理（银行的一种职务，该人在1949年的“新兴泰”轮船失事中遇难）也来拍我肩膀，询我当日行情。我无需多言，只做个手势，手心向内，出4个手指，表示今日（每百元光洋）4毫收进；手心向外，出5个手指，表示当日5毫卖出。炒九八的人，凭我手势就去大肆炒卖了。但毕竟是日落西山，好景不长。国民党统治下的柳州经济日益崩溃，当时“友成隆”亦免不了受到飞速的通货膨胀的冲击，生意日渐淡落。邓寿山是工商业者兼地主。解放后要退租退押，1950年邓寿山不得不拍卖了“友成隆”铺面，抽走了资金，“友

# 民国时期的柳州广西银行

杨庆宁

## 一、各时期广西银行与柳州分行机构

广西银行的发展过程，基本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1911年～1921年（陆荣廷执政时期）

此时期的广西银行是清末宣统2年（1910年），由柳州官银钱号改组成立的。1917年增设柳州分行，地址在罗池路。

1921年发生的广西“民十政变”，是震撼全国的军阀派系斗争。当时在政治、经济、教育、文化各业，均呈半瘫痪状态，尤以金融之混乱到了极点，于是仅设立四载的柳州分行，1921年间被迫停业。

第二个时期，1926年～1929年即李、黄（绍竑）、白时期。李、黄、白于1925年下半年统一了广西。于1926年5月

---

“成隆”就宣告收挡了。

注：

口述者陈立初，柳州市多届市人大代表，市政协委员，市工商联副主委、顾问。1991年病故，享年87岁。

记录整理者陈广锟，陈立初三子。柳州市六、七届政协常委。曾任柳州市工商联副主委（兼）、执委。现市政协文史委委员。（本文和他在本辑记录整理的其他两篇都是从病床上的父亲陈立初那里抢救下来的资料。）

1日重建广西省银行。柳州设兑换处，1928年起改称柳州分行，地址仍在罗池路。

1929年3月，蒋桂战争爆发后，由于新桂系集团溃散时，发生银行兑换券挤兑风潮无法应付，广西银行再次倒闭。

第三个时期，1932年～1949年即李、白、黄（旭初）时期。

1930年，李、黄、白东山再起，第二次统一广西，李、白、黄登台执政后，经再度筹措，于1932年8月1日成立广西银行，柳州设立汇兑所，迁址培新路，经理李传庵、副经理唐信芳，1935年改称柳州分行，直至1949年11月25日柳州解放而结束。

总之，广西银行在发展途中，三起三落，都与广西的政局紧密联系。

## 二、李、白、黄时新柳州汇兑所（分行）营业状况

广西银行柳州汇兑所成立时，其营业区域包括：柳州、雒容、柳城、河池、南丹、恩恩、天河、宜北、罗城、融县、三江、武宣、忻城、迁江、来宾、象县、凤山、东兰、灌江等，由柳所负责管辖所属营业区域范围内的资金运用及调拨事宜。柳所在1935年改称柳州分行后，主要业务有：存款、放款、汇兑、信托、储蓄等。其营业情况分列如下：

### （一）柳州汇兑所营业情况

广西自1929年3月蒋桂战争以后，商民因蒙受前银行钞票之损失，兵燹之影响，农工不振，商业凋残，金融枯竭。从当时柳州情况看，不少银号商店倒闭歇业。柳所成立

初期，虽经尽力扶植，设法调剂，但商业凋残之态仍未完全恢复“元气”。迄1933年度，即柳所成立的第二年，银行业务已有逐渐发展之势，本年下期各项业务较上期有了增长，具体情况如表：

年、期别	单位	往存	特存	往储	定放	定抵	往透	纯利
1933年 上期	万元	111	41	1	30	28	47	1.73
1933年 下期	万元	153	39	4	61	62	93	5.47
下期比 上期增	%	+37.84	-4.88	+300	+103.33	+121.42	+97.87	+15.18

从上列数字看，除特存一项下期比上期下降4.88%外，其余各项均有增长，增幅最大的是往储达300%，经营成果增长216.18%。其他业务如汇兑，信托等甚少发展。

此外，柳所辖属的庆远、长安、鹿寨三办事处，1933年各项业务发展趋势与柳所相似，下期较上期亦有所增长。

## （二）柳州分行营业情况

1935年柳州兑汇所改称柳州分行，到1936年的抗战前时期（指银行年度结算而言）。这一时期的柳州金融之动向，大都受省内外金融市场的波及，给银行业务带来了间接与直接的影响。仅以汇兑一项为例，过去粤单数巨，多由广东省汇往梧州，1935年内，因柳州粤单补水较梧州为低，汇兑乃变其常态，粤汇改梧为柳，从而使柳州分行当年汇入汇款总数猛增至294万余元，比1934年度增165万元。

存款方面：1935年存款总数1059万元，比1934年增600余万元。其中：暂存增370万元，特存增120万元，往存增60万元，外存增40万元，在存款增长中，公款占70%，其余系

商号、私人及外埠同业存款的增加。1936年度，因外汇汇率变动异常，钞价时起时落，影响本年存款较上年减少，尤以商民存款的减少最为突出。

放款方面：1935年放款总数219万元，比1934年减少44万元，其中：往透减少30余万元，定放减少10余万元，原因在于当年商市冷淡，钞价低落，以及银潮影响所致。1936年亦因外汇汇率变动过剧。柳州分行为适应环境，年内停止和减少放款，以致本年放款较上年减少。综上所述，1935年至1936年度，两年放款均呈下降趋势。

汇出汇款：1935年汇出总数202万余元，比上年减少40余万元。1936年度，因商人需向外埠购货及应时需，故本年汇出总数近300万元，比1935年增加约100万元。

抗战前的柳州金融机构，仅有官商合办的广西银行柳州分行一家。1937抗战爆发后，上海、南京、武汉、广州相继沦陷，大量货物与资金纷纷转移柳州，由于柳州地处西南后方交通要冲，成为当时大后方重要的货运枢纽和贸易中心，在此异常形势的推动下，柳州区域经济，起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从而亦促进柳州金融业空前活跃，1939年至1943年止，先后已有中、中、交、农国家银行和广东、湖南、贵州等省银行，侨营的华侨银行、华侨联合银行，以及金城、实业、亚西、复兴、美丰、邮汇局、光裕、兴文、华益等十八家银行、局在柳设立机构，打破1938年前柳州分行一家独占的局面，使柳州金融业在多家银行竞争中发展。

根据现有资料表明，1937年至1943年的抗战时期，因战事影响，柳州分行各项业务较战前有了变化，其变化的基本特点可概括为：存款基本逐年递增，放款年间有增有减，汇

出曲线增加，汇入直线上升“40”增办信托、仓库业务，“41”农贷移交。

### (1) 存款：列表如下

金额单位：万元

年份	存款总额	本年较 上年±%	年份	存款总额	本年较 上年±%
1937年	4000		1941年	8037	+12.62
1938年	3830	-4.25	1942年	25757	+220.48
1939年	5200	+35.77	1943年	17199	-33.23
1940年	7136	+37.23			

上表除1937年度因上年数字不详未计其增幅外，就已列的六年数字看，增长的有四年，以1942年增幅220.48%为最大。存款基本呈现逐年递增趋势。

### (2) 放款

1937年放款总额500万元，1938年为320万元，较上年比减36%，1939年为620万元，比增93.75%，1940年至1942年间，柳州分行除1941年内，根据小额信放需要，发放5万元，以及经广西银行总行核准发放往来透支23.1万元外，其余各项放款（如定抵、定放等），为紧缩信用起见，按照总行规定，暂时停止发放。迄1943年，放款有所恢复，是年放款150万元，较前放额有减。

### (3) 汇出

柳州分行汇出汇款。1937年汇出总数500万元，比上年增200万元，1938年至1939年两年，因数字不详，不便具体

比较，但据“广西银行特刊”第4期记载，其情况是：1938年比上年增加，1939年上期仍系增长势头，下期则因战事日近，柳州空袭仍频，加之各处库绌，限制汇额，故下期汇出减少。1940年为1670万元，与1937年比增2.34倍，1941年为6242万元，比上年再增2.74倍，1942年为6022万元（其中以梧州2342万元、玉林535万元、桂林409万元、浔州（桂平）379万元等地为多），比上年减220万元，迄1943年，在1942年下降基础上，汇出总额猛增至15494万元，上述七年中，柳行汇出汇款，各年间出现增中有减，减中有增的曲线增长的情况。

#### （4）汇入

1937年至1940年，各年汇入数字不详。1941年至1943年的三年情况是：1941年汇入总数3079万元，1942年为11688万元（其中以衡阳2690万元、桂林2309万元、重庆1885万元、贵阳1260万元、昆明542万元等为多），比1941年增8609万元，1943年为37145万元，又比1942年增25457万元，汇入汇款出现直线上升的特点。

#### （5）信托、仓库业务

##### 信托业务：

柳州分行信托业务，是在1940年开办的，其业务包括出，入口两个方面，出口以代复兴公司购运桐油、茶油等商品；入口则由总行在港、玉（玉林）采购液体燃料、纱布、纸料、食盐等，分拨柳行随时依照市价低折配销，以供社会之需，起平抑物价之作用。

1940年，代复兴公司收购桐油675.5万市斤，本行自营803.9万市斤；1941年桐油购量860余万市斤，按当时合约规

定比例，就地被交柳行接收代运者，计400万市斤，除部份运至藤县外，余存柳行；在桐油总购量中余下全拨复兴公司。入口方面：1940年，柳行接收前农行食盐181.9万市斤，除调出及运往各地89.2万市斤接济民食外，余92.7万市斤存柳行待销。1941年，代省府绥署及各机关运入在港商品中的汽油部份，销给广西公路局、中国运输公司、中国红十字会等6000加仑。油脂部份：销给广西酒精厂、电船组、空军第五站军政部种马牧场等，计3万余公斤。褐油部份：销给广西公路局、广西纺织机械厂、广西酒精厂、土壤土厂等5000多加仑。食盐部份：先后运往庆远、长安、怀远等地，计80多万市斤，仍让省府绥署16万市斤。纱布部份：由香港运入者，计棉纱几十包、兰布2000多匹。纸料部份：除供社会需要酌售一部份外，余下大部份留作自用。

#### 仓库业务：

柳行仓库业务，1940年自设专课司理后，因本身设备未全，过去未能立时开展，迄1941年4月间，柳州分行在城西雅儒路购空地数亩，开始兴建仓库，逐渐推展业务，其业务以从事购买运销为主，次为兼营储押及代理保管等。购运方面，是年五、六月间，柳行与庆行合作，五月在庆属三岔收小麦4.7万余斤，供广西面粉厂生产需要，六、七月间收购茶油、珠豆37万市斤，运鹿寨江口等地出售，同时还委托长处、鹿处购入生油2万市斤、茶油8万市斤、生麸2万市斤，茶麸4万市斤，红瓜子4万市斤等运销各地。储押方面：以柳江县农业仓库为大宗，计存谷抵押放款十万余元。在代管方面：全年保管品价值300余万元，收入仓租1.5万元，此项收入足抵建仓费用有余。柳行仓库业务之开展，当

时对平抑物价、调节供求，均起到应有的作用。

#### (6) 农贷移交

柳州分行1940年间接办农贷业务，是年放出总额65.9万元，收回51.6万元，余14.3万元。1941年柳行奉省令将该项业务拨给柳江县合作金库办理。于当年九、十月间正式办理农贷交接手续，移交时属债权者，计国币14.3万元，属债务者计1.8万元。

#### (7) 存、放款利率

广西银行柳州分行历年存、放利率如下：

柳州分行1932年开业时，存款月息2厘以下，放款月息8厘以下；1934年7月总行第一次调整为：往存利率照旧。定存三个月为6厘、半年7厘，一年8厘，一年以上另议。续存款利率调整后，于1936年11月27日，经总行董、监事联席会议通过，放款利率如下：农、工、矿三种借款月息最低8厘，最高1分，普通借款月息最低1分，最高不得超过年息20%。迄1937年存款利率再次调整为：定期存款半年周息7厘，9个月8厘，一年9厘，一年以上最高不超过周息1分2厘，往存利率周息5厘。但半年内每日余额均达1万元以上者，周息5厘半，5万元以上者6厘。此外，为了鼓励行员储蓄，广西银行于1933年8月28日订立《广西银行优待公务人员往来储蓄存款章程》中规定：行员福利储金周息8厘，行员优待活期储蓄1分，行员优待定期储蓄，半年以上者周息1分2厘，一年以上者周息1分3厘，二年以上者周息1分4厘。通过采取此种措施后，行员储金余额有所增长。

# 广西第一家精神病医院在 柳州创建的回忆

张童昌

解放前广西无精神病医院。直到解放后50年代初期，全省的精神病人都要送到湖南长沙或广州去诊治，流浪街头的精神病人则由民政局设收容所收留遣送。从1957年开始，柳州市在五里亭康复医院建立了全区第一个收容诊治精神病人的医疗机构，从此结束了广西不能治疗精神病的历史，填补了我区医疗事业上的这一空白。现将我在此工作的经历和见闻记述如下：

1952年6月下旬，我和新婚的妻子王经兰同志，从桂林的中南军区第三陆军医院调来柳州第二兵站医院从事内科的医疗护理工作。这个医院是把四野南下后勤部队中一些慢性病人（结核病、精神病、其他躯体器质性病及战伤外科后遗症等）集中在一起的，是收容现役军人病患者的一个部队医院。该医院1953年集体转业，由广西省卫生厅接管，并改名称为广西柳州康复医院。当时收留有一些精神失常、心理障碍的伤病员，例如精神分裂症、癔病、神经症、心身疾病、忧虑症等病人。虽为数不多，但治疗方法简单，仍以一般内科的方法来处理，例如关锁绑捆、镇静安眠等，效果不够好。

1954年，这些现役军人病者的各种慢性疾病，经过两年来的治疗，有了不同程度的好转，按情况分别给予复员、转

业，遣送回乡，交给当地政府处理。医院转为收治地方慢性病（主要为肺结核及精神病人），并改名为广西壮族自治区结核病防治院，内设结核科、胸外科、精神科。这是医院从部队到地方的一个重要转变。

1955年9月，组织上要送我到南京神经精神病防治院进修学习，以便回来后开展精神病专科业务。我以满5年内科临床经验的条件入选。对这项工作我虽然还没有正确认识，思想有顾虑，但却服从组织的分配。10月份我带着广西省卫生厅的介绍信到南京报到。这是由中央卫生部委托该院开办的“高级师资”和“专科医师”两个进修班，以南京精神病防治院为培训基地，全国各省都派有学员参加。它是我国神经精神病的科学事业发展史上新的一页。我参加“精神病专科医师进修班”学习。

学院聘请国内著名的老一辈精神病学专家来讲课，还请先进地区的专业工作者介绍他们优良的医风医德以及科学的管理制度等方面的经验和体会。我在这一年学习过程中，业务从外行逐步变内行，专业思想从建立到巩固，对精神病人从迷惑、害怕逐渐变为同情和热爱，终于树立了为他们服务，解除他们痛苦的信心。学习结束，我决心回柳把精神病治疗工作搞好。

1956年10月，我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带着各地的先进经验回到柳州。院长王文才召集包括行政、医疗科室、后勤总务等方面的主要干部开会动员，部署重建病房、购置设备和对各级班底人员的挑选和训练等工作。会后，一边上马基建，一边陆续收治病人。原有的10多个加上新收进来的几十个精神病人在一起，吵闹、喊叫、斗殴、逃跑的事时有发

生，病房秩序十分混乱。工作人员上班都提心吊胆。当时医疗器械很少，除了原有一具老式原始的交流电休克机外，再没有任何有效的治疗精神病的器械。就是药品也很少。因此，我在南京学得回的一些治疗新技术也不能很好地施展。工作人员要时常在半夜外出去寻找逃跑的病号，由于工作劳累、危险，一些医务人员不安心本职工作。

正在困难的时候，医院为了开展全区首创的胸外科业务，领导上拟调我到外科工作。我要求仍留在精神科，这得到领导的同意。卫生厅谢厅长告诉我：“给你调来一个助手一起搞。”不久，调来了上海第二军医大学神经精神科的助教刘锡伟同志，临床医疗由他和医士谢运庆负责。我则负责全面工作。一面抓医疗人员培训，一面积极争取尽快添置药品和必要的治疗器械。到1958年，一台Reiter47型直流脉冲电休克机从南京购回，继而又买回电针灸机、电睡眠机、共鸣火花发生器，还从日本进口冬眠灸针，而且买回一批药品，如广州某药厂生产的可乐静（氯硫二苯胺药片），以及休克治疗所需的胰岛素等。

1958年底精神病专科工作逐渐走上正轨。各种休克治疗、药物治疗、理疗、发热治疗相继开展，培养了专科医务人员，积累临床经验，逐步建立和完善科学的管理制度和各项操作规程。柳州市人民医院罗富才院长于1956年去南京神经精神病防治院专科医师进修班学习，回来后由卫生厅调来自治区结核病防治院任副院长兼精神科主任。选送到南京学习休克治疗和工娱疗的李琳、黄云录同志也学成回院开展工作。以罗富才院长为首组成的精神科核心小组和全科同志齐心协力，上下一致，克服困难，取得了较好的成绩，从1958年

度起连年评为本院和市的先进科室，还出席了市的先代会。从此，各地一批批人员接踵而来参观。

1958年“大跃进”年代，不仅收治各县民政部门送来的复员军人病人，还广收地方厂矿职工及城市居民的精神病患者。当时柳铁职工的患者几乎占病床的 $1/3 \sim 1/2$ 。男女病人共在一个病区活动，在管理上困难不少，加上拓展了工作范围，扩大了社会影响，一时间精神病科的名声大振，各地要求住院的来信很多，病人也不断增加，压力越来越大。但我们克服困难、坚持干，有的病人家属赞扬说“罗富才、张童昌、刘锡伟是精神病科的三个宝贝”，这话虽言过其实，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们3个人协同全科同志的工作在社会上得到欢迎，并寄予希望。

本院在业务技术上，除了对住院病人诊断、治疗、管理、康复等例行日常工作外，还在屏山大道开设神经精神科门诊，邀全市各综合性医院专科来会诊。我每周一个上午到柳铁中心医院上班，开展专科工作（不久，因反右派运动进入批判高潮而停止）。医院还为柳州空军场站干部作定期神经系统检查，以及一年一度到南宁广西军区为选调空军飞行员体检。此外受各地政法部门委托，对犯人进行精神病法律鉴定。在教学方面，除了本科室人员的业务培训外，还要担任区卫校神经精神病科授课任务，对全区综合性医院的医师开设精神科学习班，接纳各地派来的临床医务人员到院进修，连南宁广西医学院也派医师来柳州精神病科进修。于是柳州市就成为名符其实的全区精神医学的起点、诊疗中心和培训基地。

精神病人的病历比较难写，要展开具体的叙述。一份病

历常常有7至8页长，有时一天收两个病人，写病历就要到半夜，我们宁可自己加班加点，也要把病历认真写好。由于只有几个医生，每人要分管20至30个病人，除了投药施治以外，还要做认真细致的心理治疗。白天工作繁忙，晚上还要值班，睡在病房，第二天照常上班。轮流夜班是连续一周的。我们工作不计条件，劳动不讲报酬，和肺结核混同门诊，不向上级要抗痨费。有的护理人员被精神病人撕打，甚至头破血流还继续上班工作。全科同志做到对待病人如亲人，病人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受得起委屈。这样的服务态度使病人及其家属十分感动。

由于精神病是大脑的高级心理活动发生障碍而引起的，这就决定这种病在诊、治、管、护上的错综性、复杂性和社会性。诊断所需赖的是广泛、真实的信息；治疗和康复所沿用的是综合、全面的手段；护病、管理的一套方法也是要细致耐心。当时没有多少书刊可供学习参考，也还没有很内行的人员作老师请教，医疗工作象摸着石头过河，跌跤，爬起来，再摸索。“四防”工作（防毁物、防伤人、防逃跑、防自杀）经常因漏洞而出意外。经过一段时间摸索，逐步建立和完善各种常规制度，到1974年10月，由于房舍的增添，人员和装备的齐全，具备了分院的条件。卫生厅大力支持，黄征厅长指示，把精神病科从区结核病防治院分出来，成立全区性精神病防治专门机构，有500张病床。1980年改名称为现在的龙泉山医院。

## 广西广播电视台大学柳州市分校 的创建与发展

卢黄基 阚培桐

广西广播电视台大学是与中央广播电视台大学于1982年2月同时成立、招生的。当时在各地、市建立了电大辅导站（工作站）。柳州市也同时建立了广播电视台大学辅导站，开始进行电视教学工作。辅导站的教学大纲、教学计划、招生、教材、考试、学籍管理和主讲教师的配备均由全国全区统一部署。柳州电大辅导站成立后由市教育局领导，站长由教育局副局长叶崇光兼任，刘南嵩同志任副站长，站址设在文惠路87号教师进修学院内。教学业务由广西电大管理。市领导部门对我市创办的电大非常重视，当时市领导潘树彬、石琪高、杨基常、谭志芳、陆万观等经常到电大检查和视察，帮助解决创办中存在的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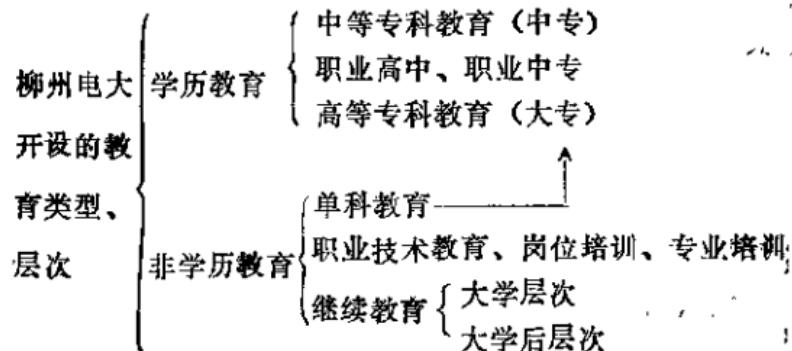
柳州电大创办是很艰苦的，开始时只有3名工作人员，3间办公室和两间教室。辅导站属于管理型，以分散办学为主，下设教学点和教学班。1979年有教学点13个，教学班18个，学生521人。1986年，教学点36个，教学班66个，学生2806人。

1984年10月4日，市人民政府批准在电大辅导站基础上建立柳州电大分校，属于处级建制，卢黄基同志担任副校长，刘南嵩同志任办公室副主任，聂大中、林恒庆、赖立祥3同志任教务处副主任。分校从1985年1月1日起对外挂牌办公。市政府批准在广雅路征用10亩菜地作为校址（实际面积8.64亩）。从1985年1月起，开始进行校园建设，1985年用区里拨款20万元建起一栋教学楼。从1986年元旦起，电大

分校开始在广雅路17号新校址办公。1986年开始建筑实验楼，1988年7月交付使用。1988年开始建筑教工宿舍，1990年1月启用。1992年筹建综合楼（办公和宿舍），预计1993年下半年启用。

柳州电大分校“搭架子，打基础”的任务基本完成后，1987年5月市委市政府配齐了学校领导班子，卢黄基同志任党委书记，林恒庆同志任校长（副书记），黄炳豪任党委副书记，聂大中、陈琼光、梁文任副校长，谢瑞辉任纪检会书记，黄太隆同志任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分校实行教学实体，大专、中专、培训三位一体。在校专职教职工有75人，学生一般有1500多人（最多时达3300多人）。到1992年7月，分校已培养大专毕业生5670人，中专毕业生897人，岗位培训人员5200多人。

随着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的发展，柳州电大开设的教育类型、层次不断发展。见图表1。



高等专科教育（大专学历教育）一直是柳州电大的主体。从1979年创理工科工程类专业开始，逐步发展成为一个开设了3个科类19个门类30多个专业的综合性高等专科学校。柳州电大举办的大专学历教育各专业科类见图表2。

图表2 柳州电大举办的大专学历教育各专业科类统计

类别	理工				文科				经济管理				电视 师专			
	机械	电子	电气	化工	土建	管理	医工	电疗	汉语言学	政法干	新闻部	图档	行政政	会计理	统计计	金融融
专业	机	电	师	化	土	管	医	电	汉	法	新	图	政	会	统	金
类别	械	子	气	轻	建	理		语	干	政	书	图	营	计	统	财
	工	工	工	工	工	工		言	部	法	档	政	管	理	会	政
	程	程	程	范	程	程		学	专	新	案	政	营	审	计	税
								修	律	闻	史	理	管	理	计	收
1979	✓	✓														
1980	✓															
1981																
1982	✓	✓		✓					✓							
1983													✓	✓		✓
1984	✓	✓	✓	✓	✓	✓	✓		✓							
1985									✓	✓	✓	✓	✓	✓		
1986	✓	✓	✓		✓	✓	✓						✓	✓		
1987	✓		✓	✓					✓			✓	✓	✓		
1988		✓		✓	✓				✓	✓	✓	✓	✓	✓	✓	
1989	✓	✓	✓		✓	✓			✓	✓	✓		✓	✓	✓	✓
1990						✓	✓	✓		✓			✓	✓		
1991	✓				✓	✓							✓	✓	✓	✓
1992	✓					✓			✓	✓			✓	✓		✓

国家《广播电视台大学暂行规定》(1988年颁布)中对广播电视台大学的主要任务作了如下规定：举办以高等专科为主的学历教育，同时为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及社会各界的职业教育、岗位培训、专业培训、继续教育提供教学服务。柳州电大分校根据《规定》精神，从1986年起设立了中专部和培训部，开设了广播电视台中专专业教育和各种培训的专业教育。中专教育情况如图3，培训教育如图4。

图3 柳州电大举办中专学历教育各专业科类统计

类别	机械	机电	工管	财会	劳经	统计	行政	保卫	高
	专业类别								
1986	✓			✓	✓			✓	
1987	✓			✓	✓				
1988				✓	✓				
1989					✓	✓	✓	✓	
1990				✓	✓	✓	✓	✓	
1991		✓		✓				✓	
1992		✓		✓			✓	✓	✓

图4 柳州电大举办各种培训专业科类统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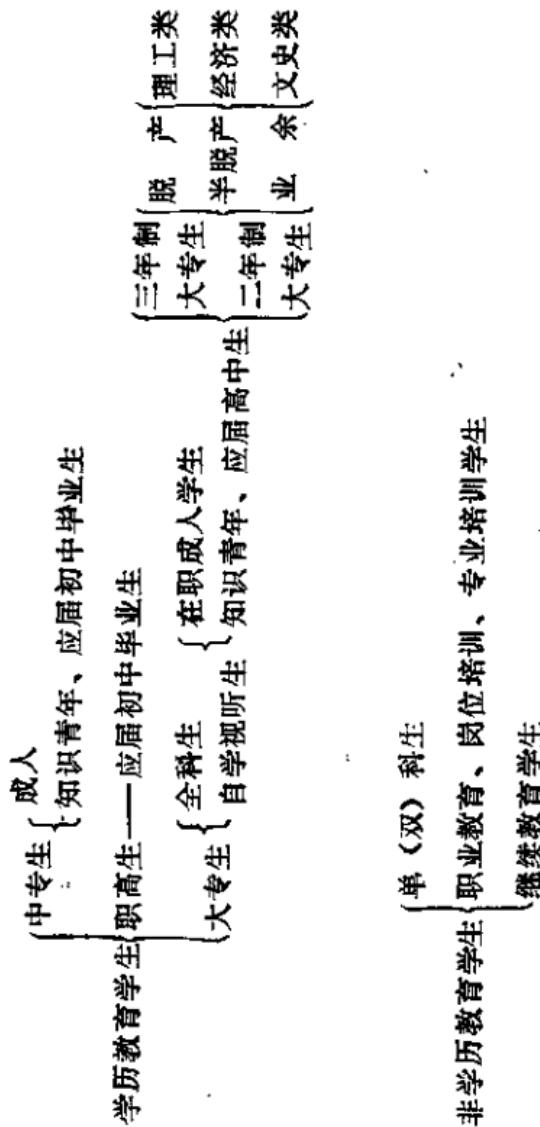
类别	升学 补习	专业 证书	家电	电工	安全 用电	锅炉	岗位 培训	继续 教育	自学 考试
专业类别									
1986	✓								✓
1987	✓								✓
1988	✓						✓		✓
1989	✓	✓	✓	✓			✓		✓
1990	✓	✓	✓	✓	✓		✓	✓	✓
1991	✓	✓	✓	✓		✓	✓	✓	✓
1992	✓						✓	✓	✓

柳州电大学生类型是多种多样的。见图表5。

柳州电大的基本教学环节是：（1）自学教材和完成平时作业；（2）广播（录音）电视（录像）授课；（3）面授辅导和班组讨论；（4）实验数学（理工科）；（5）期末复习、考试考查和成绩评定；（6）教学实习、生产实习和社会调查（因科类性质而异）；（7）课程设计（理工科）；（8）毕业作业、毕业设计、毕业答辩（因科类性质而异）。由于严格坚持了这些教学环节，又坚持了按需办学的原则，所以电大越办越兴旺，质量越来越高。柳州电大历年招生人数毕业人数，见表6。

图表5

柳州电大学生类型



图表 6 柳州电大历年招生毕业人数和培训人数统计

类别 年份	大 专		中 专		培 训
	招 生	毕 业	招 生	毕 业	
1979	521				
1980	138				
1981					
1982	383	456			889(单科)
1983	271	129			
1984	718				214(单科)
1985	538	438			315(单科)
1986	1310	707	176		
1987	571	603	159		
1988	735	1015	144		
1989	343	1714	103	176	
1990	387	235	179	159	干修150
1991	435	631	136	144	干修172
1992	420	373	110	103	

据1987年柳州电大对82、83、85三届毕业生的抽样追踪调查结果表明，用人单位对电大毕业生的总评价是好的和比

较好的。在技术革新和发明创造、独立思考、自学、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调查资料、实验操作和计算能力等方面具有大专或大专以上水平的占90%以上；外语阅读和笔译能力达大专或大专以上水平的占70%以上；得到用人单位信任或比较信任的占90%。电大分校13年来，自治区和本市一共投入经费420万元左右（事业费和基建费等），还接受世界银行贷款的电教设备费8.1万美元，已培养36500多名毕业生，平均培养一名学生，政府投资约724元。由此可见，发展电大是既快又好地培养人才、提高人民文化素质的一条好路子。

柳州电大分校坚持党的教育方针，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树立严谨求实，团结奋进的校风，取得优异的成绩，对柳州市教育事业的发展和促进两个文明建设，起到了较好的作用，得到群众的欢迎和领导的好评。1983年评为市两个文明建设的先进集体，1984年评为市职工教育先进集体，1986年和1987年先后被评为市社会主义建设先进单位，1986年评为广西电大先进集体、市“七·五”期间职工教育先进单位，1991年评为市学雷锋先进单位。陈贻源、赖立祥同志获评为全国优秀教师。

从电大毕业的学生，不少已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骨干，有的已担任领导职务，如柳州市对外经济贸易总公司经理朱春鹤，市水电局局长张霍德，市经委副主任钟金林、市人民银行副行长陈建林、市国家安全局副局长王匀高、城中区区长韦炳祥、市塑料制品厂厂长谢东恩等等都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 记鱼峰民办中学半工半读 的勤工俭学

巫邦隆

## 一、基本情况

柳州市民办鱼峰中学是由前身文化补习班改名建立起来的，地址在老虎冲口（现柳邕路东2巷75号）前一个小土坡上。起初，这所民办学校只有几间破烂教室，每逢刮大风、下大雨，就要立即放学回家，以保学生安全。学校不但教学设备一无所有，就连一个简单厕所也没有。学校编制只有任课老师，没有职员工友。校长，又兼教导主任、总务主任（名誉校长由鱼峰区委宣传部部长兼）。值日老师除值勤外，还要负责烧开水、打钟。办学的经费，国家没有补助，全靠自力更生。该校学生来源都是报考公办中学的落选学生。

1962年初，一名姓薛的学校领导请求调走，市教育局委派我来接任领导工作，许多亲友知道后，都来劝我不要去接任。他们说：“民办民办，破破烂烂，要搞好，很难办。”我到任之前，曾悄悄到学校了解一下，确实，要办好这样的学校，是非常困难的。不过，过去我曾在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办起工人二中，取得一些成绩和经验，这使我有决心迈开新的步伐，为党的教育事业再作出一点贡献。

## 二、半工半读的勤工俭学

学校开学后，我首先召开全体教师会议，分析学校情况，提出问题，让老师们畅所欲言，共同商讨。有的老师提出，目前学校最大困难是经费问题，仅靠学生收费，最多能维持两三个月；以后怎样办？有的老师说，教育质量是个主要问题，办学就要讲质量，质量太差，有谁来读呢？经过争论，最后大家一致认为：首先要解决经费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唯一的出路是搞半工半读的勤工俭学。经过大家讨论后，先是发动学生采石。由于学校离采石场（老虎冲）很近，距离不到200米，打石碴不是重体力劳动，劳动工具也很简单，学生可以劳作。于是采取学生上午上课，下午劳动的办法，结果每天每人打石碴收入两三角钱，一个月总收入近千元。这样干了两三个月，学校经费基本解决了。后来我们就到橡胶厂挖土方，还到砖瓦厂挖土推泥，又到文笔乡修公路。我们找到一个较好的办法——到磨滩挖河沙。挖河沙，由自己经营管理，自产自销，这样做学生的学习劳动也好安排，劳动经常化，收入比较多。但这是重体力劳动，只能安排二、三年级学生干，每周轮流两个班。而一年级学生则仍然继续打石碴。所得的收入除发给师生劳动补贴外，每月结余两千多元。学校有了经费，办学不成问题，教师信心增加，干劲更足了。

1964年初，自治区召开勤工俭学教育会议，鱼峰区政府派我去参加。回来后我向区政府汇报，杨区长听后说：“这次会议研究勤工俭学，提出的办法很好。你们原来这样干，并不是一个好办法，应该向南宁市‘五七’干校学习，要办

工厂，搞农场，这样半工半读的勤工俭学才是正规化。”后来我们这样做了。为了开办农场，区政府将麻疯岩附近10多亩土地拔给学校，种上蓖麻，养蓖麻蚕，又将谷埠街的一间街道小工厂（只有两台破旧的皮带车床，里面是工厂，外面是门市部和充电车间）拔给学校。为了增添设备，扩大生产，特派一名技工梅同志到贵阳、株州等地购买机床。1966年初，把工厂搬进学校，新旧机床已有10多台，用5间教室作厂房，招收技术工人50多人，派25名学生当学徒，这样全厂职工将近100人，工厂初具规模，基本上能自产自销。从此，学校的勤工俭学，已由最初简单的体力劳动进入较为复杂的机器生产的新阶段。

### 三、认真贯彻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提高教育质量

在解决学校经费的同时，我们紧紧抓好提高教育质量工作。在指导思想上，把认真贯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提高教育质量放在首要地位。努力使民办学校赶上或超过公办初中教育水平。

#### （一）德育方面

德育，主要培养学生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热爱集体的思想。全校老师以身作则，处处为学生树立榜样。因此尊师爱生、讲文明、有礼貌，学雷锋做好事的风气逐步形成。许多学生自觉地利用星期天或节假日，到车站、街道和饮食店等地方进行义务劳动，多次得到群众来信表扬；有的主动为学校平整场地，维修课桌凳，打扫清洁卫生，从而树立了良好的学风和校风。

## 〈二〉智育方面

为了保证教学质量的提高，学校每年都招聘具有大专院校文化水平的青年教师任教。学校经常组织教师互教共学，改革教学、总结经验；还不断表扬先进，树立榜样；也经常派出教师到公办中学观摩，学习先进经验，从而提高教学水平。

学校安排每天上午上课，下午劳动。每天早读一节，晚自修两节，让学生有充分时间做作业。而且在复习旧课的同时预习新课，做好课前准备工作，努力上好每一堂课。

为了搞好教学，教师分科分组集中学习和备课，互相检查教案和听课；学校经常举行公开课，开展各种竞赛，在竞赛活动中，学校出题，集体评分，讲究效果。公开课前集体备课，反复试教，目的是培养典型，树立榜样。在教学方法上，要求教师讲课联系实际，结合实践；根据学生年龄特点进行教学，精讲多练，讲练结合；注意启发学生的独立思维活动，培养学生的分析能力。学校领导不断加强教学检查，经常下班听课，每周不少于4节；随时抽查学生作业，检查教案，没有备好课的教师不准上课。通过以上活动，提高了教学水平，保证了教育质量。在校学生成绩不断提高，毕业的学生，升学率亦由原60%左右提高到85%以上，成为全市初中升学率较高的学校之一。

## 〈三〉体育方面

学校每学期都有计划地组织学生开展各项体育活动，加强体育锻炼，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和成长。经检验，全校学生体育达标率在95%以上。中考体检几乎全部合格。篮球训练成绩更为突出，曾多次获得市初中男篮女篮比赛冠、亚军。乒乓

球队在全市也是名列前茅，广东高州乒乓球队来柳访问时，首先在我校进行友谊赛，我校学生连胜了几场。领队同志对我们说：“你们打得很不错，民办学校能培养出这样好的体育苗子，值得我们学习。”

#### 四、勤俭办学，群众支持

学校实行半工半读，在抓紧提高教育质量的同时，还积极大力地兴建校园，为学生创造良好的学习环境。学校南邻有一口大泥塘，面积约1000平方米，最深处约3米多。这口塘很不卫生。学校发动师生义务劳动，用不到两年时间，终于挖土坡填平大塘。在平整场地的基础上，新建教室5间、办公室1间、厕所1间、公用厨房1间、教师宿舍10间，总共建筑面积约1300多平方米。还抢修4间教室危房。1964年初，鱼峰区政府拔款4万多元给学校，准备建筑3层12间教室的教学大楼。由于学校由5个班扩充到14个班，学生由200多人扩充到700多人，人数增多，场地有限，不能满足教学活动的需要，于是便想向南北相邻的航空站宿舍区和铁路宿舍区扩大校园。开始两方领导都不同意，经过争取，得到两方的支持，终于实现我们的愿望，获得建筑面积240平方米，占地面积约500平方米，两路占地总面积约3200平方米，占学校总面积约三分之一。得了地面，学校完成建筑任务后，把围墙起好，使校园完整化，面貌焕然一新。家长们看到学校有了发展，教育质量有了提高，很乐意自己的子女在此求学，因此，非常关心和大力支持学校的勤工俭学活动。在建校过程中，除师生们挑石头、挑河沙、挖地基、打地台（包括新建的铁路宿舍区和航空站宿舍区）外，其他工

作如运输石头、石灰、木材等，都得到家长们帮忙，有的家长是单位领导，有的是司机，都主动出人出车。在整个基建过程中，除请一些石工、木工、砖工、瓦工等技术工人外，其他工作都由家长们和师生们共同干的，为学校节约三分之一基建费。

### 五、在艰苦中创业，在奋斗中成长

我们逐步办好这所勤工俭学的半工半读学校，受到群众的欢迎。1964年，不少考不上高中的学生，请求来校就读。由于班上座位有限，只收4名，其中铁二中2名、市六中2名。经过一年的学习，4名学生中一名考上柳高，一名考取南宁市化工学校，两名录取市一中。消息传开后，各战线和部门更加重视和支持。皮革厂主动找上门来，请求学校为他们办一个皮革专业班，经费由他们负责，每学期还有一定的经费补贴学校，专业课的老师由他们派，文化课由学校老师上，教学管理由学校负责。学制两年。经老师研究讨论，学校决定开班。1966年初，已做好一套职业班专用课桌椅、准备秋季招生。可是“文化大革命”来了，计划不能实现。

1966年6月，“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半工半读的民办鱼峰中学被冲击否定，后改为全日制的民办曙光中学。1983年又改名为柳州市第十八中学。

# 柳州化工学校的创建始末

杨育晞

广西柳州化工学校是广西壮族自治区办的一所中等专业学校，创建于1958年8月。它受区、市双重领导，主管单位是工业厅，学校党组织和人事调配均由市委管，其他一般工作也向市委、市政府请示汇报。

1958年上半年，全国已呈“大跃进”形势，当时国家在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期间，把发展化学工业作为工作的重点之一。化学工业大发展，便需要大量的化工技术人才。为此，自治区有关部门决定，除在南宁工业技术学校已办有的四个化工专业之外，还在柳州、桂林、梧州三个市各新办一所化工学校。

柳州化工学校建校的决定仓促，没有充足的筹备时间。校长郭子青是位年近半百的南下干部。他同几位匆匆调来的干部承担了开初一段时间的工作。我于8月底调来当副校长。当时首先遇到的最大问题是没有校舍，马上得解决几百学生报到后的住宿吃饭问题。市里很支持，决定把市工人俱乐部（今市工人文化宫）的四、五间文娱活动室借给我们暂住。开始什么也没有，学生只好几十人挤在一间房里打地铺。过了一段时间，市木器生产合作社（今市木器厂）为我们赶制了100多张上下铺木架床，学生才免除睡地之苦。因为房屋不够用，临时在俱乐部的跳舞场旁边用竹篾搭了两间棚厂做宿舍。后来又陆续添置了一些桌椅。

柳州化工学校招生对象是初中毕业生。1958年夏季，广西工业系统的中等专业学校招生11000人，比上年多了几倍。当时广西学生来源不够，便去广东招。所以柳州化校的学生，有三分之一即将近100人是从广东的普宁和龙川两个县招来的，另有4人来自广西的全州县，其他的是来自柳州市和柳州地区一些县。学校没有派人去各地招生，而是由自治区委托两广有关地市县统一招收。我和教师艾克行受工业厅指派，曾去广东湛江把一批原来工业厅已经分配给南宁工业技术学校、后来工业厅又临时改分配给柳州的学生接了回来。这批已得南宁工技校取录通知的学生约50人，他们到柳州后，见柳州化校条件这么差，又得知南宁工技校条件很好，便闹了起来，说是欺骗他们，吵着要去南宁。闹了将近一个月，经工业厅同意，这批学生最后还是转去了南宁工技校。

柳州化校的教师绝大多数是这一年刚从学校毕业分配来的，如孙业芬（女）、廖德泽、陈时桐、艾克行、甘德隆、周祖骏、李家澄等都是刚从桂林广西师范学院的化学系和物理系毕业的；教数学的朱学礼，毕业于广东中山大学；较有教学经验的是教务主任兼教俄语的张岳天和教语文的林群英老师。他们二位从柳州市的中学等单位调来。校部一直没有设立科室，只有几个干部分管青年团、总务、保卫等方面的工作。

由于问题成堆，工作忙乱，到9月初还未能开学，只是组织学生到农械厂、铸造厂、砖瓦厂等单位去劳动，搬运砖头、焦炭、生铁，参加大炼钢铁。不上课，学生思想稳定不下来。于是在9月底把学生暂编成6个班先上课，开的有语文、数学、物理、化学、俄语、制图等基础课。教室是没有

的，视礼堂或哪间房有空就在那里上课，有时在露天上课，晚上无法自习。工人俱乐部原来仅有供少数工作人员用的生活设施，突然来了几百人，开饭、用水、洗澡都很困难。教师也是在没有什么教学设备的条件下坚持备课、上课。当时教师和学生都理解到，这种种困难是在经济建设和各项事业大发展中难以避免的，多数人能耐心坚持，有一股热情和干劲，没有多少怨言。

为了进一步稳定师生情绪，10月底补行了开学典礼，接着又决定划分专业，按专业分班。经请示工业厅同意，柳州化校设无机物工艺、有机化学工艺和分析化学三个专业。培养目标，是为化学工业输送初级的技术人员。分专业时，学校实有学生294人，共编为7个班，即无机专业3个班，有机专业2个班，分析专业2个班，各班人数都是40多人。

柳州化校与其他中等专业学校一样，学生不用交学杂费，而且每人都享有助学金。上级按每个学生每月10元助学金拨给学校，规定其中5角钱用作学生的集体福利，如医疗费、困难补助等，其余9元5角我们参照柳州地区各中专学校的做法，定为10元、9元5角和9元3角等，发给学生做伙食费。学生的粮食定量每人每月32斤。那时猪肉8角钱一斤，9元左右的伙食标准还算过得去。

尽管已经开学上课，但是没有自己的校舍和教学设备，学校不像个学校。这个根本问题不解决，师生员工的思想就不可能真正稳定下来。学校领导分工我管教学，还考虑到我是柳州人，一直在柳州工作，熟悉本地情况，便又分工要我管建校工作。所以我很多时间是往外跑，联系解决建校、购置床铺、桌椅等问题。我们设想过多种方案，一次又一次地

去争取。但是，要现成的处所办学校的种种打算都不能实现，因此只好向工业厅请求，让柳州化校另择址新建校舍。工业厅表示同意，叫我们找好地址后再造工程预算，由区里拨给学校经费。我们通过市工业局取得市城建部门的支持，划了郊区白沙村旁边一块近100亩的土地，作为柳州化校的校址。这时已是1958年11月。

区里虽然答应给钱建校，但那时财政已经很紧张，钱一时不会拨下来。再说各行各业都要“大跃进”，大干快上，新上基建项目遍地开花，建筑材料非常紧缺，建筑公司根本承接不了那么多工程。为了让工人俱乐部能够正常开放，市里要我们尽快搬出来。我们向区里反映了这个情况，并说明搬的办法已想尽，要搬只有往白沙搬。工业厅同意我们搬去白沙，并指示我们边上课边劳动，自己动手建校。

1958年12月初，柳州化校终于搬到白沙村，在那里租、借了几间民房，师生员工自己动手买来茅草，搭盖了几间草棚，3间作教室，2间作男生宿舍，1间作厨房。吃的米是自己用板车从城里拉回来，用的水是自己下河挑。自己动手这样干，能不能把一所正规学校建立起来？学校里有些人认为难以做到，即使能建成也不知到何年何月了。我们师生当时建校劳动，能做的只有一件事，就是打砖坯。砖坯做出了九万块，可是没有窑，无法烧成砖。隆冬来临，北风凛冽，白沙那一地带地势开阔，比城里更冷。长时间在荒野泥水里劳动受不了，干了将近一个月的打砖坯劳动就暂时停了下来。这年冬天雨水又比较多，风吹雨打时间久了，砖坯终于又变成了一滩泥。这年11月中旬，中央教育部一位领导同志来柳州视察工作，同我们一批中专以上学校负责人和

部分教师，在柳州饭店开了个座谈会。会上，他谈到教育方针时说，现在办的学校已大不同于从前的学校了，没有什么教室、设备，有些人认为这不是学校，我看很好，很必要；所以新办的学校招生不是多了，而是少了些，还要大办，步子还可以大；他还说，中央有关领导同志讲了，现在这样的正规学校将来不存在了，以后工厂办学校，公社办学校，教育部、厅、局也不存在了，由工业部、农业部管教育……。在此之前，我曾和本校教师孙业芬、南宁工技校校长李仕华、桂林化校副校长梁声昌去参观过浙江杭州化工学校。看了这所创办于1953年、已颇具规模的学校各种设施后，对我们很有启发。我们认为，办化工学校必须具有“三室一厂”（即寝室、教室、实验室和实验工厂）的基本设施和一批合格的教师，否则培养出来的学生不可能达到合格的标准；反观我们学校现状，对办好柳州化校，越来越觉得没有把握。但那位领导讲的由工厂来办学校的办法，却对我们有所启发。

于是我们向工业厅提出建议，把柳州化校合并到柳州化工厂去。因为柳化是区里的重点工程，家大业大，如果肯把我们接管过去，学校的一切问题都好解决。我们曾两次提出这个请求，区里均未答复。

从12月初开始，便有学生打报告要求退学，学生有各种借口，但主要原因是，他们觉得学校不像个学校，前途渺茫，不如回家另找出路。我们虽然不批准他们的要求，做了劝说工作，但有些学生去意已定，不辞而别。从12月中旬到1959年元月底，共有20多个学生自动退了学。与此同时，个别干部也打报告要求退职，还有一个教师请假回家，一去就没有再回来。

1959年初，工业厅领导同志告诉我们，自治区1959年的经济发展方针有所调整，将以农业为主，工业着重搞轻工业，化学工业规模要收缩（柳州的柳化压缩基建投资，其他几个在筹建的化工厂都下马）；还向我们说明，全国化学工业分为4类地区：1类是有较好基础；2类是有一定基础；3类是基础很小；4类基本上没有基础。广西属第4类。而中央的方针是着重发展2、3类地区。广西的化工资源不清楚，也没有电，就算有了设备也无用。

柳州化校搬到白沙以后，工业厅的有关人员来视察过，目睹了师生员工的困境。我们再次向工业厅表示，目前这种局面难以继续支撑下去，必须采取断然措施才行。1959年2月下旬，自治区领导做出决定，把柳州和桂林两所化校合并到南宁工业技术学校，随即准备迁校。这时学校除了近300人和一些床架桌椅外，就没有什么家当了，所以在3月中旬，很快就完成了搬家任务。到新的学校后，保持原来的专业和班级立即上课。柳州化工学校至此结束了它短暂的历史。四月下旬我也随迁校离开了柳州，到南宁去工作。

# 广西第一所中等农技校在 柳州创办的回忆

廖 钊

## 一、学校的创建及校名校址的变迁

现在柳州市北郊沙塘镇的柳州畜牧兽医学校，它的前身是解放前的广西省立柳州高级农业职业学校，创建于1940年4月10日。它是广西省的第一所中等农业技术学校。

30年代以前，距柳州市北郊17公里的沙塘，是一片荒山野岭。当时国民党广西省政府从桂南移民前来沙塘，成立一个农村建设试验区（又称垦村），随后又在沙塘设立广西农业试验场（即现广西农科院的前身，柳州地区农科所的所在地），意欲把柳州沙塘办成广西的农业技术中心。在1938年夏日本侵略军大举进攻华南，广州危在旦夕之际，国民党政府趁设在梧州的广西大学被迫迁往桂林之机，又决定把广西大学的农学院，单独迁到柳州沙塘。而后，有感于农业的发展缺少技术人才，便接纳广西农事试验场场长马保之博士之建议（马保之系广西大学校长马君武之子，现在台湾任食品工业发展研究所所长），又在沙塘创建一所高级农业技术学校，定名为“广西省立柳州高级农业职业学校”（简称柳州高农）。当时柳州沙塘尚设有农林部西南区推广繁殖站、广西省江水土保持实验区及柳州沙塘兽医防治站。及至抗战胜

利后，国民党行政院又把华南善后救济分署的机耕队也设在柳州沙塘。可以说，沙塘在当时的确是名符其实的广西农业中心。

建校初期，由广西农事试验场拨出位于沙塘街北面约3公里的苗圃地100多亩作为校址。经过一番筹建，于1940年8月便开始招收农林及畜牧兽医科第一届学生各一班，共70人。当即一面上课，一面继续建筑校舍，经过一年的时间，校舍基本落成。计有竹篱批灰墙瓦面结构的平房教室一栋，小礼堂及办公室一栋，教工宿舍一栋，还有泥砖墙瓦面结构的学生宿舍六栋，分别命名为“柳江”、“桂林”、“蒼梧”、“邕宁”、“西林”及“平乐”村。计划一个班学生住一个村。共计建筑面积2524平方公尺。1942年12月，沙塘乡绅陈祁昌，慨赠位于校本部东面对河的旱地340多亩，供学校建立实习农场及牧场。学校在该场又建有猪牛舍及职工宿舍。至此学校已初具规模。

1944年11月，日军侵桂，柳州沦陷。学校由校务主任余桂甫率领，疏散到融县（现融水县）达东村，继续上课。至11月中，融县县城沦陷，学校又被迫搬到融县大苗山区浦令村。此时，盗贼蜂起，交通断绝，学校被困于山区，处于极端困难之中，缺钱缺粮，政府又无法接济，学校虽千方百计勉力维持，但已无法上课。部分学生乃离校前往柳城，参加该县民团司令部的政工队，宣传组织群众参加抗日队伍，与敌周旋。1945年4月，由于生活难以维持，学校再次被迫迁往三江县良口乡。时虽钱粮仍无着落，但幸与广西农事试验场联系上（当时试验场搬散至三江县），得试验场大力资助，才得以糊口度日。直至同年8月，日军投降，抗战胜利

后，学校才从三江迁回柳州沙塘原来校址。但大劫之后，学校损失惨重，除图书仪器和档案随校疏散外，一切均告损失，原址校舍，礼堂办公室及学生宿舍“西林”、“平乐”、“苍梧”、“邕宁”四栋，均已被毁，瓦砾无存。其余校舍亦遭破坏，无一完整。经极力抢修，9月中旬，才勉强复课。

1949年9月，柳州高级工业职业学校由柳州南郊羊角山（现广西结核病防治院所在地）迁到沙塘街广西农事试验场场部旧址。柳州高农则迁往柳州高工的羊角山校址。直至解放后1951年2月柳州高工他迁，柳州高农才迁回沙塘街接收柳州高工的校址。

至于校名，解放后也经过几次更改。1965年，高农的林业部份，分开成立广西林业学校。1960年，学校下放给柳州地区领导，改称柳州农业专科学校（设大专班及中专班）。1962年，大专班下马，恢复由自治区领导，改为原名。1970年，再次下放，与“柳州地区共产主义大学”合并。1972年，“共大”下马，三校又复分开，改称柳州地区五七农业技术学校。直至1980年，自治区又收回领导，把农艺科并归他校，专办畜牧兽医科，改称柳州畜牧兽医学校。

## 二、学校的编制及教职员

建校初期，校长一职由广西农事试验场场长马保之博士兼任。学校的日常校务，则设校务主任一人，代理校长处理校务。校务主任职，初由余桂甫担任，抗战胜利后，余离校他去，则由阮家骏老师继任。直至1948年8月，马保之调农林部任职，无暇兼顾本校事务，则调平乐农校校长周琪前来

接任专职校长。校务主任一职，即予取消。

建校之初，设教务处、训导处、事务处、实习处、职业指导委员会、经费稽核委员会等机构。各机构设主任一人，均由专职教师兼任。教务处主管教学工作；训导处负责学生的思想、纪律及生活的管理；事务处主管学校后勤的一切工作；实习处则主管学生的生产实习及农牧场的工作。抗战胜利后，鉴于职业指导委员会及经费稽核委员会两会的职能作用不大，予以取消。

1943年，该校师资最为充足。时广西为抗战后方，沦陷区的人员，都愿到广西来工作，故人才济济。全校共有教职员40多人，其中专任教师10人，均系大学本科毕业。此外，许多科目尚聘请试验场及农学院的专家教授兼课。如著名病虫害专家柳支英、陆大享、罗达新、何彦琚，甘蔗专家彭绍光、满世瑞，水稻专家张国材，林业专家刘成训，育种专家贺汉儒、范福仁及现任广西畜牧研究所所长韦文雅等均在该校兼过课。

柳州沦陷以后，外地教师大多离校他去，专职教师稍少，仅有15人左右。师资虽缺乏，但所缺课程，仍可聘请试验场专家来兼课，故依然没有影响教学的进行。在此期间的专职教师有：现广西农学院园艺系主任温扬真教授、现广西农学院林业分院院长李治基教授、现广西畜牧研究所高级畜牧师张浩荣、原柳州高中副校长刘贞藩、柳州市农科所高级农艺师廖锋、以及广西农学院早期毕业生黄志元、谢廉正、覃济泽、吴增亮、王旒、黄聘球、罗予供等，尚有外地前来的教师朱甲衍、陈名流、覃秉镛等均在该校任过教。

### 三、教学方法及内容

解放前柳州高农设农林及畜牧兽医两科，每科设科主任一人，由专职教师担任。每科学生在一年级期间，以攻读语文、代数、几何、物理、化学等普通课为主，并兼修英语、动物、植物、作物通论等基础学科，目的是为学好专科学科打下稳固的基础，也可为学生今后继续升入大学深造创造条件。以后农林科必修的学科有：作物学（包括食用作物、经济作物）、作物育种、植物生理、造林通论、造林各论、树木学、森林经营、遗传学、测量学、农田水利、植物病害、植物虫害、园艺学（包括蔬菜、果树、花卉、庭园设计）、土壤学、肥料学、生物统计、农场管理等38种学科。畜牧兽医科必修的学科有：家畜解剖学、家畜生理、家禽学、家畜鉴别、杂生物学、家畜各论、农业概论、遗传学、家畜疾病诊断、细菌免疫、家畜外科、内科、家畜传染病、家畜育种、牧场管理、外科手术、兽医警察、饲料与饲养等。此外畜牧兽医科三年级每周尚有2节临时选修课，各科除专科学科外，还有体育、军训课。

教学采用理论与实践并重的方法，各学科在讲授课程以后，必与实习相结合，使学生对课程有深刻的理解。同时教师与学生组织各种学术研究会，以促进学生集体研究与自学的开展。一般每天上午在课堂上理论课，下午则到田间实习。当时农林科利用本校农场实习，种有各种农作物及蔬菜40多个品种，并栽有沙田柚、柑桔、桃、梨及葡萄等果树13种，还有70多个品种的花卉，及马尾松、柳杉、银杏等14个品种的森林苗木。畜牧兽医科利用牧场实习，养有水牛、黄

牛、马、羊和鸡、鸭、鹅等畜禽，并开设兽医诊所，为群众的家畜看病。此外，学生在毕业之前，还得到外地实习一段时间，畜牧兽医科则到桂林良丰广西家畜保育所、良丰种牛繁殖场及广西农学院畜牧兽医系等处实习；农林科则到广西农事试验场及广西农学院实习。

当时学校办学，注重学生的质量，而不追求学生的数量。要求所培养出来的学生都要掌握真实的科学知识，具有优良的品行。规定在校期间，每科成绩均及格方能升级，如有不及格，准予补考一次，如补考仍不及格，则予以留级；留级二次者，则以退学处理。各种成绩均及格，而品行优良者，方准予毕业。因此，一些学生，由于学科跟不上，或因生活艰苦，而自动退学的不少。学生的毕业率一般在60%左右。沦陷期间的学生毕业率则更低，如三班只有28%，四班为44%。所以该校的毕业生，大部份都能理论联系实际，具有真才实学和实干精神，深得社会人士赞赏。

教材方面，由于当时缺乏农业职专的课本，绝大部分的教材均由教师参照大学的教材自编。由于职专是三年制，所学的科目又多，实习时数也多，故教材的内容比大学教材较简略。普通科教材如语文、数学等则采用当时高中的课本。

#### 四、学生的生活与学风

解放前柳州高农的学生，大部份是来自各县农村，故作风较艰苦朴素。学生是公费学习，不用交纳学费及一切杂费，学校每月尚供应学生每人糙米40斤，茶油一斤，作为伙食费。

抗战时期，每班学生住在一个“村”（即一栋学生宿

舍），光复后，因宿舍被毁，只能一个年级住一个村。村内除宿舍外，尚设厨房、贮藏室及猪舍、粪坑，就象一个大家庭一样。每村并分配有足够生产自给的菜地。每村由学生民主选举村长、生活委员、生产委员及出纳、会计、保管各一人，负责管理该村事务。村长在导师的指导下，领导全村的工作。生活委员负责该村食堂及村内清洁卫生等工作的管理。厨房的做饭及村内清洁卫生的打扫等具体工作，均由学生轮流担任（光复后，回校学生较少，学校给每村配厨师一人）。生产委员除领导学生到实习农场劳动生产外，并在课余时间带领学生到村内的菜地搞蔬菜生产，供应该村食堂的需要。每村自养肉猪数头，解决食堂的肉食。食堂所用的燃料，也由生产委员在星期天、假日率领学生上松林采集。所以学生的伙食，通过自己的劳动，基本得到解决。该村的会计出纳，则负责该村食堂的帐目管理。保管员则负责管理该村的工农具及一切公物。每班尚民主推选学习委员一人，负责班内上课、实习及晚上自修的管理，并负责该班“学习园地”的出版以及各种学术研究会的学术交流等工作。

这样，一个村就是一个班（或年级）学生的生活集体，学生的生活、学习及纪律均由学生自己管理。学校在每班只设由专职教师兼任的导师一人，也住进村内，成为该村的一员，与学生同甘共苦，对学生的生活与学习，负责指导与督促。

由于生活的艰苦磨炼，促进了学生勤奋好学的精神，充分发挥了学生们的学习与生产的积极性，学生成绩也较优异。生活虽然艰苦，但学生们友爱团结，生活过得十分愉快。学校的经费困难，也随之得到部分解决。

## 五、办学成果

解放前的柳州高农，由于办学条件较差，经费极端缺乏，当时社会对农业又不够重视，所以学校的发展很缓慢。尤其在日军侵华，柳州沦陷的时期，学校又遭大劫，元气大伤。在那10年中，除1945年因柳州沦陷，及1949年因迁校和解放前夕，局势动荡没有招生外。其他各年每年也只招收农林及畜牧兽医科学生各1班，1至8班共招生536名。1947年秋，另招修业1年的兽医技术人员训练班38名。自1943年秋第1班学生毕业直至1949年第6班学生毕业（其间1945年因柳州沦陷缺毕业班），7年共有历届毕业生262人，其中农林科131名，畜牧兽医科93名；另兽医培训班毕业生38名。这些毕业生，目前遍布广西各地、市、县的科研单位、院校、场站以及各级政府机关。据初步了解，这些毕业生中，获得教授、研究员等高级技术职称的就有20人之多。他们潜心科学的研究，成效显著，如农四班陈世生同学，对柑桔病虫害的防治和柑桔的栽培等方面的研究；张有成同学对油茶与马尾松的速生生产的研究；农三班的刘政同学，对松毛虫天敌的研究；农七班同学庞业声（现广西农学院副教授）对利用同位素培育作物新品种的研究；农六班来家学同学对杉树良种的培育；农五班李荫榆同学对甘蔗良种的培育等等，都曾获得重要成果受到国家或省（区）级的奖励。其他获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的同学黄家禄、陶大源、潘家盛、冼寿微、陈志群、罗诚、莫斌、黄冠基、阎峻岩、崔国祥、吴石坚、陈建宝、梁家慰等，也曾在科技工作中作出较大贡献。还有获中级技术职称的毕业生有21位。

不少同学在解放以后任领导工作，如现任广西区畜牧局局长陈海云、区水产局副局长李贵隆、区人大经委副主任梁国乐，任广西区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陶大源、区甘蔗研究所所长陈世生、区种子公司经理潘家盛、区林业厅种子站副站长来家学、柳州地区科委主任黎敦良等。据不完全统计，任正副处级领导干部的有13人。

# 广西第一所林校在柳州的创建与发展

蒋 纪

在八山一水一分田的广西，林业资源丰富，很需要大量林业技术人才。但在解放前国民党政府不重视林业教育，整个广西只设有一所“广西省立柳州高级农业职业学校”，该校只开设畜牧兽医科及农林科两个科，而且农林科偏重农业方面的课程，林业方面只讲授造林和森林经营两门课程。这很不适应广西林业建设的需要。

解放后，人民政府重视林业，加强了林业教育，1951年春就开始在广西柳州高级农业学校招收林科专业班。为了适应第一个五年计划林业建设的需要，1953年上级林业主管部门决定筹建广西林业专业学校。先在柳州农校设立森林科，为办柳州林校搭架子，并拨专款建设柳州林校校舍，计划于1954年成立林校。

1954年7月，由于林校校舍尚未全部完工，加上教师、干部配备也有困难，只得将柳州农校的森林科全体师生从农校分出，搬到柳州市沙塘镇西北。新建的林校挂名“柳州农校分部”，人事、财政、基建等方面均由分部自己管理，并接受中央林业部和省林业厅的直接领导。中央林业部和省林业厅颁发文件拨出经费时均已直接使用“柳州林校”之名。

1955年底，在上级领导的关怀下，加速了建校进程，林

业分部第二、第三期工程已相继完成，还购置了图书、仪器，开辟了新的苗圃和标本园，林业分部已具有一定的规模，成立林校的条件已基本成熟。于是，在1956年2月5日，林业分部与柳州农校脱钩，正式成立林业学校。

学校定名为“广西省柳州林业学校”。共有学生262人，教职工42人。由郭季祥、谢维晋二人担任副校长。该校有校舍4700余平方米，实验室5个，苗圃和标本园共10余亩。

学校成立后，加快了各项基本建设，增建了校舍7200余平方米，增购了教学仪器、图书和家俱。林业厅新调配的教师、干部也陆续到校。当年秋季扩大招生，使在校学生由原有260余人增至730余人。面对学校规模迅速扩大，教学任务十分繁重的情况，林校于1956年9月建立学校党支部，由郭季祥兼党支部书记，加强了党对学校的领导。学校根据中央发展中等专业学校的方针和高教部颁发的《中等专业学校章程》，建立健全了规章制度，加强了教学管理，严格执行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教学质量得到进一步提高。

1958年8月，广西农学院的林学系师生从该院分出，迁到柳州沙塘成立广西林学院。院党委书记杨林（原广西平乐地委书记）、院长梁唐晋（原广西师范学院院长）。林学院共有4个系。林学系系主任蔡灿星，采伐运输系系主任蒋纪，林业机械系系主任张亦文，林业化工系系主任梁超。将柳州林校并为林学院的中技部，由解淑英任中技部党总支书记兼主任。1958年到1962年中技部连续扩大招生，学生达920余人，教职工扩大到230余人。

1962年冬，因国民经济调整，广西林学院停办，所有各系师生归并广西农学院迁回南宁。1963年1月，原林学院中

技部又恢复为林校，留在柳州沙塘林学院旧址，定名为“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林业学校”，由原广西林学院人事处处长裴善文担任林校党总支书记，原林学院采伐运输系系主任蒋纪担任该校校长。

林校恢复以后，吸取了“大跃进”时期暴涨暴落的教训，确定学校规模为学生400人，保留林业和采伐运输两个专业，加强了教学管理，教学秩序逐步恢复正常，并于1964年接收沙塘林场为教学林场。

1965年9月，在统一招生和统一分配的前提下，学校开始实行半工半读教育制度，改名为“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林业工读学校”。并于1966年1月接收三门江林场的杨柳林场，扩大半工半读实习的基地。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同年6月12日全校召开“文化大革命”动员大会。自此以后学校受到冲击，无法上课，停止了招生。在极度混乱中，学校元气大伤。

1969年重新成立学校党支部，由当时的军代表侯增奎担任党支部书记兼校长。1971年4月学校恢复招生并改用现校名“广西壮族自治区林业学校”。1972年秋扩大招生，从1971年到1977年共招生7届，838人。招收的学生全部实行由林场、农村推荐招收工农学员。毕业学生的分配，大部分是从哪里来到那里去。由于“四人帮”横行，知识分子被打为“臭老九”，教师不敢教管学生，加上工农学员文化基础差，因而这阶段的教学质量得不到保证。

1977年8月学校成立党委会，由郝先正、韦继清二人担任党委副书记，恢复统一招生，招收高中毕业生，学制为2年。1980年由曾道河担任党委书记，韦继清担任副书记，郭

季祥担任校长，学制改为3年。1985年，由刘显栗担任党委书记，黄钦宁担任副书记，练耀凡担任校长，池天源，黄辉华担任副校长。招生对象改为初中毕业生，学制为4年。

广西林校创办以来历时30余年，当中虽受“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的干扰，但不断发展，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至1986年止，该校共有校舍31000余平方米，实验室15个，实习车间3个，苗圃20亩，教学实验林场17000余亩，教学人员有副教授2人，讲师22人，工程师3人，教员数十人。先后开设了造林、经营、林业、采运、林机、木机、林化、会计8个专业。毕业学生23届，共4225人（见附表1）。从1963年以来，学校还办了短期训练班38期，培训各类林业干部2486人。（见附表2）这些历届毕业生和结业学员，遍布广西各个地区和市、县，从事林业建设。该校现已成为广西全区培养中等林业技术人才的摇篮。为发展广西的林业做出很大的贡献。但是以广西现有森林面积计算，该校历届毕业生的4000余名学生，在广西的每1万亩森林只能分到半个毕业生。如果同广西到本世纪末林业发展的战略目标相比，更是任重道远了。

#### 附统计表二份

历届毕业学生统计表

(附表1之1)

年份	专业 班数	合	计	林	造	经	采	林	木	林	财
		人	数	业	林	营	运	机	机	化	会
1956	2	93		45	48						
1957	1	48		48							
1958	3	112		74	38						
1959	13	488		256	232						
1960	13	497	497								
1961	没有毕业生										
1962	9	275	90			55		61	59		
1963	8	261	120			103			38		
1964	3	101	73				28				
1965	没有毕业生										
1966	没有毕业生										
1967	3	100	64			36					
1968	3	123	82			41					
1969	5	198	158			40					

(附表1之2)

年份 专业 数	合计	林		造	经	采	林	木	林	财
		班	人	业	林	营	运	机	机	化
1970	没有毕业生									
1971	没有毕业生	45								
1972	1	45								
1973	没有毕业生									
1974	5	199	119			80				
1975	3	103	34			69				
1976	3	118	80			38				
1977	4	162	84			78				
1978	4	155	79			76				
1979	1	32	32							
1980	7	297	131			166				
1981	5	186	111			75				
1982	没有毕业生									
1983	4	158	77			41				40

(附表1之3)

年份	专业 名	合 计		林	造	经	采	林	木	林	财
		班数	人数	业	林	营	运	机	机	化	会
1984		6	236	155			40				41
1985		6	238	157			40				41
总计		112	4225	2198	423	318	978	28	61	97	122

附：农校林科、林业分部毕业学生数

1954	1	24	24								
1955	2	80	80								
总计	3	102	102								

历年结业短训班学员统计表

(附表2之1)

序号	办班时间	培训内容	培训对象	结业人数
1	1963年上半年	财务会计	林业系统 财务人员	80
2	1963年下半年	财务会计	林业系统 财务人员	80
3	1964年上半年	木材检尺	林业系统 检尺员	130
4	1973.9—1974.1	林业基本知识	公社林业 助理员	46
5	1974.4—1974.11	汽车驾驶与修理	招工	180
6	1974.6—1974.8	木材检尺	林业系统 检尺员	79
7	1974.9—1974.10	杉木林的营造	杉木基地 职工或社员	35
8	1974.9—1975.1	财务会计	林业系统 财务人员	67
9	1974.11—1975.1	木材检尺	林业系统 检尺员	75
10	1975.4—1975.6	杉木林的营造	杉木基地 职工或社员	46
11	1975.6—1975.8	杉木林的营造	杉木基地 职工或社员	41
12	1975.9—1975.10	杉木林的营造	杉木基地 职工或社员	45
13	1975.11—1975.12	杉木林的营造	杉木基地 职工或社员	39
14	1976.4—1976.6	杉木林的营造	杉木基地 职工或社员	69

(附表2之2)

序号	办班时间	培训内容	培训对象	结业人数
15	1976.7—1976.10	杉木林的营造	杉木基地职工或社员	70
16	1976.8—1976.9	马列主义常识	区直林业单位党支部宣委	79
17	1976.10—1977.1	杉木林的营造	杉木基地职工或社员	65
18	1976.11—1977.1	木材检尺	林业系统检尺员	95
19	1977.3—1977.5	木材架空索道	林场干部工人	26
20	1977.6—1977.10	木材架空索道	林场干部工人	40
21	1977.6—1977.8	油茶有关知识	油茶基地职工	39
22	1977.8—1977.10	木材识别	林业系统干部职工	62
23	1977.9—1977.10	林木良种	林业技术干部	34
24	1977.10—1977.12	杉木林的营造	杉木基地技术骨干	40
25	1978.3—1978.5	财务会计	林业系统财务人员	120
26	1978.6—1978.8	财务会计	林业系统财务人员	120
27	1979.8—1979.10	财务会计	林业系统财务人员	39
28	1979.8—1979.10	林木种子检验	林业技术干部	120

(附表2之3)

序号	办班时间	培训内容	培训对象	结业人数
29	1980.9—1981.1	林业基本知识	县林业局长	36
30	1981.3—1981.7	林业基本知识	县林业局长、林场场长	67
31	1981.9—1982.1	林业基本知识	县林业局长、林场场长	76
32	1982.3—1982.7	林业基本知识	县林业局长、林场场长	71
33	1982.9—1983.1	林业基本知识	林区公社书记或主任	57
34	1983.3—1983.7	林业基本知识	林区公社书记或主任	79
35	1983.9—1984.1	林业基本知识	林场场长	36
36	1983—1984	香菇栽培技术	有关单位职工	47
37	1984.3—1984.7	林业基本知识	林场场长	26
38	1985.9—1985.11	林区公路施工	林场公路施工员	30
合计		三十八期		2486

# 广西大学学生促校返梧运动的回忆

沙君涛

1946年春，发生在柳州的西大学生促校返梧运动，是广西大学历史上一次很有意义的重大事件。我作为当时法律系一年级学生，有幸参加了这一运动。42个年头过去了，现在回顾起来，当时的情景犹历历在目。

1945年秋，日本侵略者投降后，当时的国立广西大学从流亡地贵州省榕江搬回广西，在柳州的鹧鸪江搭些茅草棚暂时栖身。随校一起流亡和各年级回来复学的同学，以及新招收的一年级同学，加上教职工及家属近千人，拥挤在十来间大草房里。同学们睡的是上下架床太平铺，宿舍里的过道只能一人通行，吃饭是在露天，有时上课也在露天，更不用说什么实验室、图书馆了。鹧鸪江当时四周都是光秃的土岭，距柳州市区10来里，往返全靠步行。这样的地方显然不适宜办大学，何况当时西大还是一间颇有名气的国立大学，是广西的最高学府。经过8年抗日战争的锻炼和洗礼，同学们在生活上艰苦一些是受得了的，但对学习条件和设备的如此恶劣简陋，对学习不利，因而不能忍受，很自然大家都十分迫切要求迅速摆脱这种困境。

广西大学应该搬到哪里去？广大师生以及社会各界人士都在关心和议论这个问题。当时有几种意见：一种是要搬去桂林。这主要是广西当局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的意见。理由是桂林是广西的省会，西大设在桂林既能

繁荣战后的桂林，更便于国民党广西省政府直接监督管理。另一种意见是应搬去梧州。这是绝大部分师生的意见。理由是梧州有现成的原广西大学校址，房舍充足，环境幽美；而且梧州地近港粤，交通方便，易于接受外来文化；少受国民党广西省政府当局的直接干涉，有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另外，去桂林没有现成的校舍，要新建校舍需要大批钱，短期内也不能建成，从节省国家财政开支看也以去梧州为好，也还有另一种意见是在鵝鴨江原地建校。持这种意见的人不多，也提不出什么象样的理由。

广西大学究竟搬往何处，由议论而争论，由争论而行动。终于爆发了历时半年多的西大促校返梧运动。在校内经过广大师生充分讨论酝酿，成立了以法律系三年级同学叶昭南、经济系三年级同学马曜元、政治系二年级同学李腾翥等人为首的促校返梧委员会。委员会集中同学们的意见，统一领导和指挥大家的行动。委员会成立后，即发出通电宣言，吁请国民党政府和社会同情支持，并派出代表到各地向有关当局和社会各界人士陈述理由，争取支持。现任我国农业部部长的何康同志，当时是西大农学院同学，就是派往南京重庆等地活动的代表之一。

同学们当时也知道，搬校返梧，尽管有一百条一千条理由，于国于民于学都有好处，但是阻力仍然很大。因为要校回桂（林），反对迁梧（州）的主要支持者是国民党广西的最高当局。他们权高势大，而且十分顽固，不经过一场激烈的较量和斗争，没有广泛的社会支持，要达到返梧的目的是很困难的。当时全国的形势是抗日战争刚胜利结束，中国正面临两种命运的决斗：全国广大人民要求和平民主，以蒋

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顽固派则坚持内战独裁。青年学生对于时代的脉搏最为敏感。当年发动的这场促校返梧运动，表面上是要求改善生活学习条件的福利斗争，实际上则是以它特有的形式成为当时全国人民要求和平民主的斗争潮流中的一股支流，是全国民主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运动的领导机构已成立，校内外的舆论已相当强烈，返梧的行动如箭在弦，势在必行了。同学们雇船租车正准备离开柳州，向梧州进发。可国民党柳州专员公署却下令查封所有雇请的车船，一律不准西大学生离柳。他们这一无理横蛮措施，激怒了热血沸腾的西大同学，1946年2月27日，同学们就由鹧鸪江步行出柳州，在柳州市游行示威，向市民宣传返梧的合理主张，揭露当局扣留车船封锁交通的专横无理行径。游行之后几百名同学围坐在国民党柳州专员公署门前。当时国民党柳州专员莫树杰，国民党广西省主席黄旭初及国民党政府中央教育部督学董大坝正在柳州，同学们要求他们出来接见，当面回答问题，明确取消封车扣船的禁令，不达目的誓不离去。国民党当局对于同学们的正义要求竟然置之不理，而且在专员院内布岗设警、荷枪实弹，准备实行武装镇压。可是同学们也坚持斗争，绝不要协后退，几百人忍饥挨饿，静坐在专员公署门前，通宵达旦，并且不间断地对围观群众进行宣传。国民党当局迫于群众的正义压力，终于不得不答应同学们的要求，取消了封车扣船的禁令。这一场初步较量，以西大同学的胜利而告终。

大学生上街游行示威，与国民党官府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并取得胜利，在柳州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这次行动不但震动了柳州，也震动了全广西，它使人们看到群众的力量不可侮。

游行示威取得胜利后，3月间参加返梧的同学们包乘近百艘木船由柳州出发，沿柳江顺流而下，浩浩荡荡直下梧州。沿途停靠码头口岸时，同学们均上岸对群众进行宣传。抵达梧州后，即住进蝴蝶山原广西大学旧址。这处校舍是马君武校长在任时建造，钢筋水泥结构，坚实高大的一栋栋楼房，分布在美丽的鸳鸯江畔的蝴蝶山顶山腰和山麓，各栋楼房之间修有水泥路互相连接。从梧州市区渡鸳鸯江上大学码头，有一条宽阔的林荫马路，人称“大学之道”，这里山青水秀，林茂竹修，确是一个使人能潜心治学的好处所。

同学们到达梧州后，除继续派代表外出活动及组织宣传队伍经常向梧州市民开展宣传外，大部分时间和人员则组织起来进行自学，在坚持返梧运动的斗争中进行自我教育。当时各种学术性的社团组织有如雨后春笋成立起来，如经济学会，政治学会、法律学会、土木工程学会、布谷社、十二月社等等。“大学之道”上出现各社团编辑出版的墙报，种类繁多，琳琅满目。梧州的市民学生成批的到来参观阅览。这里展现了同学们的自学成果，同时也成了当时梧州著名的民主文化走廊。

由于国民党广西当局的顽固坚持，国民党中央政府听从李、白、黄的意见，不支持广大师生的合理要求，坚持要广西大学迁往桂林。形势急转直下，再僵持下去将会给同学们带来不利。在运动中经受锻炼的西大同学，不但学会在有利的形势下组织进攻，也学会在一定的条件下组织退却。同学们在梧州坚持三个多月后，于1946年6月间撤离蝴蝶山返回桂林。全体同学遵守纪律、团结振奋，没有丝毫失败的灰溜溜的情绪。

# 柳州市成人教育发展概述

(1908—1988)

陈维子

柳州市成人教育，据目前可考文字资料，始于清光绪34年（1908年）间。当时柳州知府在城厢昭忠祠试办“普通民众识字所”，招收80名成人入学，规定要学会一千余字才能结业。入学成人有工匠、农民、市民。暂不收妇女。工匠和农民入学免收学费。该所办了多少期，何时停办，目前尚无文字资料可查。

到中华民国时期，继清代进一步以社会教育、民众教育、贫民、劳力教育等名目，实施成人教育。其中有官办、社会力量办，内容与形式多样。民国4年（1915年），马平

---

促校返梧的目的最后虽然没有实现，但作为全国学生民主运动一部份的西大促校返梧运动，在更高的层次上则取得了成功。第一，它提高了广大学生的政治思想觉悟；第二，培养锻炼了同学们的革命意志和斗争艺术；第三，涌现和培养了一大批学生骨干。这些都为后来西大学生运动的进一步发展，以至为中国人民的解放和新中国的建设培养输送大批干部打下了一定的基础。当年一起共同奋斗的同学，很多人先后都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现在不少人都已成为各条战线的领导骨干。

我想，在广西大学的史册上，应该记下这光辉的一页。

县（柳州前名）遵照当时民国政府教育部下达关于要求各省举办社会教育的通令，设立图书馆，开展通俗演讲，进行以成人为主要对象的社会教育。民国10年前后，因军阀混战，社会动乱，此项教育一度停顿，直至民国13年（1924年），战乱平息，社会教育逐步恢复。随着当时全国工农运动的兴起，柳州社团主办的成人教育甚为活跃。民国15年间，柳江道学联在城区省立第四中学创办贫民夜校，招收200余名城区贫苦的中、青年入学。学联会委员长陈振尧为名誉校长，聘请四中一些学生为义务教员。夜校学生的书籍、文具概由学联向社会募款购买供给。同年9月马平县妇女协会在中共柳州支部领导下，继之开办一所妇女夜校，招收80余名贫苦妇女入学，由四中女生杨秀春为夜校主任。课程以识字为主，同时亦开课宣传妇女被压迫、被剥削，遭受各种不平等待遇，要求解放的道理。同年11月中共柳州地下组织，为向工人宣传革命真理和传播文化知识，党员张胆在城厢斗母宫（今龙城路邮局附近），又创办一所劳工夜校，招收近百人工人和小贩入学。主讲教员为张胆、刘策奇。四中一些进步学生被聘为义务教员。至是年冬，北关外农民协会成立，又在雷王庙（今解放北路地区电影公司）协会地址内，开办农民夜校，招收农民，学习革命道理与文化知识。义务教员有曾参加广州农讲所学习的谭均任及共青团员陈秉森等人。民国16年（1927年），中共柳州地下党员又在雷王庙新办一个农民运动训练班，主要任务是培训农民运动骨干分子。参加学习的有40余人。学员的书籍、文具均由班免费发给。此外，还免费发给每人一套灰色粗布制服。学习内容为：《农民运动指南》、《海陆丰运动》、《三民主义》、《建国大纲》等。主要教员为省立四中

的教员。不久，随着全国工农运动形势的变化，在民十五、十六年间由中共地下组织领导的社团所主办成人（工农）教育受影响而停顿。

民国21年（1932年），柳州县开始创办县立民众学校，校址设在二圣庙（今金鱼巷前）。县教育局长兼校长。首届入学学生60余人，以识字教育为主。识字课本由教育局供给。同年，又设立以民众教育为任务的县立民众图书馆和县立通俗演讲所。演讲所附设在公园路县立民众图书馆内（即今柳州市文联地址），演讲所对象是民众（主要对象是成年工人、农民、市民）。教育计划性颇强。每月定期、定点（沙街、总商会门口、东门、小南路、五显码头等地）、定时（晚上六时至八时）、定演讲员向民众作通俗演讲。演讲内容，按照当时广西省所规定，有鼓励爱国、劝勉守法、增进道德、灌输常识、提倡实业、注意体育卫生等方面。以是年2月份的两次演讲内容为例，有：“班超以身救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抗日救国”、“东北八义士”、“壮士李杜”、“马占山全节反正”、“见义勇为”、“民权初步”、“劳动神圣”、“英灭印度”、“注重劳动事业”、“五十年后之新世界”、“人类的未来”、“注重卫生”等等。听讲群众，每晚最多达200余人，最少亦有60余人。此项通俗演讲，坚持了两年多。至民国22年，据柳州县有关民众（成人）教育的情况统计：民众教育馆1所；工农业余小学38所，38个班，教职工38人、学生共740人；扫盲班42个，教职工42人，学生共627人；民众学校10所，22个班、教职工28人、学生1374人；补习学校1所，学生80人。此外还有通俗演讲所、书报阅览室、民众问字处等等。这些多渠道，多

形式的成人教育，在当时收到一定效果。民国25年（1936年）以后，全国进入抗日战争时期及解放战争时期，柳州成人教育处于停顿状态。

1949年11月柳州市解放以后，柳州市成人教育在党和政府的领导关怀下，从干部、职工、农民、市民扫盲（识字）、初等文化补习教育开始，有组织、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1950年初，柳州市人民政府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制订的《共同纲领》关于加强劳动者及在职干部业余教育的要求，以及建国初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关于重视工农教育、开展扫盲（识字）教育及工人文化补习的精神，市文教局（后改称教育局）成立工农教育科，市政府成立扫盲委员会，作为专门领导机构，将全市成人分为干部职工、农民、市民三大系统，开展扫盲识字及初等文化补习的成人教育工作。在城区，职工教育方面，这一年的8月，第一人民文化馆率先开办第一职工业余文化补习学校，继之，第二、第三人民文化馆开办第二、第三职工业余文化补习学校。市自来水厂开办为本厂职工补习文化的职工业余学校。这四所学校共有学生885人。学习期限，文化班为4个月，另有一个艺术班为一年。市民教育方面，从这一年3月开始，市人民政府在河北、河南两个片开办了以识字为主的市民业余文化夜校各一所，入学市民（大部分为家庭妇女）100余人。其后各条街道先后办起了扫盲识字班或妇女文化学习班。在郊区24个行政村及一条街，以土改区为重点，开展扫盲识字的冬学运动。男女分班，两个月为一期。

至1951年，工农成人扫盲识字、初级文化教育有了新的发展。从这年5月起，市厂、场、企业单位相继成立本单位

的职工业余教育委员会。市厂、场、企业主办职工校学增至4所、学员增至2078人。市一、二、三文化馆主办的职工业余文化补习学校，改由市文教局主办，增至38个班级，学员增至1482人。9月，市人民政府新创办一所为工农干部提高文化开的业余文化学校，4个班，学员128人。柳州铁路分局又新创办5所职工业余文化学校，学员3223人。据统计，这年参加文化学习的职工约占当时职工总数的三分之一。在郊区方面，市人民政府组织农民教育工作队深入乡村动员农民入冬学，这一年组织成立了冬学业余学校6所，在15个村屯中成立学习班（组）共4164个，参加人数达2861人，约占郊区人口总数的百分之十一左右。

1952年全市开展速成识字运动以后，城区成人教育发展迅速。是年市办及厂、场办职工学校发展至17所，学员6630人（不含铁路），文化层次上升到初中。1953年市政府在河北、河南两片新创办第一、第二职工业余中学。原有两片的职工校改名为第一、第二职工业余初级学校，原有初中班全部拨入职工中学。厂、场、企业主办职工校作了调整，除农械、柳机、铸造、锌品、水电、染织、空压、木材等较大企业各独立自办职工学校外，为照顾小企业，按手工业、建筑、搬运等系统开办联合职工学校，分别称第三、四、五职工业余学校。这一年市民教育已有36条街先后开办起市民文化层次亦上升到初中。郊区农民教育自1952年始，由冬学夜校（班），转入常年夜校（班）。至1955年，城区有干部学校一所，职工学校13所，在学学员6400余人；市民文化学校9所，在学学员2159人。郊区参加学习农民达4800余人，有不少农民经过学习，懂得记工分或订简单生产计划。

1957年“反右”，柳州成人教育曾一度滑入低谷。1958年“大跃进”开始，职工业余教育走出低谷，继1953年走向高峰。1958年，全市职工业余学校增至35所，学员增至11275人。政府办职工学校作了调整，将市干校、市第一、第二职工中学和市第一、第二职工初级学校合并，总称为市职工业余文化学校，校址设在文惠路今市十二中处。到1959年，有不少厂、场、企业单位增设了政治、文化、技术三结合的职工“红专”学校。是年，职工校与“红专”学校共有56所，学员24365人，占办校单位职工总数的百分之五十一。1960年职工校与“红专”校增至198所（含车间“红专”校分校），入学职工达57632人，占应入学职工数的百分之八十二。文化层次，开始出现中专班与大专班。

1961至1962年间，国家处于经济困难时期，城区郊区工农教育处于停顿状态。其后经济好转，工农教育曾力求恢复。可是接着是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与“文化大革命”，全市所有工、农、市民业余学校，从衰落而至完全停顿。

1971年，遵照国务院有关扫盲的指示，全市进行一次文化普查。接着城区各企事业单位人民公社和郊区各人民公社先后开办政治夜校。城区、郊区人民公社夜校致力于扫盲识字教育，而企事业单位夜校除扫盲识字教育外，开始着重向中、高级文化技术教育发展。1972年，部分厂场响应毛泽东“七·二一”指示，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纷纷创办“七·二一”工人大学。此类大学到1975年已达18所。其中较有规模而较正规化的有区建五公司、柳钢、开关厂等单位办的几所。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新形势的到来，加强了

干部职工、农民文化知识、科学技术的培养，从1979年起，城区干部职工教育在基本扫除文盲基础上，朝着多渠道、多层次、多方式地进一步发展。是年统计，全市有146家厂、场均开展了职工业余教育，参加学习的干部职工共18000余人。有扫盲班、识字班、小学班、中学班、中专班、大专班以及各种技术（电工、制图、机械等）培训班。此外，市总工会与市教育局联合在市内各中学开办职工业余文化夜校，共有19个分校，72个班（含中、小学班、专业班），学员3669人。1981年区建五公司、柳钢、开关厂的“七·二一”工人大学，经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厅批准，国家教育部备案，改称为职工大学。为加强干部职工教育领导，是年成立柳州市职工教育管理委员会。这是一个常设机构，委员会下设有办公室，配备专职干部。1984年，市教育局工农教育科改为成人教育科。市教师进修学校、市电大辅导站经广西自治区政府批准，教育部备案，分别改称为市教育学院、广西电大柳州市分校。是年全市开始成人高等自学考试，有900余人参加。（至1988年增至6千余人）1985年经广西自治区政府批准，国家教育委员会备案，由市总工会主办的柳州市职工大学正式成立。此外成立的大、中专院校还有广西经济管理刊授联合大学柳州分校、市科技进修学院、市第一业余中等专科学校等。从1979年以来，市职工教育向大专层次蓬勃发展，至1985年统计，全市已有党政机关、厂、场、企业，社会力量办的成人大专院校（班）9所（个），成人中专学校（班）12所（个）（不含民主党派及社团办成人专业学校培训班），参加学习学员计有5000余人。

农民教育方面，自1981年郊区经市人民政府全面检查验

收成为脱贫区之后，各乡村在完成扫盲任务基础上，开始办起各级各类农民业余文化学校，转入成人教育提高阶段。至1984上半年统计，全郊区有2611名农民入简易、小学、中学、初级农技、实用文化等班学习。至1986年统计，市一郊（区）两县（柳江、柳城于1984年下半年划入柳州市）的32个乡镇304个村，已有30个乡镇135个村开办了文化技术班362个，参加学习的农民共有1351人。

1987年6月，国务院批转《国家教育委员会关于改革和发展成人教育的决定》，明确了成人教育的任务。柳州市根据《决定》，进一步开展对走上岗位的工人、农民、干部、专业技术人员和其它从业人员的岗位培训和定向培训，在职成人知识更新、扩展、补缺的教育工作有了新的发展。是年，在城区有3100余名技术、管理人员参加中级技术培训，4900余名班组长参加班组长管理知识培训，2700余名中青年干部参加高中以上学历培训，6067人参加高等教育。在两县一郊各乡（镇），进一步开办农民文化技术学校，提高农民科学技术知识。至1988年，乡（镇）办的达34所，村办的达227所。参加学习的共76186人。柳州成人教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 解放后柳州山歌活动概况

张绍伯 干辉云

### 鱼峰山下搭歌台

唱山歌，是柳州壮族人民民间传统文艺活动的一种形式。解放前壮族男女青年多以唱山歌求偶。解放后，在党的“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指引下，柳州山歌发挥了为社会主义服务，为人民服务的作用。它日益繁荣。

1952年《人民日报》报道：国家领导人邓子恢同志在深入农村指导土地改革工作中，组织当地民歌手用唱山歌配合土改宣传，推动了土改工作的开展。柳州文化部门受到很大启发。随即培训本市山歌手，组织山歌队伍，并发动他们用山歌的形式来配合各个时期党的中心工作开展宣传。解放后柳州山歌宣传活动，最初是在各文化馆门前设立宣传阵地进行，如曾在第二文化馆（原在河南驾鹤西路柳江浮桥河南大码头，现市食品公司处）门前，用旧乒乓球桌搭起平台，安上电灯和扩音器，每逢圩日、节日或假日，就请山歌手来登台唱山歌，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和中心工作。听众很多，有的到晚上十点多钟还不肯离去。由于场地小，听众多，影响交通，根据歌手们的意见和听众的要求，即把阵地移到鱼峰山下，龙潭边去。鱼峰山是传说刘三姐唱山歌成仙的地方，山歌手们常到这里对歌，在这里摆设阵地，别具一番风彩。柳州山歌活动的日益发展，对群众影响越来越大，山歌手也

越来越多地加入山歌宣传队伍中来，到1954年，已发展为群众性的山歌演唱活动。活动面亦越来越广，在一次中秋山歌会活动中引来了来宾、象州、河池等县的歌手和听众。柳江、柳城、来宾等县与柳州民间的山歌活动的联系也越来越密切。

### 党的恩情未唱完

在10年“文革”动乱中，柳州山歌活动被冲击、禁锢，连鱼峰山上新塑造的歌仙刘三姐塑像也被拦腰斩断。不能唱山歌，对于山歌手们来说，是非常难过的。不准唱山歌，他们也要唱。许多歌手和山歌爱好者暗中互相串联起来，偷偷地唱。歌手们不得唱歌殊感不平。如老山歌手韦成勋，因唱山歌被批斗，但在批斗后却继续唱起山歌来：

难了难  
我唱山歌遭大难；  
肚中有歌不准唱，  
党的恩情未唱完。

韦成勋被批斗后，越想越不通。他伤心过度，竟将一双老眼气瞎了。直到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韦伯才撑着拐杖从家里一步一步走出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久，韦伯听歌友们说，鱼峰山下、江滨公园里又恢复唱山歌了。他非常高兴，但又半信半疑，一天，他撑着拐杖摸到江滨公园的竹林中细听，是不是真的有人唱山歌。当他真的听到久未听到的歌声时，便独自欢唱起来：

久旱望得春雨来，  
听唱山歌喜开怀，

不准唱歌气瞎眼，  
得唱山歌振才开。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山歌得解放，大大地激发了山歌手们唱歌的积极性，柳州山歌活动更加活跃。

### 山歌迎客心连心

1980年盛大的中秋歌会后几天又是国庆节。这期间，鱼峰山下、龙潭水边开展大规模的对歌活动，听歌者人山人海，气氛热烈。此时，正值全国1980年度秋季物资交流会在柳州市召开，从全国各地来参加交流会的宾客2千余人汇集龙城。宾客们中大多数是初次来到柳州的。但不少人早已听到柳州有个刘三姐唱歌成仙的传奇故事，又得知柳州人常年有对唱山歌习俗的趣闻，因此他们纷纷前往观赏，并慕名瞻仰歌仙刘三姐塑像。但由于语言不通，大会接待处便邀请市文化馆张绍伯同志作向导。于会前一天的下午，我们来到鱼峰山下时，龙潭边的歌声早已此起彼伏。一簇簇人群在围着一对对歌手。龙潭边的凉亭里歌手们正在对歌，听众坐得满满的。当笔者与一部份代表挤进亭子里时，有的听众即站起来让坐。这时，从外地前来对歌，排坐在岸边的两位大苗山女妹仔却唱起了引歌来：

柳州有座鱼峰山，  
山下有个小龙潭，  
山上山下样样有，  
就缺芙蓉配牡丹。

接着就是两位后生仔，兴趣勃勃地伸出头来，对唱道：

昨夜三更得个梦，  
柳江涨水满咚咚，  
上河飘来“刘三姐”，  
弯船来到鲤鱼峰。

此时，岸边那两个妹仔会心一笑。原来他们发现，这两个后生仔正是去年去到苗山寨和她们对过歌的柳州仔哩，于是便得意地唱道：

妹是高山好木材，  
滚下山脚八人抬，  
皇帝用我做门扇，  
大官小吏不敢挨。

这是一首老情歌，怎样答，很辣手。那两个后生仔正在找歌来回敬妹仔时，老山歌手韦成勋却急着帮起腔来：

打把金斧游京街，  
我是鲁班下凡来，  
皇帝请我做门扇，  
任我锯来任我裁。

但是，那两个青年仔很自信，认为那两个妹仔不是对手，因而劝韦伯不用帮腔：

老人家，  
后生唱歌你莫答，  
你是老姜留做种，  
我们子姜争暴芽。

唱到这里，我们向宾客讲解歌词大意。客人听了连声称贊说：“唱得好！唱得好！能找出这样生动形象的东西来作比喻，真有意思！柳州的山歌内容太丰富多彩了。”

那两个后生仔激情难止，又唱道：

那天融水见了妹，  
害我魂魄满天飞；  
请了七个道师佬，  
喊了九天魂不同。

两个妹仔，逗情之余，故意挖苦：

妹在一边哥一边，  
只想唱歌不想连，  
哥若单思魂魄散，  
死到黄泉鬼可怜。

你一唱，我一答，热火朝天。这时，笔者为缓解这逗情的局面，便向山歌手介绍外地来的客人，请歌手们用山歌来欢迎远道而来的宾客。话音刚落，歌手们争先恐后唱起欢迎山歌：

代表贵客到柳州，  
物资交流情交流，  
买得山歌土特产，  
来年发财转回头。

当唱到“转回头”三个字时，宾客们喜笑颜开，特别高兴，连声说道：“柳州山好水好歌更好，我们心连心，不会忘记这优美的山歌之乡！”四川省的几位客人走过来，热情地紧握着老歌手韦成勋的双手，问长问短，问道：“老前辈，你唱多少年山歌了？”韦伯点头微笑，随着以歌回答：“讲唱歌来欢喜多，好比天天面水喝；天天山歌不离嘴，喝水还少歌还多。”宾客们听了，一阵热烈鼓掌称赞说，唱得好，唱得好！客人们与韦伯紧紧地握手，然后与歌手听众们依依

不舍地挥手告别。

### 中秋佳节山歌会

按照壮族民间在中秋节兴唱歌的习俗，根据群众的意见和要求，市文化主管部门定于每年中秋节举行山歌会。从1961年举办首届山歌会以来，坚持每年一届。每年观众一般达万人左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1980年届举办的中秋山歌会最为盛大，影响很广。当时，以鱼峰区为中心，在河南、河北分别搭起了11处山歌台，开展唱歌和对歌活动。歌会延续3天3夜。参加歌会的有来自柳州地区的来宾、象州、金秀、融水、三江以及河池地区的宜山、河池县，桂林地区的阳朔、灵川、临桂等县的壮、汉、苗、瑶、回等民族的歌手90多人以及一批观众。还特邀了融水、三江县的苗、侗族芦笙队到大会踩堂表演联欢，热闹非凡。

### 山歌喜迎专家来

柳州市开展的山歌活动，得到国家领导人和专家的好评和重视支持。在1963年举办中秋山歌会时，国家领导人郭沫若亲临指导。郭老热情洋溢题词留言鼓励。1958年“‘三月三’壮族歌节”活动在柳州举办，中央文化部高占祥部长亲自到鱼峰山下听歌，并赠送题词留念。词曰：“烟春三月三，歌满鱼峰山；龙城飘艺彩，乐舞颂丰年。”中国民间文学研究会副主席贾芝、中国科学院少数民族研究所办公室主任王健、湖南省民研会秘书长陶年、作家贺振扬、湖南省出版社编辑归秀文、中央电视台摄影师金伟良以及上海、广西出版社领导等，都曾前来对柳州市的山歌活动进行视察、

研究和指导。港澳台回国观光团有近百名贵宾也曾到歌会进行联谊观尝。1978年12月，一位日本文学摄影专家，专程来柳研究柳州山歌。

柳州山歌内容丰富，源远流长。在领导和专家的支持指导下，在歌手和群众的共同努力下，不但新歌活动的开展十分活跃，对传统民歌的发掘整理工作亦取得很大成绩，特别是为彩调剧《刘三姐》的创作和演出获得巨大成功作出一定贡献。其中韦成勋、李春华、周子钧、黄月姣等一批优秀的老山歌手曾提供了许多民间流传的刘三姐故事和山歌素材。彩调剧《刘三姐》中的谜子歌、抗婚歌和与秀才对歌的传说故事，不少资料亦由他们提供整出来的。

## 柳州市50年代初期的 社会文化活动见闻

于辉云

柳州市人民文化馆（前身为人民教育馆）于1950年4月建立，是柳州市解放后最先设置的文化事业单位。它的任务是宣传党和政府的政策、法令，提高人民群众的政治、科学文化水平，普及国民教育，积极开展全民社会文化工作。

人民教育馆，是由市军管会于1950年1月3日正式接管柳江县图书馆后建立定名的，馆长董咸熙（原图书馆馆长），副馆长马天禄，下设宣教、文娱、图书阅览和总务四个组。1950年8月，市人民政府根据广西省文教厅有关规定，将原文化馆更名为第一人民文化馆，分别在一区（屏山区）、三区（柳西区）增设第二、第三人民文化馆。市人民政府任命：第一人民文化馆馆长董咸熙、副馆长肖若松（馆址设于公园路24号原人民文化馆处）；第二人民文化馆副馆长肖声和（馆址设于一区河南驾鹤西路原七、八联小校址）；第三人民文化馆副馆长何纪明（馆址位于三区中山西路原柳西镇小学处）。各馆下设宣教、文娱、服务、总务等四组（股），每组（股）设组（股）长一人，组员二至三人。1952年第三文化馆撤销并分别充实第一、第二人民文化馆力量，同年7月，市科学普及站（1951年9月成立）与第二人民文化馆合并。1959年1月成立市群众艺术馆时，第一、第二人民文化馆合并为市

文化馆。

人民文化馆当时的工作主要项目是：1、举办识字班和职工业余文化班；2、开设阅览室、借阅图书、组织读报组、读书会，设置文娛室，推行时事政治教育；3、组织各种文娱团体，并推动群众开展文娱活动；4、有计划的出版黑板报、壁报和举办各种展览；5、开展科普宣传；6、举办各种讲座、有线广播；7、设立服务处，解答群众询问的问题及代写书信等。

人民文化馆在市委宣传部、市府文教科（局）的领导下，配合中心，开展社会文化业务做了大量工作。当时，从事这方面工作的干部，多是中、小学教师。他们通过思想改造，提高认识，热爱党，热爱党的文化事业，不怕苦，不怕累，忘我工作。白天完成本职工作后，晚上利用业余时间到街道组织群众读报、学习，辅导群众排练秧歌舞、腰鼓舞，给职工业余学校上课及开展有线广播宣传。大家边学习，边工作，都争取为人民多作奉献。本市五十年代前期的社文工作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 一、开展成人、职工业余教育

这项工作早在1949年12月已开始筹办，到1950年2月10日办起了成人夜学班，学生达40余人，多是工厂的工人和街道家庭妇女。学习内容有语文（识字）、算术、音乐（唱歌）等课程。同年8月以后，第一文化馆开办了第一职工业余学校。10月4日、5日第二、第三职工业余学校亦相继开学上课。学校设初小班、高小班、初中班共五个班，学生均来自各校辖区的工厂、机关、单位和街道。学生中工人占

70%，家庭妇女占20%，贫民占10%。文化馆抽出干部下街担任夜校扫盲教员。夜校培养了不少街道干部和积极份子，后来的一些街委会主任多是从夜校学习出来的。

## 二、开展街道群众文化服务活动

市第一人民文化馆于1950年10月间，在罗池路、中山中路创建文化服务站，每天或隔日定时派干部前往开放。随后，第二、第三人民文化馆亦在辖区内分别设点建立文化服务站。服务站采取定点与流动相结合方式进行工作，每次开放，除陈列书报杂志阅读外，还为群众免费代写书信（赠送信纸信封）、解答学习中的疑难问题、协助区政府进行失业工人登记、宣传政府政策法令等。

服务工作除下街道外，在馆内还设有服务处，由宣教、服务组（股）的同志负责接待群众，帮助群众办实事。其中办理失业工人登记这项工作，尤其受到群众欢迎。

## 三、开展广播宣传

市人民文化馆为扩大社会文化教育，开展群众文娱活动，丰富群众文化生活，于1950年6月1日庆祝市河北商场（今市总工会大院内东北处）开业之际，从馆内（今市文联正对面）直接拉线入商场架设有线广播，同时还在五角星地磅和柳侯公园门口架设有线广播。三处有线广播每日中午、黄昏同时播出，除转播中央台新闻和文艺节目外，还广播本市简讯、文艺演唱及好人好事。

同年8月以后，市第二人民文化馆在市人民广播电台的协助下，开展转播宣传工作。直至1952年12月16日第二人民

文化馆遭毗邻大火的波及，转播工作才被迫中断。

#### 四、开展文娱宣传和辅导活动

1949年11月底柳州刚解放，街头出现了解放军文工团开展的秧歌舞、腰鼓舞等崭新的文艺形式活动，人民群众争先恐后地围观战士们的精彩表演。嗣后，市人民文化馆为让群众也能推广普及这种新的歌舞，立即办起培训班，由各工厂、单位、街道推荐文艺爱好者报名参加。当时在馆门前或一、三联小（今公园路小学）操场上，每日中午、晚上轮流进行基本动作训练。顿时秧歌的锣鼓声，腰鼓的鼓点声，响遍公园路一带。培训班培养了一批骨干，回基层单位后纷纷组织起秧歌队、腰鼓队，每逢节日、集会、游行，腰鼓、秧歌队锣鼓喧天，响彻龙城。

1951年春节，根据市春节文娱活动筹备会决定，于2月6日在柳侯公园举办首次秧歌、腰鼓舞表演比赛。参赛的有工厂、学校和街道的代表队，共达250余人。这次比赛，对柳州市的文娱活动起到了普及与提高的促进作用。

五十年代初期，经过文化馆进行发动、辅导等工作，全市文艺队伍不断地壮大发展，出现了如市文艺巡回演出队、业余歌舞团、彩调队、粤剧队、桂剧队、合唱队、话剧队和街道组织的谷埠桂剧社、红旗京剧社、前进京剧社、红星京剧社、春秋文场研究社、大众文场研究社、盲艺人演唱队等一批业余文艺队伍，推动了全市社会文化工作的开展，取得良好的成绩。

1953年和1956年，广西省先后举办了第一届和第二届民间文艺观摩会演。柳州市以春秋文场研究社成员为主组成的

代表队，参加了第一届民间观摩文艺会演。演出的节目《西湖借伞》获大会节目奖，韦成勋编唱的《抗美援朝》（山歌）获个人优秀奖，罗纯华、沈善文获演奏个人奖。第二届民间文艺观摩会演我市的《棒咚棒》（民歌）、《八音会》（高沙锣鼓）、《板凳龙》（舞蹈）获大会节目奖；李春华等三位歌手分别获表演奖、发掘奖，何秀山、罗纯华、区秀英、韦建章等7人获演员演奏奖。

柳州解放初期，一些盲艺人在鱼峰山下、江滨公园等地摆摊设点，替人算命、看相、有的盲艺人卖唱，让听众点唱旧戏文，对社会风气影响很不好。为了妥善管理，市文化馆派人下去整顿，组织盲艺人进行政治学习和思想教育，并做文艺演唱的业务辅导，发挥其技艺专长，把他们引导到走正道、从正业的轨道，开展健康的社文活动。1952年，全市组织了盲艺人演唱队，全队共有20余人，下分3个小队。同年3至4月间，有关部门发给盲艺人演唱队外出演唱证明。他们先后到过鹿寨、雒容、柳江、宜山、来宾等县约65个村镇作营业性的演唱，先后演唱达100余场，听众达57000多人次。他们演唱的有文场、渔鼓、桂剧、彩调等文艺形式，节目内容健康，形式生动活泼。演唱活动受到群众的欢迎。因此，一些单位团体和会议，如市土产交流大会等，还邀请他们去表演。演唱活动的正常开展，他们有了收入，解决了生活问题，于是成为群众文化活动的一支队伍。盲艺人演唱队在文化宣传中取得较好的成绩，曾获得省文化局、民政局和市公安局、民政局的表扬。

## 五、开展黑板报文艺演唱宣传活动

黑板报文艺演唱是柳州市创办的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宣传形式之一。它曾闻名区（省）内外。

黑板报最早出现于街头是在1950年6月，经人民文化馆组织创办起来的。后来，工厂、企业、学校和街道等单位也相继办了起来。黑板报对配合党的各项中心工作（如清匪反霸、抗美援朝、镇反、民主改革等）、推动革命和建设的开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当时全市经常出版的黑板报有90多块，最多达到165块。黑板报的兴起，先是由文化馆自办1~2块作为示范，随即发动、组织和辅导各机关、团体及街道出版。文化馆作统一部署，通过文化馆牵头，组成黑板报出版委员会（群众性的），通过这一组织来作具体指导、督促和检查，黑板报出版委员会定期开办黑板报辅导班，讲授、介绍有关业务知识。每期出版的黑板报，除重大新闻稿由文化馆作统一布置外，其余稿件根据各单位的需要各自安排。文化馆常举行黑板报展览比赛，比赛分区（河南、河北）划片集中进行。如1953年5月1日，举办庆祝“五·一”大型黑板报文艺的演唱展览比赛，河北区有56块，河南区有30块黑板报参赛。据回忆，从1955年2月~1956年7月近一年半的时间里，文化馆曾先后举办5次，参加比赛单位的黑板报最多的一次达114块（单位），最少的亦达80块（单位），受教益群众约达30万人次。

黑板报采用集中分片展览演唱和讲解的办法，其特点一是规模宏大、气氛热烈，吸引群众；二是通过演唱、表演，

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三是讲解和演唱板报，不管有无文化的群众，均能看懂、听懂，收效显著。

柳州市解放初期的黑板报，从开始摆着看，发展到文艺演唱；从采用单色粉笔、彩色粉笔书写，提高到采用毛笔、广告颜料色书写；从木黑板发展到白色纸板套色排版的美术形式。经过不断的总结、摸索、改革和创新，逐步提高质量，同时从活动中培养出了一批书画人才和写作人才及文艺骨干，因而越办越好。

## 六、举办各种展览会

在解放后的10年间，文化馆筹办和参与的各种大、中、小型展览约达50余次。其中具有一定规模的展览有：“首届中小学教师画展”（1950年），“伟大的祖国”展览（1951年），“斗争中的越南”图片展览（1952年），“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展览（1954），“庆祝十月革命图片展览”（1951年11月），“列宁生平革命活动展览图片”、“祖国经济建设成就图片展览”（1955年9月），“储蓄图片实物展览”（1957年9月），“节育及防病图片展览”（1958年1月），以及市科学普及站举办的“防御细菌战展览”和“月蚀展览”等共达19次之多。就其规模之大，观众面广要算“伟大祖国”、“总路线”、“斗争中的越南”三大展览。

“伟大祖国”展览于1951年夏、秋之际举行。市文教局派市科普站何光求同志与笔者前往南宁市文化馆联系，将其展出展品大小数百件借回柳州展出，旨在对全市人民进行一次爱国主义教育。由市文教局举办。抽调文化馆、科普站约10名干部及街道数名积极分子进行对展品的修整、制作和补

充。筹备就绪后于人民文化馆一、二楼展出。这是柳州解放后第一次大型展览会，每个展览室均有讲解员讲解。通过机关、单位和街道发动、组织群众前来观展。展出一周，观众达2万余人次。

“总路线”展览。1953年党中央公布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这就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为了宣传这一总路线，于1954年夏由市委宣传部、市文教局、市总工会联合在市工人俱乐部举办大型的“总路线展览”。

市党政领导部门抽人组成展览筹备委员会，统一领导、部署筹备和展出工作。整个展览分为总馆、一馆、二馆、三馆，俱乐部左侧一楼活动室均作为展览室。展出内容含全国、省、市社会主义改造的成就资料。各馆均有图、表、文、物陈列，在总馆陈列了“伟大祖国”大型的沙盘地图模型。从沙盘模型上可以直观到我国是个地大物博、物产丰富的国家，通过彩灯映照，山河景色动人，展览会展示了我国社会改造的光辉前景，大大吸引和鼓舞了观众。展览会展出约15天，每日全天开放。观众总数达10余万人次。

“斗争中的越南”图片展览。这是一次进行国际主义教育的大型图片展览会。由柳州市人民政府主办。从1952年12月29日起至1953年1月4日结束，共展出7天，参观群众达6万余人次。

“斗争中的越南”图片展览内容分为三部份：第一，越南抗战前后概况，图片100余幅；第二，政治、经济及文化情况，图片50幅；第三，越南全国人民开展爱国主义竞赛运

动及参加世界和平运动的资料，图片30余幅。此外还有越南的报纸、图书和杂志资料30多种。

展览会的全部展品，是由越南驻南宁领事馆提供的。领事馆派黎终始为代表及翻译潘炎两同志于1952年12月22日连带展品来柳指导展出。市人民政府于26日组成“斗争中的越南”图片展览会筹备会，会长是魏伯市长。筹备会设组织、设计、宣传、展览、总务和警卫五个组。经过三天的紧张准备后，于同月29日上午在第一人民文化馆预展，由副市长高天骥主持开幕剪彩仪式，各机关领导陪同参观。当天中午正式展出。

展览会门前（公园路）搭建起一座青松彩门，张灯结彩，列队入场参观的观众及门前围观的群众站满公园路地段，盛况空前。

这次展览由文教局抽调本局4人，第一、第二、第三人民文化馆18人，师资训练班51人，簿记人员训练班92人，街道教师和群众34人，其他6人，合计全部工作人员、讲解员205人。在展出期间，全市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各种宣传报导活动。

在筹备和展出中得到越南朋友黎终始同志的具体指导，他向笔者和何光求等同志赠送了越南人民敬爱的领袖胡志明主席照片，作为友谊纪念。

## 试谈刘三姐在柳州

覃桂清

有关歌仙刘三姐的文献，较早见于广东省阳春县春湾镇铜石岩（因岩内有铜矿得名，后改名通真岩）。岩内摩崖刻有“乾化乙亥重阳日刘仙三姐歌台”。乾化乙亥，即残唐五代的后梁乾化五年（公元915年）。

据《阳春县志》（第59页）载：“铜石岩一名通真岩，在城北八十里，思良都岩有石室，高有三、四丈，深有丈余。相传唐时有刘三妹于此飞升，歌台故迹亦在焉。”府志（指《浔州府志》）云：宋真宗咸平初赐太宗御书藏于石室，御书“通真岩”三字，是由于刘三妹在此飞升。据《说文解字》云：“真，仙人变形而登天也。”意思说刘三妹在这里变形登天。清朝宣统元年，阳春县知事郑业崇把“通真岩”三字书写刻在岩口，至今尤存。

阳春县春湾镇民间传说，刘三姐原是广而人，受财主压迫，流浪他乡，两兄妹撑竹排沿江到广东阳春，顺流阳江到春湾，看见此地风景好，和广西差不多，找来找去，找得铜石岩安居。铜石岩从隋朝开始建庙宇，有和尚主持，到现在已有1千3百多年历史。原写“铜石古迹”在头门，北宋真宗皇帝题“通真岩”三字后，第二层门叫通真岩。原来上面有庙宇，亭台楼阁，由山脚有几百级石阶铺到庙门（可惜后来庙宇和石阶场被拆毁）。

春湾民间还传说，通真岩内刘三姐歌台的石头很光滑。

(笔者亲眼看到，歌台石头的确很光滑。)据说是刘三姐和歌伴们坐滑的。歌台旁边有织麻篮，有个麻碗滴水浸麻，麻篮上写“清道光年才没水，以前常年有水”。麻碗边写有“道光失火”。传说刘三姐是仙人，过去通真岩有她的塑像，用木雕加油彩，如真人一样，室内有纱罗帐盖住三姐神像。

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九十八《三妹山》条：“刘三妹，春州（即广东省阳春县）人，坐于岩之上，因名。”

（据清道光二十九年即1849年慎盈斋刻本）。1990年，阳春县文化馆李文光的《阳春有无刘三妹》（载《岭南民俗》1990年第四、五期合刊）中说，在民间文学三套集成普查中发现，离阳春县城约10里的新云和扶民村交界处马安山坳过三个山头，就是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中所说的“三妹山”。

从以上所引唐末、北宋到南宋时期有关刘三姐的文献资料，足以证实在我国历史上曾有刘三姐其人。

刘三姐在柳州的文獻和传说，首先见于《宜山县志》：“刘三妹，相传唐时下枧村壮女，性爱唱歌。其兄恶之，与登近河崖砍柴；三妹身在崖外，手攀一藤，其兄将藤砍断，三妹落水，流至梧州，州民捞起立庙祀之，号为龙母，甚灵验。”妹，壮语音，即妹。文中虽未讲到柳州，而宜山在柳州之上，梧州在柳州之下，宜山龙江流入柳江，经过柳州，后到梧州，这就明显地说出刘三姐流经柳州这一事实。当地流传的民间传说可进一步证实。

1958年邓丙兴口述，邓建业记录的《刘三姐传说》，说刘三姐在罗城唱歌气死财主仔，被迫搬到宜山中枧村住后，

家里怕唱山歌惹祸，不让她上山，留在家挑水洗衣。广东台山三个书生撑三船歌书来和三姐对唱。唱了三天三夜，两个书生答不出，气得跳下河。剩下一个陶书生，后驶到柳州，跟三姐进鲤鱼岩，三姐在岩里唱歌成佛。

叙事歌《歌仙刘三姐》，叙唱三姐世居罗城县古立村，三代务农。三姐唱歌到宜山下枧村，与哥哥砍柴度日，财主挑唆其兄制止三姐唱歌，三姐不从，哥哥铺床拦门睡，三姐半夜溜出去，哥哥气愤，砍藤害三姐，三姐漂流到柳州。哥到鱼峰山找三姐，三姐成仙升天。此长歌由宜山县仫佬族彩调老艺人吴老年唱，罗茂坤、肖舟整理，《广西壮族文学资料》1960年编印。

笔者于1986年访问了在柳州黄村的78岁老歌手谭三，据说，刘三姐的哥哥怕她唱歌惹祸，千方百计阻拦，三姐仍不听从。后来，当三姐去砍柴，坐在下枧河边悬崖的葡萄藤上唱歌时，哥哥把藤砍断，刘三姐和断藤一起掉下河里。这时下枧河正涨大水，山洪把刘三姐冲走了，葡萄藤卷成一个大圈圈，托住昏迷不醒的三姐，从下枧河流下龙江，再从龙江漂流到柳江。

一位老渔翁在柳江上撒网，突然发觉网很沉，以为得了大鱼，谁知用力扳起一看，网里有一具葡萄藤托住的女尸。老渔翁感到不吉利，忙把尸体放进河里，然后到上游去扳网。说也奇怪，再扳起网时，发现那女尸又在网里，老渔翁火了，再到滩头上去，谁知在滩头扳网，捞起的还是那具葡萄藤托住的女尸。老渔翁心想，俗话说，好事不过三，这具女尸，居然逆流而上，连连三次进网，其中必有缘故。于是便把女尸捧上河岸，果然发觉女尸并未僵硬，好像还有一丝

气，便精心救护，两袋烟久，昏迷的姑娘就慢慢苏醒。经盘问，原来这落难姑娘，就是久闻大名的刘三姐，真是三生有幸。三姐感激老渔翁救命之恩，拜为义父。渔翁扶起三姐，带回食潭村家居住。从此父女相依为命，老渔翁打鱼，三姐织麻补网。刘三姐白天在鱼峰山下小龙潭边和姐妹们织麻补网唱山歌，晚上便到鲤鱼岩里和后生们对歌。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广西象县民俗学者刘策奇（他是象县第一个共产党员，在大革命失败时已成为烈士），他曾在《歌谣》周刊上发表一则关于刘三姐的传说，该文前部，写述柳州立鱼峰之情景，下部即介绍象县所流传之三姐故事，转述如下：

“传闻刘三姐，系广东潮梅人，有唱歌天才，走遍两粤，不获一对手。后至立鱼峰，遇一农夫，与之对唱，一直唱过三年又三月，三姐似不支，心中一急，呆然化为石像。农夫瞧瞧，叹息一声，悠然逝去”（载《歌谣》周刊，第82期，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

据柳州彩调剧《刘三姐》剧作者曾昭文同志说，在清朝时，柳州百姓为纪念歌仙，曾在立鱼峰半山上立有刘三姐神像，后来在一次火灾中神像被烧毁。民国初年，又请湖南衡阳的一位师傅，再用石雕刻刘三姐神像，安置在鲤鱼岩里，神像旁边还塑一个麻篮。笔者1946年在柳州高中读书时，逛立鱼峰时曾亲眼看过鲤鱼岩中的刘三姐神像及麻篮，可惜此神像于五十年代被毁了。

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名誉主席钟敬文教授于1928年发表的《几则关于刘三妹故事材料》的②“明允题刘三姐遗像诗”说“本年（指1928年。覃注）学生杂志上，载有明允君题

刘三姐遗像（在鲤鱼岩后山）诗云：“艳事说三姐，风流百代香，娇名惊牧竖，听价是歌王，丰度翩然活，遗腔唱未忘。至今岩外鸟，啼叫仿姑娘。”（注云：刘三姐，为黔桂古代善歌者，其风流轶事，至今传述未衰，乡俗最流行的山歌，有“唱歌好，唱歌得要又得玩，不信你看刘三姐，唱歌得坐鲤鱼岩”之句，歆慕醉心，可谓至矣。）陆次云峒谿纤志余载此事甚详，唯以刘三姐为刘三妹，名小异。”

以上的文献和民间传说，都说刘三姐漂流到柳州后，在立鱼峰（至今叫鱼峰山）唱歌成仙，骑鱼上青天。至于柳州在什么时候开始有刘三姐传说，以上材料没有说明。《宜山县志》虽说到刘三姐是唐时下枧村壮女，但并未说唐时刘三姐到柳州，再从唐朝时柳州历史，以及柳宗元任柳州刺史时游历山水，题咏柳州的诗文中，都没有提到刘三姐及其传说。宋范成大著的《桂海虞衡志》“志岩洞”载：“白龙洞，有南溪半地半山中。龛有大石屋，由屋右壁入洞，行半途，有小石室。刘仙岩，在白龙洞之阳，仙人刘志远所居也。华景洞，高广为十间屋，洞亦然。水月洞，在宜山之麓，其半枕江……”宜山附近有名的岩洞都提到了，连仙人刘志远所住的刘仙岩也记下了，而白龙洞中的刘三姐神像却只字未提。距白龙洞七、八里的下枧村，是刘三姐的家乡，也没有带一笔。

该书紧接记柳州立鱼峰：“……立鱼峰，在西山后，雄伟高峻如植立一鱼。余峰甚多，皆苍石刻削。”这里对立鱼峰鲤鱼岩有刘三姐塑像和刘三姐骑鱼上天成歌仙的事也只字未提。这有两种可能，一是由于作者忽略了，另一种是当时在宜山、柳州还未有刘三姐故事流传。

到底什么时候柳州开始有刘三姐传说流传呢？我个人不成熟的看法认为是在明朝时期，其依据有如下几点：

（1）根据我目前掌握的文献和民间传说，尚未发现唐宋时代刘三姐到柳州活动的文字记载和民间传说。

（2）从地理条件和民间传说流行情况看，宜山、柳州、梧州同是珠江中上游，与龙江、柳江、西江相连，因而有关刘三姐传说也很自然的形成一组相关连的故事，如说刘三姐被割藤落下枧河，流入龙江，再流下柳江，后漂流至梧州，被州民拂起立庙祀之，号为龙母。

宜山、柳州、梧州三地既然由于同饮一江水而形成刘三姐传说的一组故事群，这些刘三姐传说何时流传，可以从这组传说去寻找。据《苍梧县志》载：“传说刘三娘（即刘三姐。覃注）是须罗乡人，生于明末上巳日。”从而得知苍梧（今梧州）的刘三姐是明朝末年出生，因为她的传说也就在明朝才流传的，因而与梧州同一组故事群的柳州，有关刘三姐传说也很可能是明朝时候才流传的。这个推测不知当否，请专家和广大读者指正。

## 忆壮族老山歌手韦成勋

张绍伯 于辉云

壮族老山歌手韦成勋，马平县（今柳州市）人，生于公元1898年，卒于1983年，享年85岁。他家境贫寒，7岁时就帮地主看牛糊口。他从小就有一股“昂气”，同辈惯称他“韦志昂”，晚辈称他“老昂叔”。

韦成勋在郊区下白沙村帮一地主家看牛，与看牛娃仔为伍唱山歌，就数他的山歌来得快，且还能随口对答。他常唱山歌反地主。有一年，在隆冬季节的一天下午，他在岭坡上放牛，忽遇一场狂风暴雨，牛群惊跑四散，直到傍晚才把牛群赶回家。小韦又冷又饿，刚踏进地主家门槛，地主便叫他前来服侍。老地主知道他爱唱山歌，怀恨在心，便故作阴阳怪气地用山歌来讥弄凌辱他，唱道：

看牛娃仔嘴尖尖，  
点个火柴爷吃烟；  
听话给你钱半个，  
不听给你两脚尖。

小韦一听，又气又急，不但不点烟，还当即以歌还击，唱道：

看牛娃仔嘴是尖，  
嘴唱山歌出火烟；  
那个敢打唱歌仔，  
烧你魂落百把年。

歌声刚停，那地主的猫胡子一翘，拎起一根石山柴就往他头上身上抽打。小韦更气愤，他明知地主恨他唱山歌，于是偏要冲着地主唱道：

廊檐滴水流成河，  
穷人眼泪就是歌；  
穷人受苦歌满肚，  
那个敢禁我唱歌。

韦成勋不愿忍受地主的欺凌，那年，一气之下就离开了地主家门，回去开荒种菜。白天勤快劳动，晚上空闲就邀请邻近的歌友在一起唱山歌，诉穷人的苦情，唱旧社会的不平。

柳州解放后，韦成勋一家得了翻身。他热爱共产党，热爱毛主席，热爱新社会，积极参加社会活动。解放初他就主动到市文化馆要求参加宣传工作。1951年郊区进行清匪反霸和土地改革运动时，市文艺工作团为配合土改宣传，编了一出山歌剧《门板》，请韦成勋到团里教唱山歌。他非常高兴，说：“过去在旧社会，我唱山歌被地主打，今天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鼓励我们唱山歌，我一定尽我的能力教。”说罢很高兴地随口唱道：

讲唱山歌我高兴，  
我爱唱歌表心情；  
今日翻身得解放，  
党是救命大恩人。

从此，不论在鱼峰山上、柳江河边还是在街道、舞台上都有他歌唱共产党、歌唱新社会的歌声：

太阳出来闪金光，

翻身全靠共产党，  
柳江河水流不尽，  
党的恩情长又长。

太阳出来红彤彤，  
照得祖国遍地红；  
党的恩情唱不尽，  
人民当了主人翁。

1952年2月底，54岁的韦成功获得参加市文艺代表队到广西省第一届民间文艺汇演大会去演出。他上台随编随唱了抗美援朝山歌14首，受到大会的好评，荣获个人演唱优秀奖。其中2首是：

中朝本是兄弟邦，  
只隔一条鸭绿江；  
你帮我打日本鬼，  
我帮你打美国狼。

雄赳起来气昂昂，  
抗美援朝理应当；  
抗美赶走美国鬼，  
援朝就是保家乡。

他用自己的山歌，进行各方面的宣传。如宣传拥军优属：

拥军优属要认真，  
爱国公约要执行；  
青年参军齐踊跃，

## 消灭敌人保翻身。

韦成勋积极开展山歌活动，努力从事宣传工作获得很好的成绩。早在1950年他就首批参加了市音乐家协会为会员。

韦成勋文化水平不高，但只要把党的方针政策讲解给他听，他思路一开，就能马上用山歌唱出来。当时，市文化馆把他在配合中心工作宣传唱的山歌记录下来，印发到街道和机关单位，供出黑板报用稿。他的山歌内容与人民群众生活有密切联系，又通俗易懂，如：

寒冬来了多晴天，  
风高物燥火易燃，  
发生火灾损失大，  
个个防火保安全。

他进行计划生育宣传，唱的是：

计划生育大事情，  
人民大众记在心，  
这条大事做好了，  
国强民富家更兴。

这些山歌，群众喜闻乐见，不少单位和街道的黑板报都采用选登。有一天他走过街上，见到有人在黑板报前念他的山歌，他很高兴走过去听，后来应邀唱起山歌来。这一唱，引来不少听众。这一场面，给文化馆的同志看到后，受到很大启发。过去黑板报文章长、干巴巴、观众少、收获不大，之后，文化馆进行了研究，总结经验教训，加强了对黑板报工作的辅导，使全市的黑板报有很大改进。不但写短文，而且也多采用山歌、快板等文艺形式，进而配上演唱，结合讲解。这样做，非常生动活泼，观众空前增多，效果很好。这

## 生活书店柳州分店的建立经过

苏尹铨

1938年元月，柳州华强书局陈经理到广州向生活书店采购图书杂志时，曾与我们讲到，柳州的同业全部是经营古籍和文具，没有经销新书和进步的书刊，学生军、青年、及其他人士迫切盼望阅读进步的书刊却很难买到。为此，陈经理希望我们能早日建立生活书店柳州分店，使广大读者能在这里买到生活书店出版的马列著作和抗日救亡的各种进步读物，以适应抗日形势的需要。同时，他说在柳州建立分店是有条件的，主要是政治环境比其他地方较好。不久，生活书店总店作了决定，派人到柳州筹备开设分店工作。

当时，广州经常遭到敌机轰炸，形势危急，广州当局通告，要求市民早日疏散到安全的地方去。遵照生活书店徐伯昕总经理指示，我们广州生活书店全体同仁，于1938年8月

---

一消息传开后，受到上级的重视，中南五省份派了有关人员到柳参观。这项工作于1956年获得中央文化部的奖励。

一些人喊韦老昂“老昂叔”，而大多数人却称他韦伯。大家很尊敬他。因为他不但是知名的山歌手，积极开展山歌活动，而且特别热心参加社会各项宣传。在工作中不怕劳累，不讲报酬，从不要什么生活补贴。晚上工作到深夜也不领宵夜费，他的精神和风格受到群众的赞扬。韦成勋一生为柳州山歌宣传作出贡献，人民怀念他。

中旬，有计划有步骤分批撤退到广西柳州、南宁两地，分别进行筹备开设分店工作。我和苏锡麟等一行，携带图书行李，从水路辗转一个月之久才安全抵达柳州。当时我们的经济十分困难，但全体同仁为了完成建立柳州分店的任务，团结合作，发扬艰苦奋斗精神，且得到有关部门的支持，终于在市中心繁华区的培新路与兴仁巷分别租到适当的铺面、仓库和宿舍各一间，随即办理营业执照，作些简单实用的装饰，购制了书架、日常用具，挂上了招牌，这样，1938年9月10日，生活书店柳州分店正式成立了。

柳州生活书店设有门市、批发、邮购、货仓等机构。全店有5名工作人员。经营范围除本版书刊外，还兼销“读书”、“新知”、“开明”等版的进步图书杂志。由于马、恩、列、斯著作和抗日救亡进步读物品种多，加上开架陈列，十分方便广大顾客翻阅选购。我们发扬邹韬奋先生倡导的“竭诚为读者服务”的精神，对顾客热情接洽，礼貌待人，态度和蔼，服务周到。开业当天，各界人士纷纷前来观看、购书，兴高采烈，门庭若市，很是热闹。此后，零售、批发营业额不断增加，有些书刊供不应求，如《战时读本》、《救亡手册》、《大众哲学》、《群众》、《全民抗战》、《世界知识》等很受读者青睐。

1938年12月，老作家胡愈之、茅盾、黄新波、秦似赴桂林途经柳州（他们都是在从事抗日救亡宣传和革命文学活动），曾在国民党柳江县政府礼堂召开抗战文学座谈会、报告会，深受学校师生、学生军、青年以及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胡愈之亲切会见本店全体工作人员，询问工作情况，鼓励我们要认真做好书刊发行工作，发扬生活书店竭诚为读者

## 海外同胞卢玉衡题诗“鬼子坳”忆奇袭

覃帆

1986年10月10日，思乡情切的原国民党陆军第46军175师525团团长卢玉衡先生从香港乘飞机回到桂林，12日乘车到柳州。卢先生高兴之余，于13日和柳州市有关部门人员乘车到“鬼子坳”（即柳江县百子坳）重游战地。卢先生即兴吟诗一首《战地重游有感》：

蹒跚登车战地游，万千感慨话从头。  
当年在此歼敌寇，满岭遗尸鬼哭愁。  
火化风烟避逐臭，油迹隐约日中留。  
可歌可泣难枚举，俯首斜阳笔亦收。  
一声汽笛回头转，灯火辉煌万阁楼。

卢先生深念故土，以诗抒怀，只因他在“鬼子坳”有过

---

服务的优良传统，把柳州分店办得更好，作出优异成绩，争当优秀的图书发行工作者。后来在离培新路不远的庆云路，先后新建立同业的书店，有商务印书馆、上海杂志社、北新书局等5家。大家都是从事共同的业务，彼此密切联系，团结合作，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柳州生活书店建立后，做了大量工作，发行大量进步书刊，对于加强抗日宣传，推动抗日救亡和民主运动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一段对日作战的难忘经历。

在柳江县里高圩东面3.5公里处的一段劈山公路上，有一弯约1公里呈“之”形的山坳叫百子坳。山坳两旁悬崖陡壁，下劈4公尺多深，仰望只见一线天，地势十分险要。

1945年6月15日，日本侵略军第3师团后卫第六联队数千人集结于忻城大塘圩，准备往柳州方向撤退。百子坳是必经之路。里高乡与忻城县的民军自卫队及里高圩附近群众配合国民党陆军第46军525团在百子坳准备伏击。修好工事后便分头埋伏在公路两侧的半山腰上，山谷和公路也四面摆阵，以构成密集火网布置。

端午之夜，大地一片漆黑，伸手不见五指，四周万籁无声。埋伏在半山腰的525团和民军官兵个个紧握手中枪，等待着敌军的到来。

夜11时左右，日军一排排骑兵和步兵进入了埋伏圈。这时，伏军都盼望卢玉衡团长下达攻击命令。等着，等着，信号弹仍未升上天空。

突然，二营一名士兵咳了一声，一名日军指挥官立即跳下马来，叽哩喳喳叫了几声，接着公路上的日军也随声趴倒在地。这一指挥官未发现什么动静，便爬上公路右侧的一块大石头上，四处探听，仍没发现什么声息，于是便放心大胆拉起尿来。谁知，这尿不偏不倚，正淋在埋伏草丛中的525团一位班长头上。他实在忍不住了，便“叭叭”地放了两枪，敌指挥官应声而倒，滚下了公路。

目标暴露了，卢团长立即发出了信号，红绿各两枚信号弹飞向夜空，战斗打响了，枪声、炮声、手榴弹爆炸声与山谷回声响成一片。敌军人叫马嘶，胡乱放枪开炮，乱碰乱

撞，纷纷倒地。战斗直打到第二天天快亮时，日军尸体几乎摆满了这段公路。

这时525团的一部份撤往深山，另部份转移到岩洞里去。第二天出来游击时，日军却以火力掩护，把尸体拉到山谷两头火化。那天只见两边两堆烈火熊熊，“噼噼啪啪”地焚烧了一整天。

战斗结束，敌已溃不成军，残部分成几股，沿着小道狼狈逃往柳州方向。

抗日胜利后，为纪念在这山坳取得辉煌的胜利，遂把百子坳改为“鬼子坳”，并建起了一座纪念亭。亭高约5米，宽约20平方米，呈六角轿顶，亭前建一牌坊形门，中门上书“鬼子坳”三个大字（卢玉衡题），左右两小门分书“精忠”、“报国”四字，门联为“百子亿人泪，千军万马魂”（覃连芳题）。另一付对联为“百子坳前清血债，蓬莱岛上吊孤魂”（卢玉衡题）。碑立亭中，高1.65米，宽80公分，碑文分两部分，分别为：《鬼子坳序》、《述柳歼敌战斗经过》。抄录如下：

## 陆军第四十六军一七五师五二五团

### 鬼子坳序

此坳原名百子，今日庆得千孙，柳忻疆域，骤起抗日。本团乙酉端午，截击倭寇三千。出奇制胜，以寡敌众，前仆后继，激战三日，杀敌千人，战马二百。遗尸遍野，血流成河。火化瘴气盈空，数月犹腥。敌寇败北，特立碑以志念。

## 迁柳歼敌战斗经过

溯自日寇侵华，迄今八载。虽告□□□□（字迹不清）。去秋，行将崩溃，犹图孤注一掷，重窜桂郴。南疆军民，奉上之命，本团通令歼敌于迁柳之间。众将士浴血歼敌战果：

五月二十九日，团开始向石陵、迁江二地进发，跟踪追击，争夺激战，凡四昼夜。官兵用命，奋力争取战斗时机，绕石陵，守迁江，北经红河，扫荡残敌，歼灭日寇四百，战马三十。我官兵阵亡四十八、伤七十三。

团扫清迁敌后，即向柳州急进，抵思练，侦知由迁江、宜山败退之敌约三千，战车四辆，野炮四门，纠集大塘附近，均为战败残敌。决以全力绕道北荡，进出里高、三都沿线。六月十六日，于门头、百子坳、牛屎坳三段伏击围敌三日，反复袭击，歼敌二百余，俘马若干，战利品无数。祭则向英灵，我军阵亡官九，士兵二十。

我军阵亡名单（因字小刻浅，年久磨光无迹）。

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十二月立

此材料据1990年《黄埔》十二期蒙献明撰写《夜战百子坳》一文和笔者采集的资料综合整理。

# 抗日烽火中的柳州广西学生军

罗怡林

我看了柳州电视台和广西电视台连续播放的《龙城恋》，其中曾出现两张广西学生军在华中抗日战场上的照片，一张是第一队全体同学在抗日前线上的合影，背景是广西学生军的军徽——铁拳周围闪出火红的血花。那是《广西学生军军歌》中“我们是铁打的一群，在伟大的时代里负起伟大的使命……”歌词的象征。所以人们称广西学生军为“铁打的一群”或“铁群”。另一张照片是我们26位同学于52年前在湖北襄樊隆中汉诸葛丞相武侯祠留影的，背景是武侯祠的大门，右边写着“杀日寇”，左边写着“拿汉奸”共6个大字。是赵森禄同学写的。这是准备束装待发，参加随枣会战前的留影。另外，在柳州电视台播放的《柳江巨湖》中也出现过一张我们在武侯祠留影的照片。半个世纪过去了，广西人民没有忘记喋血抗战的广西学生军。广西学生军中有50多位柳州人，他们也曾参加过北上抗日。

半个世纪前照的这两张照片，今天出现在家乡的电视荧屏上，我看后倍感亲切，感慨万千。当年北上抗日的柳州50多位同学，有的光荣牺牲了，有的病逝了，有的尚在外地工作。在柳州尚健在的只有3人。但在两张照片中只有我1人了。

看着这两张照片，使我回忆起50多年前在战火纷飞抗日战场上的往事。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8月13日淞沪抗战爆发，我国对日本侵略军开展全面抗战。9月，国民党军委将精锐的第7军和第31军数万将士开赴淞沪战场对日作战。同时，广西当局在邕、桂、柳、梧四市招考男女青年学生，以组成广西学生军，报考的有三、四千人，只录取了约300人，都是已毕业和在校的男女青年学生。其中有国外归来的华侨如李荣康；有同胞姐妹如蒋中琳和蒋定榕、范霞和范琼、李剑芳和李剑霞；有新婚伉俪如李奇斗和吕菊芬，还有未达到入伍年龄而坚决要求入伍的如王中琦和徐树鸾……广西大学学生40多人和国防艺术社队员20多人也在其中。在学生军中，大学生占20%，高中生占30%，初中生占50%，大致男女各占一半。我们柳州市获录取的学生有50多人，绝大多数是广西省立柳州中学（今柳州高中）的学生，大家都具有好儿女当报国仇的志气，抱着宁死不屈、不怕牺牲的决心，因而雄赳赳，气昂昂地奔赴抗日战场。

十一月初一，全省学生军在桂林李家村集中训练，称为广西学生军大队，大队长蒋元，大队附黄芝刚，政治指导员苏锦无，戏剧指导员万籁天，音乐教官刘延年，还设有副官、军需、文书、司号、炊事、运输兵等人员配备。大队下属男女各一个中队，各有队长和队附。

军事训练的内容是学习防空、防奸知识，训练射击技能及急行军、强行军、夜行军、野外演习等。女学生军还加学战地救护常识。

政治训练的主要内容是如何开展宣传、动员、组织、训

练群众参加抗日。著名的社会活动家邹韬奋、钱俊瑞、金仲华、张仲实、陈天柱、沈兹九、杨秀英、沈绿漪等都曾到李家村来看望我们并向我们作报告。他们语重心长地讲解全民抗战和抗战必胜的道理，批判汉奸卖国贼的亡国论调，提高了我们对抗战的认识，增强了必胜的信心。

学生军分组开展各种宣传活动，有文字宣传组、口头宣传组、漫画组、歌咏队、演剧队等。军部根据各人的特长或爱好，分配到各组、队去学习和工作。广西学生军是一支半武装的部队，每班配备有德造自来得手枪几支。既是抗日的战斗队，又是抗日的政治工作队。

## 二

1937年12月12日，省各界抗敌后援会如妇女抗敌后援会、学生抗敌后援会和国防艺术社等组织，在省府礼堂联合举行欢送广西学生军出发大会，到会的还有桂林市中等学校学生4000多人。李宗仁夫人郭德洁为大会主席。会上，她先致欢送词，接着夏威、黄旭初讲话，随后各界人士向学生军献上“出奇制胜”、“杀敌锄奸”、“为民先锋”锦旗三面，并赠李文创作词，陆华柏谱曲的《广西学生军军歌》一首。

12月14日，广西学生军出发了。清晨，在桂林女中门前，我们与亲属、同学、挚友依依话别，随即到桂林公共体育场，参加有2万多名群众的欢送仪式，然后向北门出发。从市中心直到北门外乌金铺的“十里长亭”，马路两旁都站有欢送的人群。机关、学校、商店、居民住宅都悬旗致敬。战歌声、口号声、乐曲声、鞭炮声汇成一首抗日救亡的战斗交

响曲，响彻云宵。

离开桂林前，广西学生军发出了《告广西同胞书》、《告别广西同学书》、《告全国同胞书》，表达了誓死抗战，驱逐日本侵略军的决心和信心。

12月13日南京沦陷。14日，我们出征北上，途经灵川、全州、零陵、祁阳、衡阳等地。路过零陵这个小县城时，竟有几万群众夹道迎送，老百姓给我们赠送锦旗，燃放鞭炮为我们壮行。很多群众激动得流下热泪。我们每经一县、市，不顾疲劳，就按原编的组、队开展宣传活动，以增强群众抗战到底，抗战必胜的信心。

12月28日，我们到达武汉，驻扎在武昌蛇山公园的“抱冰堂”中。这里已是千里冰封严寒之地，而我们仍然仅是内穿毛绒衣、外穿单军衣。大家握紧拳头，冒着严寒，徒步前进。

当时平、津、京、沪已经沦陷，国民党中央政府各部门均已迁来武汉。武汉已成为全国政治、文化的中心，武汉三镇到处是抗战的大标语：“地无分东西南北，人无分男女老幼，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抗战到底！”“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

我们一到武汉便到汉口、汉阳、武昌开展宣传活动。在街头演讲抗战到底、胜利一定属于我们的道理，还唱救亡歌曲、出墙报、演话剧、贴漫画……汇入了抗日救亡战斗的洪流。

郭沫若同志代表军委会政治部向学生军献旗并演讲，当他称我们为“勇士”时，当即激起同学们热烈的掌声。冯玉祥将军当时不在武汉，却特意令人赠给学生军每人一盒礼

饼，盒上面写着“赠给广西来的民族革命青年”等字样，表达了冯将军爱护关怀和鼓励我们的一片心意。

### 三

当时是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时期，团结抗战气氛浓厚热烈。白崇禧请了国共两党重要人物和社会名流对学生军作报告。请来做报告的有周恩来、叶剑英、邓颖超、王若飞、王明、博古、聂鹤亭、贺衷寒、沈钧儒、沙千里、史良、王造时、杜重远、邓初民、马哲民等。他们演讲了10多天，地点都是在抱冰堂门前，内容是《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军民的政治工作》、《游击战术》、《如何宣传、组织、发动群众全民抗战》……周恩来和邓颖超同志亲自到抱冰堂看望学生军，问寒问暖，还嘱咐大、中队领导要多关心我们这些到前线来工作的男女学生军。白崇禧将军也给我们作了一次报告。

在武汉，我们参加过几次抗敌救亡活动和慰劳重伤员活动。一次是参加全国抗敌后援总会和武汉分会组织的20多万群众举行声势浩大的“保卫大武汉”抗敌示威大游行。我们几十位全副武装的广西学生军走在队伍前面，著名的抑敌救亡爱国人士沈钧儒、邹韬奋、史良、王造时、杜重远、钱俊瑞、张志和、田汉、王立明等走在学生军后面。浩浩荡荡的游行示威大军沿着大街前进，高呼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高唱着《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救亡进行曲》、《自卫歌》、《生死已到最后关头》等救亡歌曲。成千上万的群众夹道呼应，口号声、军歌声、军乐声、锣鼓声、鞭炮声汇成一片。

另一次是参加武汉人民献金抗敌活动。郭沫若同志发起武汉人民献金抗敌活动，我们学生军男女同学全部出动，各组队采取各种宣传形式，宣传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抗战到底的重大意义。我画了一张宣传画，画面是千百只手将金银首饰、光洋、法币投入献金箱，箱下的洞口就化作子弹、炮弹射向狼狈逃窜的日本侵略军。我们分散在各大街要道口的献金台上，接待来献金的群众并造册登记。捐献的人很多，忙得我们连饭都顾不上吃。献金的人员中有献金戒指、金耳环的，还有献金手镯、银手镯的，也有献光洋和法币的，有的连收据也不要就走了。连那些每日三餐温饱也不顾上的蹬三轮车和拉黄包车的穷人们也献上几元光洋或法币。郭沫若同志在一次演讲中说：这次献金活动取得巨大的成绩，出我们意料之外，比我们原估计的捐数多了几倍。这有力地说明中国人民抗战到底的决心。

再一次是慰劳八桂子弟兵重伤员。我们来到武昌第八重伤医院慰劳从淞沪战场上负重伤下来的八桂子弟兵，他们见到我们是从家乡来，又将赴前线，非常高兴。他们忘了伤痛，纷纷询问家乡和前线的情况，我们都和他们一一地畅谈。他们虽然身负重伤，但却关心着抗战的前途和怀念家乡父老。

在这医院里我遇见了柳州中学的女同学陈朝惠，她是这里的女护士。据她说，她和几位柳中同学也是自己申请北上抗日的，有的已分配到前线去了。

1938年春节后不久，我们从汉口出发，经信阳、潢川、商城、六安、寿县，到达最前线的四家庵。每经一地，我们都按原编的组、队开展宣传活动。

田家庵是第31军的驻地，隔河对岸就是日军占领的阵地。我们头一天到达，就住在街上，第二天，河对岸的日本兵就向田家庵发射了几十发炮弹，炸毁很多房屋。我们同学有的进了掩蔽部，有的跑到野外，幸好无一受伤。陈守善同学风趣地说：“鬼子的消息真灵通呀，我们一到，就放礼炮欢迎，还超过21响呢，真是最高礼遇了！”我们连接几天下到连队去慰问我们八桂的子弟兵。官兵们见到我们来到战壕里，象见到自己亲人一样欢喜，都热烈鼓掌欢迎，大家问起家乡的情况，还说，看到你们学生哥和女妹仔都来前线打日本鬼子了，我们抗日的决心更大，不打败鬼子誓不回广西！

不久，我们南下去合肥，沿途慰问驻防这一线的广西子弟兵第7军。到合肥后奉令将大队分为两个队：第1队到六安，归第11集团军李品仙部指挥；第2队留在合肥，归第21集团军廖磊部指挥。我是分在第一队的，以后再也没有和二队同学见面了。柳州的50多位同学也在这时分开了。

第一队到了六安，又分成四个组到阜阳、立煌、霍山等县去做宣传动员组织群众抗日的工作。我是到霍山去的。我们这组没有一个是国防剧社的队员，二三十个同学也没有一个是上过舞台演戏的。但为了宣传需要，同学们集体导演、排练抗日话剧《东北的一角》，同学们硬要我饰日本军官松本，排练了两三天，就正式演出了。当演到松本调戏菱儿，双手抱住菱儿要亲吻侮辱并说“花姑娘太大的好”的时候，后台冲出许多男女“农民”用棍棒打“松本”，将我捆绑跪在地上。台下成千的观众高声呼喊：“打死他！打死他！”全幕闭幕快才收场。不然，我挨更多的棍棒。

#### 四

几经转战，我们经河南到达鄂东的浠水，这里的街道房屋被敌机炸得不成样子，我们只好驻在郊外。这时正是保卫大武汉的外围战，战况激烈，听说黄梅、广济之战我军打了胜仗，我们挺高兴。谁知队长通知我：“你立即赶到广济槽河镇去通知那几位同学，明天清晨就撤回浠水来，还说，如果我们走了，就尽快赶到黄陂去集中。”这时已近中午，走得再快，也要半夜才到。人急智生，我走到两山之间的一座陡坡时，恰好有一辆空的军车开来，趁它爬坡时我就爬上车去，司机见我背着手枪，又挂着手榴弹，不敢喊我下车。这样，我就搭了“霸王车”到了槽河镇。正好第二队的陈守善（柳州人）几位同学也在这里工作，他们也是奉命撤回安徽的。第二天清晨，我们就分别赶路，回到浠水时，队部已经开走了，我们急忙追赶，终于追上队部。到达黄陂，正是敌机轰炸过后，炸毁了十几间房屋，十几具尸体血肉模糊躺在屋边路上，仍未收殓。炸死全是老百姓。日寇的凶恶残暴使我们心中仇恨的烈火熊熊地燃烧起来。

这时，我们才知道，日军已经逼近武汉市，全市已经紧急大疏散了。我们改道经孝感、应城，日夜行军，沿汉宜公路西进。到了沙洋，突围冲出日军的包围圈，继续北行到荆门。日夜行军，实在太疲劳了，准备停留休息一两天，谁知第二天还未听到空袭警报，敌机群就飞到荆门上空，狂轰乱炸。我们赶快向郊外疏散隐蔽。何异、刘佩文同学还未跑出屋外，就被敌机投弹炸中，当场牺牲了，李芳琳同学也负了伤。我们为两位光荣牺牲的女同学开了追悼会，将他们掩埋

了。为了避免敌机的轰炸，就连夜出发，终于到达了五战区长官部驻地的樊城。

1938年12月，大汉奸汪精卫叛国投敌，并发表了臭名昭著的“艳电”，这是震动国际的新闻。但国民党重庆政府不愿立即报道，直到1939年2月，消息才在全国传开。全国人民义愤填膺，一致声讨大汉奸卖国贼汪精卫叛国投敌的滔天罪行。此时我们驻樊城，队部决定举行游行示威，声讨汪贼。在游行队伍中，我装扮汪贼，胸前挂着“大汉奸汪精卫”的牌子。一位女同学装扮陈璧君，胸前挂着“汉奸婆陈璧君”的牌子。由八位执手枪的同学分两旁押解着“汪精卫”游行示众。大队伍跟在后面，除全队同学外，连炊事兵、运输兵也出动了。他们拿着写有标语的三角旗，高呼口号：“打倒大汉奸卖国贼汪精卫！”“汪精卫叛国投敌，罪该万死，遗臭万年！”“打死日本鬼子及其走狗汪精卫！”……街两旁挤满了观看的群众，有的自动跟在大队伍后面游行，有的跟着高呼口号，有的向“汪精卫”和“陈璧君”扔果皮、扔石子。游行结束回到驻地，我们两人的衣服都脏了，我的头上起了一个小包。队长说：“这种宣传形式效果真好，震动了整个樊城！”

3月，我们去到随县、枣阳前线，慰问广西子弟兵第84军驻防最前线在凌压西部的189师。一天，该师的王团长带我们20多位同学去巡视第一线阵地，在掩蔽部用望远镜可以看到河对岸的鬼子阵地，河边的房屋都被鬼子拆去了。我们巡视到八二迫击炮阵地时，要求王团长发射几炮，打击对岸的鬼子。团长当即叫连发了四发炮弹，头两发试射，第三炮就打中远处的一间房屋，从望远镜可以看见穿黄军衣的鬼

子从房屋跑进战壕，第四炮就不见有鬼子跑了。奇怪的是鬼子并不还击。王团长说：“有时鬼子打炮过来，我们观测不准也不还击的。”我们在随县前线工作近两个月就奉令回枣阳集中。还未出发，突然接到紧急命令：“枣阳已发现敌踪，不能回枣阳，必须连夜出发到河南省芦头镇去。”我们走了半夜的路，又渴又饥，途经河南境内一个大村堡，想进堡买些食品和喝水。里面有三个老乡轻声对我们说：“村堡里来了百多鬼子骑兵，他们见你们人多不敢出来，他们后面的队伍就快来了，你们快走吧！”我们人少，只好赶紧离开。黎明到达芦头镇附近，正准备休息，突然对面山上的敌人向我们开炮开枪，猛烈射击。同行的川军还带着骑驴子的家眷，目标大，被敌炮弹炸得血肉横飞。川军部队也占领阵地予以还击，敌人不敢下山来，我们分散突围，一气跑了20多里，终于冲出了敌人的包围圈。到了南阳，经镇平到内乡，一路上我们还收容了几十个打散了的广西士兵。内乡是所谓“豫西王”刘廷芳的老巢。他的部下要缴我们的枪，几经交涉，知道我们是李宗仁部下的男女学生军，不仅不缴枪，还派一位参谋长来慰问我们，并送来粮食、蔬菜，表示歉意。

翌日，我们经邓县，第三天才回到五战区长官部驻地老河口，这是第二次的胜利突围。这次行军黄荣基（宾阳人）同学失踪，后来才证实是光荣牺牲了。

1939年底广西学生军第一队宣告解散，大部分同学分配到安徽敌后工作，一部分回广西工作和学习，一部分入黄埔军校。大家在各自岗位上继续参加抗日各项工作，直到抗战胜利。

# 忆柳州抗日游击队成立始末

董咸熙

1938年10月，日本侵略军占领武汉后，大有相继举兵南侵之势。1939年3月，广西绥靖主任公署部署桂林、柳州、邕宁、梧州、玉林、百色各专区成立集训游击司令部。柳州当即成立集训游击司令部。司令部设司令1人，副司令1人，参谋长1人，参谋2人，政治部主任1人，指导员4人，助理员1人，政工队员12人，军需主任，军需各一人，副官主任，副官各1人，军医2人。司令部司令韩绍琪（上校）、副司令覃××（中校）、参谋长白斗明（中校）、政治部主任董咸熙（少校）。

司令部直属机关设1个特务大队和4个战斗队。第一大队队长覃少葵（少校），下属3个中队，集中住扎百朋。第二大队队长黄克群（少校），下属3个中队，集中住在太阳村。第3大队队长廖明治，下属3个中队，集中住在凤山。第4大队队长韩云甫（少校），下属3个中队，集中住在成团。司令部和特务大队住在柳州中学分校（即今柳州高中），当时的柳州中学已迁往成团。

因为是集训游击队，因此4个大队均分散在乡下，以大队为单位，按照步兵操典要求进行基本训练。战术方面，以毛泽东在1938年5月发表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为教材。通过学习训练，要求能在不同的情况下，或化整为零，诱敌深入，围歼敌人；或钳制、扰乱、破坏，使敌人疲

于奔命……在政治训练方面，主要是在每星期一举行“总理纪念周”时，司令部的官兵集中起来，由政治部主任作报告；大队部的官兵集中起来，由指导员作报告。报告的内容是根据《广西日报》、《柳州日报》登载的一周抗日战况和新闻报导作介绍和分析。着重批驳汉奸汪精卫的“三日亡国论”的谬论。至于每中队设一政工队员，则于平时教士兵唱抗战歌曲。

司令部原在柳州城内，但自从抗战爆发后，日机几乎天天都来骚扰柳州飞机场。1939年7月15日这天，9架日机从北海涠洲岛直飞柳州，下午2时许，轰炸市区。在游击司令部大门右侧落下两枚各约500磅的炸弹，炸陷成两个坑，各宽约5米，深约5米。官兵虽然没有死伤，但为了安全，从此司令部就搬到乡下去。先是搬到中渡村刘定环（柳江县大地主）公馆，后又搬到离百朋约5华里的群山脚下的一个小村庄，到这里既可防空，又便于去百朋圩采买。

1939年8月下旬，司令部接到绥署命令，派覃副司令去衡山受训，学习叶剑英讲授的关于游击战争的课程，准备回来传授，开展游击学习训练。9月中旬，绥署政治部召开全省政治工作会议，地点在桂林乐群社，会议时间3天，与会人员有各区民团指挥部政治部主任，各区游击队政治部主任。我参加了会议。会议内容：一、交流政工经验，由桂林区游击队政治部主任靳为霖介绍；二、听取军事委员会蒋委员长训示。在未听训示前，绥署政治部主任程思远一再交待我们要仪表端正，服装整洁，不许佩带手枪。蒋委员长是要看广西青年的代表。临去听训的早上，我们在乐群社集中，程思远率领我们到法政街委员长行辕（旧法专）礼堂，经过

武装人员检查，然后依次坐成凹字形。一会儿，听到喊声“立正”，蒋介石肩披黑色大氅，头戴灰色礼帽，有行营高级将领拥戴由后面侧门进入礼堂，坐在凹字形的缺口中间。蒋讲的不是国内形势，也不是前方抗战和游击战争，而是讲新生活运动的“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那一套理论。

我从桂林开会回到柳州不久，在1939年10月初，司令部便接到绥署关于裁撤各地集训游击司令部的命令。命令不讲裁撤的理由，只讲有的调职。裁撤时，绝大多数官兵被拨到五战区去作补充了。我被调到柳州市民团指挥部政治部做指导员。

广西各区的抗日游击队被裁撤不到1个月时间，日本侵略军就迅速进军占领桂南了。我们不清楚，为何要撤销这支抗日力量。而在撤销不久，1939年11月15日，日军南支派遣军约两个师团，配合海军陆战队，用空军掩护，在钦州附近龙门港登陆。广西驻军新19师被日军突然袭击，溃不成军。日军占领小董、钦州，沿邕铁路长驱直入，11月23日占领南宁。柳州日益紧张起来。

# 我方在芷江市接受日军投降见闻

穆 岳

1945年8月中旬，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时，国民党重庆政府当即筹划受降，同时命令部队向敌占区推进。当时第六战区的任务是接收武汉、沙市、宜昌等长江中游各大城市及港口，建立武汉行辕。

8月下旬，同盟国中国战区统帅部指定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冷欣将军（中将）为中国战区受降官，接受在华日军的投降。受降地点在湖南芷江市。芷江市是湖南省西部的一个中小城市；是当时西南地区的一个重要空军基地，驻有美国空军、炮兵、工程兵，汽车团和部份美国宪兵。

9月初的一天，在芷江机场一个简易建筑的大厅里，举行了简短的受降式。当时笔者在场。上午9点多钟，忽闻隆隆机声传来，空中即出现了4架美空军战斗机。约过5分钟，一架日本银灰色座机由东飞临机场上空，飞机两翼尖端悬挂着约五米长的白布各一条。该机两侧，各有美国战斗机两架押解其降落。飞机降落后，我方一少校参谋带着20名中、美宪兵行至舱门，令日方代表下机。查验证件后，即令其登上一部前面插有两面白旗的吉普车，在四部（前一后三）插有中、美两国国旗的宪兵吉普车押解下离开机坪。

10时许，受降式开始，主席台上摆着一张铺着蓝色桌布的长方形桌，背后紫色幕布上缀着个周围是橄榄枝的金色“V”字，象征胜利与和平。冷欣坐在桌正中，左右各4名

军人（包括一个美军军官）。日方代表坐在主席台下一长椅上，面前摆有一长方形桌，铺着白布。首先由冷欣宣布，他代表同盟国中国战区最高统帅部接受日本无条件投降，继由日方代表、日本支那派遣军总司令岗村宁茨上将宣读日本天皇停战诏书及日军投降书（日方的代表中还有日本华中派遣军参谋长及一个少佐，一个上尉翻译），冷欣接过日方呈上的投降书阅过后，令其在上边签字，随即宣布受降令：

- 1、所有在中国领土、领海、领空的日本各军种、兵种及一切从属人员立即全部解除武装，作战俘处理，听候遣返（遣返集中地区及日期如附件规定）。
- 2、所有在华的日军武器、弹药、装备及一切军用物资，应即清点造册入库封存，以备验收。
- 3、各地区日军，必须向我最高统帅部指定并持证件的官员，办理投降、接收事宜，非指定或无证件的任何部队、官员不得擅自受降、接受，日方可拒绝其行为。
- 4、日方必须给予我接收官员工作上之一切方便，并确保其安全。

5、在我接收部队未到达之前，各地区日军可暂留部分武装维持境内的秩序安全，不许任何武装力量假借接收名义进行侵扰。

6、日本扶植的汪伪军均按此令执行。

冷欣宣布受降令后，将命令文本交给日方，宣布受降式结束，即离席。在整个受降式进行中，岗村宁茨端坐恭听，有时频频点头，两眼阴暗，面如土色，但其一切动作严谨利落。

十一时许仍由吉普车队押日方代表送到机场登机，美机四架先行升空，然后日机起飞返去。

（作者系原《扫荡报》记者）

## 壮村“团结路”建成的经过

覃桂禄

1987年元月，在柳江县三都圩西北边距1.5公里处的乡村公路挡土墙上，用瓷瓦镶嵌成的“团结路”三个醒目大字，至今行人仍清晰可见。这段路是由三都圩通往屯甫屯、中南屯的乡村公路，说起这条“团结路”，它曾有一段坎坷的历程。

1981年，三都乡中南、屯甫两屯，为相争果峒山一片约60多亩的地属权闹了纠纷。中南屯一些群众认为，这片山是属于中南屯管辖的，因此，在山地的石壁上写了“中南地区封山育林”几个大字。屯甫屯一些群众认为，这片山地历来划为屯甫屯，他们也在荒山石壁上写了“中共中央封山育林”的大字。而且还把对方所写的字涂掉。从此，两屯发生了矛盾，且一直解决不了。到了1983年，两屯又为此路段有一个牵涉到原来屯甫屯边的3分多菜地问题，再次引起纠纷，加深了矛盾。某一屯不给另一屯的群众由此通行，并用石头等物把路堵塞，挖坑断路。而此路段却是另一屯到三都圩的必经之路。另一屯群众则去填坑开路，双方争执互不相让。你拦我拆，你挖我填，矛盾激化到顶点时，便发生了械斗。几年来，先后以尖刀、土枪、土炮、炸药包进行械斗3次，双方群众共被打伤了10多人，路面被炸开了两个大坑，这段路几年不能通行。小学生上学受阻，群众赶三都圩被迫绕道走小路、远路，送出公粮、买回化肥无法用车子运输。有些群众原有的马车被迫出卖。两屯群众见面互不打招呼，亲戚不相

往来，亲家变成了冤家，而且两屯间的摩擦时有发生。由于两屯的对立，生产受到严重影响，群众怨声载道。但是，两个屯的大多数群众都有搞好团结的愿望。曾多次派代表向上级反映，要求派人来解决。可是双方的意见难以统一。甚至有人讲，就是用黄金来换，也不给对方走这条路了。问题一直延至1986年。

1986年底，自治区和柳州市组成工作队来到柳江县宣传《土地管理法》、《森林法》、《治安管理处罚条例》（下称“两法一例”），区市与县、乡、村共同组成工作小组，着手解决两方矛盾。县领导亲自出来解决，召集了双方的党员、干部和群众代表座谈会，举办团结学习班，共同学习和座谈党中央关于安定团结的指示和“两法一例”等政策，大家认清了宗派主义、无政府主义和闹分裂的危害，算损失账，统一了认识，产生了搞好团结的愿望和要求。在提高认识的基础上，两屯各派出代表，进行互相协商，经过多次商议，终于达成团结的协议，共同写了《协议书》。1987年元月3日，双方代表在一起聚会，握手言欢，并喝团结酒，唱了团结歌，1987年元月4日，屯甫、中南两屯群众当即冒雨修筑了“团结路”，并在路边的挡土墙上，镶上“团结路”三个大字。从此，两屯的积怨消除了，团结增强了。许多群众高兴地说，今后我们要永远走“团结路”，讲团结话，做团结事，努力搞好生产，为“四化”建设多作贡献。

从此，中南、屯甫两屯群众见面有说有笑，亲戚朋友和好胜当初。大家沿着“团结路”走向美好的未来。

附：《协议书》

## 协 议 书

三都村委屯甫屯与中南屯之间，1981年春以来，因果垌山其中一片荒山权属不清，互相争议后，又对中南通往三都街的道路中间，有一段牵涉到原来屯甫屯的几分地问题，发生了矛盾，多年来矛盾一直得不到解决，阻碍了这条乡村公路的交通畅通。这不仅影响到两屯群众之间的团结，也影响了当地群众的生产，损害国家的利益。1986年12月18日以来，结合“两法一例”的宣传教育，区、市、县、乡政府及村委有关人员组成工作组，对两屯的问题进行了调查，多次找两屯的群众、干部谈情况，分别召开了群众代表和群众会议。1987年元月3日，又召集屯甫屯和中南屯群众代表协商。在工作组的组织指导下，双方通过平等协商，自愿达成如下协议：

一、为发展农村商品生产，共同走富裕道路，决定于1987年元月4日，修路恢复通车；

二、为保证这条乡村公路的长治久安，损坏的这段路由乡政府组织力量修复，统一规划路边砌挡土墙，路修好后，双方命名为“团结路”。

三、中南屯要把通往果垌山的原来一孔石桥修好。

中南屯代表（签章）

（名单略）

屯甫屯代表（签章）

（名单略）

参加协议有关单位和人员（签章）

（名单略）

1987年元月3日

## 越南革命同盟会 在柳州的成立与活动

叶瑞廷

越南革命同盟会主席阮海臣，曾经长期在中国工作。他追随过孙中山先生革命，在辛亥革命期间，参加过镇南关起义。中华民国成立后，在广州市任职，1924至1927年在黄埔军校任教。后来他到日本，与在日本的越南阮氏王朝王子阮强弟共同组织越南抗法复国党。日本侵略军于1940年在广西桂南战败，退往越南，遂将被法国废黜、由日本收养的阮强弟送回越南组织抗法复国政府。阮海臣得知后，即商请中国政府派兵送他回越南北方，联合越南同盟主席胡志明，共同组织抗法复国政府，以迎接阮强弟回国，共同抗法。由于阮海臣与蒋介石有过共事关系，蒋介石同意他的请求，1940年7月，即派出嫡系部队第54军入越。当时我在军部任上尉参谋。军部开赴中越边境，我奉命留在广西田东后方办事处工作。大约两个月后，我突然接到军长陈烈（号石经，柳城县人）的电话，说越南民族革命领袖阮海臣先生和他的秘书钟秀毅先生将到田东来，要我好好招待他们。我和钟秀毅先生是黄埔军校同期同学，因此陈军长还指定我和钟先生协助阮先生研究、制订入越计划的补充方案。从此，我就和阮海臣建立了友好的关系。我于1940年8月在广西龙州加入越南复国党并受聘为中文秘书，后参加越南革命同盟会。

不久，陈烈军长因拔牙身亡，军长职务由黄维接替。黄维接任后并未入越，只将部队停留在中越边境上，也不与阮海臣继续联系。阮海臣组织抗法复国政府计划不能实现，只得临时任命农径猷、农国隆父子组织越南复国军。1940年冬，越南复国军在谅山地区正在与法国殖民军展开血战。但是，由于孤军作战，后援断绝，复国军被法军击溃，退到广西凭祥、龙州等地。

谅山战役失败后，阮海臣到重庆与蒋介石商讨在广西成立越南革命同盟会事宜，并请蒋任革命同盟会指导员。蒋介石同意阮海臣的请求，于是，在1941年春，越南革命同盟会在柳州市鱼峰路正式成立，阮海臣先生任主席。在阮主席领导下，分别在柳州标营和大桥开办两个越南革命干部训练班，标营班对外称“军事委员会西南战地工作人员训练班”，对内称“军事委员会越南革命干部训练班”，班主任先后分别由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桂林区办公室主任李济深负责；大桥班对外称“第四战区干部训练团特别训练班”，班主任是曾天节少将，副主任是叶××，两个训练班的人员，除少数是华侨外，其余均为越南人。他们毕业回国后，在反法复国斗争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越南革命同盟会指导员代表，由第四战区政治部主任侯志明少将兼任。侯是军统人员。他把越南革命同盟会置于四战区政治部控制下，限制越南革命同盟会的活动，阮海臣曾多次向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商请解决受制于人的问题，但因张不便开罪军统，阮只得到重庆找蒋介石。蒋于1943年12月下旬下令撤销侯志明的指导员代表职务，改委张发奎为越南革命同盟会指导员代表。张派四战区办公厅主任肖文中将为

驻会指导员代表办公厅主任，协助阮的工作。此后，越南革命同盟会得以放手开展活动。

胡志明主席在1940年8月由广西靖西县路过德保县的华荣乡时，被国民党乡警逮捕关押，后由四战区靖西指挥所主任邓宝珊解送到柳州窑埠第四战区政治部关押。阮海臣为了集中一切力量抗法复国，遂于1943年9月23日带领越南革命同盟会军事委员叶瑞廷和钟秀毅，到四战区政治部保领胡志明出狱。胡出狱后被推选为越南革命同盟会副主席。于是，阮、胡二公共同组织力量抗法复国。

1943年除夕，国民党军第84军军长覃连芳将军举行迎春家宴，应邀出席的有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教育长杨东莼、四战区长官部新任参军罗志强、越桂粤边区游击总司令蔡廷锴、越南革命同盟会主席阮海臣和副主席胡志明，我和钟秀毅也作陪前往。席间，覃连芳等提出关于越南独立后的国策国体问题的一些想法，大家进行议论，胡志明副主席随即发言，他分析了当前东西方战场的形势，认为苏联战胜德国这个问题，半年内可以解决；中国和盟友美国共同作战，一年内可以打败日本，这次世界大战即将宣告结束。越南也必定能在不太长的时间内彻底打败法国殖民者而获得完全的独立，这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了的。接着，谈到独立后的国策国体问题，他说，大家提出关于越南独立后国策国体的各种设想，可作为我们战后独立建国的参考。但这个问题必须通过我们的公民投票来决定。在座的杨东莼、罗志强、蔡廷锴都认为越南问题由越南的领袖和人民来决定。阮海臣最后说，越南在战后要独立自由，不想依附任何大国。

1944年3月，《阵中日报》（由四战区政治部主办）记

者在柳江路某处采访阮海臣，请他谈谈对越南未来组织政府的态度。阮海臣回答说：我本人对越南领导权的取得与否不感兴趣。我感兴趣的是如何与胡志明团结起来，把法国殖民主义者赶出越南，恢复越南的独立和自由，并永远同中国友好合作，这是我的宿愿。我乐意做一个抗法复国的前辈愿已足矣！阮先生的这番谈话，当年在《阵中日报》和《广西日报》发表过。一次，胡志明在云头岭阮海臣的侄女婿钟秀毅的家里，推心置腹地与阮海臣谈了自己的想法，他希望阮公一如既往积极领导同盟会开展工作，他说：“看来世界大战不久就要结束，越南独立的时间已到。不管前途如何艰苦，斗争如何复杂，越南总是要独立的。希望你我合作不懈，携手前进，未来的越南领导权我不愿竞争。”当时我和黎越强、阮祥三也在场。

1944年春末，第四战区干训团特训班结业，编为第四战区战地工作总队。7月17日下午，我在太平西街住所邀请阮、胡二公及四战区新任参军罗志强中将及钟秀毅、杨文明、黎城强等便宴，席间谈及战地工作队到越后中国军官的安排问题，阮主席说，除已集体安排外，其他个别中国军官欢迎参加我国政府工作。胡副主席提出，除总队官员个别参加越南政府外，一律照旧供职；有自愿退职者则挽留，挽留不住就和中国政府联系，欢送回国，并给予回国生活费，不使生活无着落。谈话中，阮、胡二公对越南的前途很是乐观。8月间，总队在阮、胡二公率领下，回越南组织越南人民民主主义共和国，胡志明当选为共和国主席，阮海阮当选为副主席。

# 我在新桂系军政体系工作 十一年目睹记

潘炳煌

1936年我从广西师专毕业后被派到天保、龙州、桂林等县区民团指挥部去从事抗日宣传工作。1937年“七·七”事变后，全国燃起了抗日的烽火，广大青年热血沸腾，纷纷投身抗日。我也申请奔赴抗日前线。获得批准后就到湖北广济国民党陆军第176师师部报到，师部安排我为政训处少校科长。报到后即参加了一场阻击敌军的战斗。不久，师长又叫我到立煌县接受新任务，说是陈良佐来电调我去的。

1938年秋，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命令廖磊率21集团军进驻大别山，并兼任安徽省主席，李宗仁要廖磊作长期政后游击打算。廖磊率部进驻大别山，以立煌为中心开展抗日游击，这时的大别山已陷于敌人四面包围，安徽各县十之七八被日军铁蹄践踏。廖磊虽是身经百战的军事将领，但他尚缺少内线作战经验，为更好完成李宗仁交给他的任务，便电请李宗仁选派一名能将来当他的“孔明”先生。陈良佐在广西桂林区当民团指挥官时，本领驾于其他各区之上，因此，他便成为李宗仁目中的人选。

陈良佐一到立煌，便把联合一切抗日力量共同对敌的锦囊妙计向廖磊详为叙述。这赢得廖磊和李宗仁的信任。廖磊专心治理他的军事事务，把省主席的事，放心交给陈良佐

办。陈良佐名为民政厅长，实则无异于省主席。

陈良佐为了迅速恢复各县行政组织，以适应抗战的需要，便在立煌创办一个有几百人规模的安徽地方政治军事干部训练团（简称地干团）。训练方式，执行军事管理。课程有世界大势、抗日理论、游击战术、地方行政组织等，授课没有课本，只有讲课纲要，讲课后，学员们在政治指导员指导下分小组讨论。学员主要招收基层行政人员，也在社会招考一部份。训练以三个月为一期。训练期满按学员成绩的优劣派往县以下当行政人员，也有一部份被分配为县政府官员。每期另选成绩优异者三两人为县长。为地干团的需要，陈良佐便以21集团军总司令廖磊的名义，电176师，把我从湖北广济调来立煌，任地干团少校指导员。过了一年我升为中校。

当时在立煌的党派很多，但对抗日作用不大的一些党派，倘若他们不找上门来，陈良佐则假作不知。在立煌的CC派对抗日没有多大帮助，但他可以在蒋介石耳边说话，所以他们找上门要钱，陈也适当应付一下，要官也给一些。当时安徽省动员委员会和抗日演剧队戏剧六队，多是进步分子在里边活动。陈良佐叫我挤出时间常到他们那里联络感情。中共领导的新四军，是支不可多得的抗日力量。由陈良佐亲自出马，主动和他们联系。地干团开办不久，廖磊、陈良佐先后邀请新四军参谋长张云逸及在新四军作客的国际著名文化人士史沫特莱到地干团讲演。新四军战地工作团团长朱克清也被邀到立煌访问。陈良佐得知朱克清于1932年改名朱笃一，并到广西师专任教。那时我是他的学生，因此，就叫我去接待。阔别数年的师生，突然能在大别山重逢，我们

感到分外亲热。朱老师赞赏我们争取到抗日前线来工作的勇气。他还特赠我几本毛泽东著的《论持久战》。作为地干团指导员的我，得到这些书觉得很宝贵，它对地干团学员的政治指导起了很大作用。

地干团训练出几千学员，放到基层行政组织去任职，基层行政组织就恢复得差不多了。但尚需进一步充实、整顿、健全。因此，陈良佐组织一个临时机构即安徽省政府视察团，负责执行这个任务。他自任团长，下分若干个视察小组。我被分到第二视察小组任组长，负责视察桐城、安庆、望江、宿松等县。视察后，对该升的、该调的、该降的人员，就偕同专员或县长磋商执行。如行不通或事件较大，则打报告给团长，由团长处理。记得，在视察中我发现部队中的一些连排长，到乡镇办事作风很坏，若乡镇干部办事稍不如意，则怒骂和施以拳脚，乡镇干部只得哑巴吃黄莲。我视察桐城，有个干部气愤地向我汇报，说保安团某排长来要担架，因为迟误了一些，就被拳打脚踢。我走访那个排长，他还气势汹汹，毫无悔改之意。“基层行政干部的社会地位如此低，如不改变作风，还谈什么充实、健全基层组织。”我加重语气向团长报告此事，团长报告廖磊，廖磊当即下令将那个排长就地枪决。消息传开，拳打脚踢行政干部的事，再也不听说了。基层行政干部，得出了一口气，积极性大大提高。

我视察安庆时，突然接到陈良佐的一个亲译密电。电报云：“我便衣队将奇袭安庆城，万事已具备，尚待你就近设法协助。我便衣队能潜入安庆城内便大功告成。”安庆城外，湖泊繁多，日军劲旅哨所林立，检查很严，我军很难进城。就是进了城，枪响后也难出来。接电报后，我找到从立

煌来的动员委员会一位姓吴的同事，和他商量，请他想办法。他在立煌时和我很友好，他有个舅舅，当伪军头目。通过他，我得到和这个伪军头目见面。我以安徽省政府视察员身份对他晓以大义，果然奏效。于是我军便衣队得以顺利潜入安庆城内。当晚城内枪声一响，城外枪声也随着响起来，响得很密。我便衣队杀死杀伤不少日军，之后，便安然返防。而城外枪声也随之停止。这到底怎么回事？我回到立煌才查知，原来日军陷我武汉后，大吹长江已通行无阻。蒋介石为了粉碎日军的这个狂妄宣传，通过李宗仁，命令廖磊出奇兵，突袭安庆。命令说，只要在城内响起枪声，不论消灭侵城日军多少，就算完成任务。21集团军一位高参接到这任务后，感到难以完成。廖磊找陈良佐商量。陈又找新四军支队高敬亭商量。高支队驻安庆城外，与城外的日军劲旅很接近，可以设法牵住敌人。高敬亭知此缘由，主动配合。所以，后来城内枪声起，高支队便大举向驻城外日军劲旅佯攻。迫使城外日军不敢与城内配合。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

廖磊派便衣队袭击安庆成功，蒋介石、李宗仁皆大欢喜。廖磊又一次尝到了团结抗日的甜头。

廖磊在陈良佐的协助下，治晚一年，大别山形成众志成城，固若金汤。日军虽然四面包围了大别山，却不敢轻易妄动。相反，日军时时刻刻都害怕我大别山奇兵袭击他们山外的据点。廖磊出色地完成了李宗仁交给的敌后长期游击任务。

1939年蒋介石发动反共高潮，阴风刮到大别山，大别山的流言蜚语满天飞。廖磊被攻击为“纵匪容匪”，是安徽毒化的罪魁祸首。李宗仁也如此埋怨廖磊，致使廖磊睡不安枕，食不知味。事实上，CC分子伸手要钱给钱，要官给

官，但他们对廖磊执行李宗仁交下长期对日游击的任务没有什么帮助，反而碍手碍脚。而动委会、抗日6队，尤其是新四军，不向廖要钱、要官，却给廖帮了大忙，如果没有高支队支援，怎么能奇袭安庆成功？！廖磊受了冤屈，想不通，加上其他原因导致脑胀，以至脑溢血终而丧命。我在视察中，早已收到这些坏消息。廖磊死后，坏的消息更多。我写信回立煌向同事问讯，却如石沉大海。从此我视察工作的热情日落千丈，草草收兵，跑回立煌。这时同事们被关的关了，跑的跑了。一个月后得知，李品仙已来接廖磊的职务。李来后把立煌的政工人员来一次大整编：整编后保留名单上没有我。李品仙到来，陈良佐见势不妙，提出辞职回广西。在立煌的广西师专同学麦世法、刘敦安、胡承祧已被捕，未被捕的已跑到新四军那里去了。情况如此，再留在立煌没意思了。回广西又无钱，于是硬着头皮向李品仙借，递上借条，李不说借，也不说不借。当时有个负责指挥那些因战事脱离了上级的豫鄂皖边区党政机关的办事机构。我被分配到这里工作，虽升了一级，但在这个机构却无多大事可做。领导以我“病后体弱”，要我多休息，于是过了一年多退休般的生活。

1941年，我得知重庆方面来文，要调人到重庆政训团去受训。我活动要去，果如所愿。我办好了手续，领了赴渝旅差费，取道江西、湖南，不几天就到了桂林。我在桂林，向大别山发去一个电报，说我重病垂危，未能赴渝，从此结束了大别山生活。陈良佐回到桂林当个空头省府委员，无法帮我解决工作问题，所以在桂林闲住了一个时期。在桂林听说刘敦安、麦世法及其他尚未可知的人已被李品仙残杀了。又听

# 百岁拳师白崇晖与柳州 “崇武”国术馆的建立

胡万良 胡康怡（执笔）

武术，自古以来是我国人民用之健身防身、保家卫国的手段，因此，也被称为国术。三十年代，在地处南疆的柳州，白崇晖创办的“崇武”国术馆，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对武术在民间的普及发展，起了较大的推动作用。

白崇晖，字啸虹，柳州市人。1890年出身于回族武术世家，自幼跟随祖父练习武术和气功，还随天津石广来习太祖长拳和气功多年，后又向白焕卿、傅彦廷、曾延德三位南派名师习艺，得曾师“飞檐走壁”中的“走壁功”绝技。还习过拳击和摔跤并随太极拳家章泽群习吴式太极拳（章是吴式太极拳创始人吴鉴泉的门生，国民党少将师长），博取名家拳术之长，汲取各派拳理之精奥，独创具有特色的散打，在

---

说日军千把人到大别山居然如入无人之境，窜到立煌时，在立煌的机关工作人员仓惶逃命，物资损失不少。在立煌的CC分子有些来不及逃走而成了俘虏，有的下落不明。

不久，由陈良佐推荐，我到靖西专署当科长。1945年陈良佐又出任广西民政厅长，安排我为广西省政府咨议。1946年陈良佐叫我随迁江县长陈相去任迁江中学校长，从而结束了我在桂系军政体系的十一年生涯。

省内外负有盛名。

30年代初，他应南宁精武会主任陈鸿书和省民众教育馆之聘到南宁任教，后晋升为南宁精武会主任，授徒千余人。其中，弟子、精武会的助教张扬、谢耀在1936年元旦的广西第一届国术运动大会上（群众称之为擂台赛），力挫群雄，名列前茅。后来，这两人被聘为桂系军队的武术教官。

1937年，应家乡父老的邀请，为把武术普及到民间，白老拳师和夫人翁怜莲回到柳州，在沙街消防公所创办“崇武”国术馆。由于白崇晖夫妇精通各派武艺，教学经验丰富，前来求教的人很多，初时因师资不足，只能办两个班，学员多为工人和学生。学习内容由浅入深，第一年学潭腿、功力拳、折拳、八卦刀、五虎枪、提袍剑、单刀进枪；第二年学太祖拳、伏虎拳、螳螂拳、太极拳、双刀、双刀进枪、西洋拳和摔跤；第三年学罗汉拳、太极推手、双钩、拐刀进枪、三节棍进枪、合战、西洋拳及摔跤。白老教学态度严谨，他要求弟子练出强壮的体魄，过硬的真功夫，洗雪“东亚病夫”之耻。如他指导徒弟在月光下和黑暗里对练成功。曾子明、莫期昌等人万无一失的单刀进枪招式，就是在黑暗里练就的。先让他们在黑房子里站好位置，一声令下，便对打起来，旁人只闻紧凑清晰的器械碰撞声和刀枪挥动呼呼的风声，如同白日演练时一样准确熟练。

此外，崇武馆还教一堂狮子，在节日里常应政府机关的邀请去作舞狮和拳术、兵器对击表演，很受欢迎和赞扬。

崇武馆至1944年止，已培养了3000多武术人才，弟子遍及到里雍、鹿寨、庆远一带，名扬两广。

1944年，柳州沦陷，崇武馆遂告停办。白崇晖带领部分

弟子参加游击队抗日。当时，鬼子常三五人结伙去抢村，崇武馆师徒就在半路飞刀袭击，使得敌人不敢贸然出去抢掠，晚上龟缩市内。

解放后，白崇晖在市体委领导下，积极开展武术普及运动，跟他学艺者日益增多，对越自卫反击战中的战斗英雄李江、陆源泉曾慕名前来，向他学习擒拿术。1983年，应广大群众要求，经市体委批准，“崇武”国术馆在柳州市重建，他被聘为该馆武术顾问，担任教练的是他的嫡传弟子胡万良、白劲草、白先忧、白先诚等。

1984年，白崇晖把长期秘而不传的优秀拳术《龙虎会》公之于众，通过胡万良整理成文发表在《体育春秋》杂志当年一、二、三期上。并在全国武术挖整展览会上展出，获得一致好评。

1991年，白老拳师逝世，享年百岁。他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的高风亮节，精深武学和“崇武”国术馆倡导的武魂武道，将对广西武术界产生深远的影响。

# 柳州桥史话

冯光祥

早在一千多年前，柳州已形成河北、河南两个部分城区。柳宗元《柳州峒氓》诗“郡城南下接通津”指的就是窑埠码头。窑埠为当时的通津要塞。因此柳州较早的渡口要算窑埠古渡，又叫东门渡。据传于明万历年间（约公元1580年），渡口才筑成石板码头。

明代以前，柳江河两岸无浮桥，来往交通仅靠舟楫横渡。柳江的桥，有史料可查的最早出现在300多年前清代之初。顺治七年（1650年）抵抗清兵的南明军队撤退到柳州，“搭浮桥于南门下”（即东门码头与窑埠码头之间）。顺治十年间（1653年），李自成农民起义军、南明晋王李定国和清兵激战后，攻克柳州，也曾搭浮桥以解决军需问题。随着军事活动的结束，浮桥也无影无踪了。

乾隆二十七年（公元1762年）典史李定业捐俸添置渡船1只，增加船夫2名，并重修码头石阶，将原码头砌宽1丈1尺，长37丈，使码头南侧在古榕的掩映和波光粼粼的映照下，显得更加壮观。

到了民国初年，旧桂系军阀林俊廷盘踞柳州，曾经强夺木材商人的木排架设浮桥，用于军需。桥头有武装军岗监守，桥头设有特大的大铁桶，老百姓过此桥要投下一两个铜板作过桥费。林军撤离柳州后，木材商取回木排，桥也随着消失了。

1929年（民国18年），随着两岸市民的增多，又在柳江架起长长的竹排桥。过往行人一多，水就浸泡鞋袜。这样的桥，稍有洪水即被冲垮，因而浮桥时有中断。

随着1937年“七·七”事变抗日战争的爆发，北方大批难民来柳，使市内人口猛增。部队往返频繁，军用物资调运增多，柳州商旅云集，使柳州工业暂显繁荣。南北两岸交通更为困难。如遇上敌机来骚扰和轰炸，军民无法过河南找岩洞躲避，造成许多伤亡。

为了解决渡河难的问题，由当时驻柳州的第四战区当局出面，架设两道浮桥，一道设在河南大码头，供来往行人通过（今江滨公园码头与培新路口码头之间），桥两头设亭收费，一道设在汽车渡码头（今华丰湾码头与对岸小南路口码头西面之间），专供车辆通过。但还是不够用。后来在窑埠码头增架一条临时浮桥，这原是供给第四战区军事使用的，但后来一般老百姓也可以通过，暂缓了南北两岸交通阻塞的紧张状况。当时这些桥是征用木材商的木筏来架设的，承受力不大，一遇空袭警报，行人密集，整条桥就往下沉，危及军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因而又改用53加仑油桶作浮力架桥。

以上这些浮桥，除空袭警报外，平时过桥均要收费。更麻烦的是，每到晚间至翌日零时至2时就要拆桥，让来往的船只通过。行船过后又要把桥合拢。遇上洪水，浮桥时有被折断和冲垮。

1943年5月30日清晨，因洪水冲断了浮桥，一些学生、职工及做买卖的人从河南码头争先恐后地蜂拥上船，一艘小汽艇吃力地拍拖着两艇用横木札紧的船渡江。由于驳艇超重，船身摇晃，失去重心。两艘拍拖的船，札艇的横木又被

踩断，使船倾刻翻沉，几百人落入河中，除打捞上岸外，仍有30多条生命葬身于浊涛恶浪之中。中正中学的生物老师廖冰清等10多名师生即被溺死，河岸一片哭声，情景惨不忍睹。而地方当局又未给死难者抚恤和作善后处理。事后在中正中学（今柳高新华区）开了一个追悼大会，社会各界代表一致要求惩办肇事凶首，许多龙城老者，至今记忆尤存。

柳州驻军第四战区司令部与柳州专员公署早就有筹建柳江大桥的念头。经呈报广西建设厅批准，于1942年1月由阙宗骥等人组成“柳江中正铁桥工程处筹备处”（简称桥工处），下设总务、财务、工务等组进行筹备工作。桥工处的经费由市政建设委员会拨出。当时的花捐附加款供行政办公和生活等费用。工程材料费，除上级拨款外，另发行房地产奖券。1944年秋，柳州疏散，桥工处暂迁融县（今融水）。日本投降后，桥工处于1945年8月又迁回柳州，并上书国民党广西省政府，要求续建。因光复后，民穷财尽，省府速复：桥工处暂时停办，并将遗下的档案、资料、测绘仪器等设施，一一造册移交柳江县政府保管。到此，柳江中正铁桥工程处筹备工作，全部宣告结束。

此外，据家住雅儒路104号朱兴棣（朱老1940年17岁参加铁路工作）及朱光华同志讲，国民党政府曾在抗战爆发后，于1939年在现柳江铁桥上游3.5公里处修建柳江铁路简便铁桥，用铁架、木架等器材作桥墩支架，车速限时为每小时5公里。接着又在同年10月修建半永久性铁桥（即柳江铁桥），1940年12月建成，1941年1月通车。1944年11月7日晚，即柳州沦陷前4天，由国民党军炸毁此桥。同年11月11日柳州城厢全部被日军侵占。

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出于军事需要，又从加拿大购入大批设备架设柳江铁桥。但至1949年柳州解放时尚未修成。只见4个桥墩已露出水面。

1949年11月2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从北站攻入市区。溃败的国民党军队，早已在浮桥安置了炸药，正值点火引爆时，住在河南码头管理处的两名桥工，冒着生命危险，将导火线剪断，保护了浮桥，使解放军能迅速通过，顺利地解放了柳州。

柳州解放后不久，由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团与柳州桥梁队合力恢复重建柳江铁桥（当时未成立柳州铁路局）。参加施工的工程技术人员及民工有2千多人，铁桥工程进展迅速，经几个月时间加紧施工，于1950年8月30日顺利完成全部工程。在铁桥的北端（今雅儒小学内）举行通车典礼，柳江铁桥的建成，使湘、桂、黔铁路能连接沟通，形成中南、西南5省的交通枢纽，掀开了柳州交通史的新篇章。

柳州解放前，龙城父老及各界人士也曾多次倡议集资兴建柳江公路大桥，但总无法实现。

解放后仍架浮桥，市人民政府数度拨款修理，但这样简便的浮桥，只供行人通过，车辆仍要在车渡码头乘船过河，而每当洪水季节，浮桥仍时有被冲垮或折断。

60年代初，政府拨款投资727万多元建设大桥，于1968年12月26日建成了全长608米的柳江大桥（一桥），使鱼峰路和龙城路衔接起来。大桥上车水马龙，热闹非凡。从此结束了龙城人民千百年来过河愁的岁月，促进了河两岸的兴旺发达。

紧接着市政府又投资1800多万元筹建河东大桥（二桥），

在1984年5月完成，全桥长1300米。1989年10月1日，又建成全长694.65米，桥面净宽22米的壶东大桥（三桥），三桥东西引道长585.35米，整个大桥连配套的潭中大道、白沙路改造工程施工总长达3130米。1990年10月16日动工兴建又一座横跨柳江的公路大桥——柳州静兰大桥。这座大桥主桥长551.32米，宽16.5米，工程造价1225万元，是柳州市第四大桥。于1992年10月27日通车。

在建国后短短的40多年时间，建成了4座大桥。现尚有两座大桥正在兴建中。这是党和人民政府的英明领导和柳州人民共同努力的结果，几座大桥的建成使南来北往的车辆，鱼贯接踵、川流不息，推动了经济和各项事业的发展，如今柳州呈现一片昌盛繁荣景象。

注释：

本文是根据我现年90岁的家母口述及自己耳闻目睹，并访问了当年参加建桥的有关人员，查阅有关资料写成的。

# 抗日战争时期一位美国人在 柳州的记事

晓 骞

(按：本文根据《一个美国人看旧中国》一书的某些章节缩编而成。该书作者为美国的画家格兰姆·贝克，具有一颗善良美好的心和强烈的正义感，他于1940年第二次到中国。这块土地的人和事给他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后来他把这段时间的见闻撰写成书，下面是他在柳州时的经历记。)

## (一)

炎热的八月，我在柳州等车去重庆，一等就是一星期。

我住的旅馆设在近郊区。田野上，有个建筑脚手架高高耸立着。第一个清晨，天刚破晓，扩音器发出了大声叫喊：“十八架敌机到广西啦！”一阵喧闹声中，第一次警报响了，山梁悬出了一盏红灯。忽然，第二盏红灯升起，扩音器又喊道：“快！快！快！”旅客们跌跌撞撞地跑下楼，边跑边喊。

“敌机到柳州了！”扩音器隆隆在响，令人不寒而栗。山上，香烟熄灭了，阳伞折起了，孩子们叫着父母，穿白衣服的被警告要隐蔽，一切谈话都停止了。过了一会儿，敌机每三架一组，自城南飞往西方，顷刻间就不见了。

我在山谷中和两个国民党官员坐在一起，一位年轻的开始向他的同伴介绍美国——那摩天楼呀，真高呀！那大桥

呀，真长啊！那隧道，好深哪……

少顷，有个小小的殡仪队在下面那空虚的城镇出现了，当一架敌机返回时，整个队伍就冲刺到山上来了，他们带着棺材和一切红绿色的仪仗幡旗。也不知什么原因，抬棺材的苦力竟想把棺材置于活人之中，他们打趣地说，把他留在这儿吧，他不会有意见的……

我在柳州的这一周，只有一天没警报，有一天响了两次，可只有一次遭到了十二架飞机的轻微轰炸。其实轰炸本身并不如人们的喧嚣那么可怕，因为轰炸只在多次警报中来一次，而喧嚣却在每次警报中都有。每当敌机去后，山上山下，到处笑着，喧闹着，重复地问着同一个问题：

“怕不怕”？

“不怕，不怕！”

“怕一点。”

“怕，也没有办法。”回答来自儿童、老人和残废人。

当敌机已离省后，大家欢笑地彼此从衣服上扔掉树叶，走时还摘点花朵。人群流下山，重新又占有了他们的城镇。不过，等待他们的又将是什么呢？

一九四五年八月，当太平洋战争结束时，我又一次来到了柳州，我看到了战争留给柳州人民的痛苦和凄凉。那段时间，连绵的雨季开始了，河水泛滥，冲毁了临时性的新建桥梁，所有柳州外边的公路都被阻隔。雨季一直延续到八月中旬。原来的柳州城，现在已是一片寂静的废墟。

## (二)

抗日战争胜利后，在许多废墟上，去年撤退时失散的家

人，现在又回到了家园。可是，到处断垣残壁，破砖烂瓦。一遍焦土上，房屋揭盖的揭盖，倒塌的倒塌，那杂乱无章的情景，显得分外凄凉。他们只好用粉笔写下了心酸无比的留言，重又失望地离去了。而留下这些潦草涂成的寄语，是告诉亲友怎样去找到他。一些人在碎砖破瓦堆中常能见到刚死去的亲友的尸体。因为，在这潮湿而炎热的夏季，这里既有饥荒又是霍乱流行。

我记得，一九四〇年，这里被飞机轰炸毁坏的房子常常很快得到修复，而五年后的今天，这里虽有几处棚房和商店在修复，但进度之慢我在中国别无所见。许多新草棚建在河边的街道两侧，被洪水冲毁后，看来，人们再无勇气和精神去重建了。有一条街，满是战争毁坏的房屋，遭水灾后，从棕色的泥浆和碎片中散发出了难闻的恶臭。在近代世界上，这是一幅最令人失望的图景啊！

战争结束前的一星期，在这侵略军造成的凄惨场地上，竟出现了一次异乎寻常的游行。在这段时期中，我最后铭记在心的一件事就是：美国舆论帮助了国民党，作出了种种有关前线的假报导。

八月末的柳州机场，成了美军最靠东边的大机场，可以说，它成了我们在中国的航空中心。日军正式投降后不几天，几百架美国飞机从印度仓促调来，飞往驼峰和太平洋的飞机聚集柳州，以便运载国民党部队飞往沿海。大部分飞机运载士兵，也有些飞机满载官员去日占区接管城市。当这些飞机降落机场时，旅客们总要爬出飞机舱，呼吸新鲜空气。在机场小休的高级官员，大部份携带家属和佣人以及一些攀龙附凤之徒，并带着无数的行李，包括昆明火腿和满能的重

庆柑桔。

接管期间，一些官员以官职猎取钱财，向伪官吏敲诈勒索，将没收敌伪财产作为个人的战利品，蛮横地买进有利可图的私人产业，只支付一点象征性的价钱等等。这些丑恶可耻的现象，在南京特别突出。

到了八月底，即使象柳州这样的靠救济过活的城市，也开始遭受到官吏们种种滥用职权之苦。这表明国民党统治已面临绝境。九月初，我从柳州出发，沿西江直下广东，在沿河而下的途中，沿岸大地上，到处是荒芜的农田。那遗弃的乡镇和颠沛流离的人们，那遍野荒芜的情景，每天都显得格外凄凉、格外落寞……

（原载1991年7月27、8月21日《柳州文化报》）

# 对《中国工程师学会广西考察团在柳州》一文的商榷

覃仙毓

1989年6月印行的《柳州文史资料》第六辑，载《中国工程师学会广西考察团在柳州》一文，笔者认为，有误数处，现分述商榷如下：

一、该文说柳州电灯公司“至民16年，机量90瓦”。据查，柳州电灯公司于民国5年5月由商人合资兴办，安装48千瓦木炭发电机组1台。初期营业顺利，嗣添装40千瓦柴油发电机组1台。民国10年广西社会不安，商务凋零，公司亏损，无力经营而停业。（见民国21年9月22日《南宁民国日报》和32年出版的《桂政纪实》）。以上说明柳州电灯公司在民国10年前已有两台发电机组，容量88千瓦，不是至民16年，机量90瓦。

该文介绍柳州电厂的情况说，“该厂民国27年增装250和2万马力油炭两用机1部……”这里说的是250匹马力机1部加2万匹马力机1部，还是250匹马力原动机配2万匹马力发电机1部？讲不清楚。事实是：广西电力厂柳州分厂于民国24年5月建厂，安装200千瓦柴油发电机组1台，（280匹马力柴油机配200千瓦发电机）。27年10月增装160千瓦油炭两用发电机组1台，（250匹马力原动机配160千瓦发电机）。烧柴油出力160千瓦，烧木炭出力130千瓦。（见民

国32年出版的《桂政纪实》、《柳州电厂民国32年电气事业年报》)。

该文说柳州电厂民国31年1月成立，……筹装2千瓦透平机1部”。这里只有原动机，没有发电机。其实，不是2千瓦透平机1部，而是2000千瓦汽轮发电机组1台。(见柳州电厂档案)

二、该文说“柳州官商合办电灯公司创始民国5年，厂址设在斜阳路，厂长杨逢倡……”。据查资料：柳州电灯公司创办时经理陈敬堂，董事长陈炳焜。民国10年停业。15年夏，广西政府建设厅厅长伍廷颺拨款派员恢复供电，称柳州电灯局，伍朝驥任局长，17年冬停办。民20年驻柳第四集团军拨款复办，杨逢倡任局长，23年停办。柳州电灯公司，电灯局的负责人分别称经理、局长，不称厂长。(见1990年9月出版的《柳州金融志》47页、民国17年9月8日《柳州各机关联合会第16周常会会议录》、民20年10月18《柳江农林试验场场长杨士钊宣誓就职文》)。

三、该文说，柳州电灯公司后由“建设厅长伍廷颺氏收回官办。”这是不对的。其实，柳州电灯局生产经营的固定资产是柳州电灯公司的。电灯局结束，电灯公司收回资产拍卖，电机卖给广西农事试验场抽水灌溉；配电线路卖给广西电力厂柳州分厂。(见《广西电力厂柳州分厂概况》民国30年赵德民作)。柳州电灯公司是商人合资办的企业，伍廷颺出资派员利用该公司设备供电营业，并没有出资购货或依法没收其资产，怎么收回官办？

四、该文有一段话：“该厂民27年增装1台250和2万马力油炭两用机1部，抗战后，经济部资源委员会与广西省

政府为应需起见，联合办该厂，于31年1月成立，……”。这里说的抗日战争（民国34年9月）后联合办的柳州电厂与民31年1月成立的时间有矛盾。其实民27年是广西电力厂柳州分厂，民31年1月柳州电厂成立接管广西电力厂柳州分厂继续营业，同时建设新厂。当时抗日战争尚未结束，不是抗战后。

五、该文谈到柳州电灯局结束时说“……旧机由公司自行处置出售。电力厂出资5000元，旧公司股东出资1800元，付还地方了结债务。”事实应是电灯局结束，原电灯公司收回资产进行拍卖，配电线路卖给广西电力厂柳州分厂，不是电力厂出资替电灯局（或电灯公司）还债。

该文说柳州电厂2000千瓦机组土木工程于民国31年12月动工，应为11月，有奠基石为证。

---

## 更 正

《柳州文史资料》第三辑刊登《柳州三青团从组成到覆灭》一文中提到“后来担任该报唯一的女记者蓝秀珍，也是由冯培仁介绍的，这样就加强了三青团在柳州的政治实力。”经作者蒋森进一步回忆和查实，蓝秀珍同志不是三青团员。她到柳州日报工作也不是由冯培仁介绍的。特此更正。

# 柳州文史资料

第九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西壮族自治区  
柳州市委员会学习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2002



第九輯

柳州文史  
資料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廣西壯族自治區  
柳州市委員會學習文史資料委員會編

主 编 覃克光  
副主编 戴义开  
编 辑 韦桂芳  
陈佚生  
谢朴生  
校 对 刘明文  
韦桂芳  
张政杰

在全国各族人民特别是青少年中，进一步加强党的基本路线教育，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近代史、现代史教育和国情教育，增强民族自尊、自信和自强精神，抵御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腐朽思想的侵蚀，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和价值观。

——摘自江泽民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

封面題字 篆家佐  
封面攝影 鄭振川

## 柳州文史資料第九輯

廣西柳州市政協學習文史資料委員會編

柳州市印制廠印刷

區準印證 N00020291

印數：1800 冊 字數：153000 字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 上本價3.50 元